

## 第九章 中歐——嚴厲的試煉

關於我們有沒有能力製造歐洲和平以至於世界和平的一個問題，我們在德奧方面遭遇到了嚴厲的試煉。就地理上講，這一個區域是歐洲大陸的心臟；就經濟上講，它有礦產、工業、農業和運輸系統供給歐洲以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再就政治上講，它是二十五年中兩次世界大戰的火藥箱，除非我們有高強的技巧、能耐和政治手腕，也許會引起另外一次世界大戰。

正直善意的人們都認為德國問題應該首先解決。但是從大戰結束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看起來，我相信先簽訂小國和約較為得計。在迭次會議中，充分顯示了蘇聯代表團為求達到目的而斷斷辯論和互相結托的高明手段，他們爲了某種全不相關的重要問題上取得讓步起見，不屑對一箇公認合理的建議橫加阻撓，不使它獲致協議。要是把德奧和約的複雜問題全部列入五小國和約的問題中去，那麼蘇聯的這種策略就可以自由運用，而何論那一處地方的和平的恢復，至少要延遲若干年。

對於歐洲大部分佔領軍隊的撤退，我們已經開闢了一條路徑。這些軍隊撤退以後，那五個國家裏面的八千萬人民，將獲得一個選擇他們所欲的政府的機會。我們已經排除了種種混亂，延宕

和壓迫的因素。我們現在可以更直捷更明瞭地處理德奧的嚴重問題了。

我們應該認清，在各大強國中，獨有蘇聯並不急切要及早成立和約。尤其對於德國問題，蘇聯對於任何延宕政策一概表示滿意，因為這種延宕政策，使他們能够繼續佔領那劃歸他們的肥沃的地區，繼續吸收它的資源，繼續以蘇聯的生活方式訓練佔領地的人民。而且這延宕政策又能使他們在波蘭繼續駐軍，以達到保護通至德國的交通綫的目的。同樣，蘇聯鑒於在奧國繼續佔領下去，不但可以滿足它的需要，而且使軍隊得以留駐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以保護交通綫，因此也願意把對奧和約延宕下去。

說到對奧和約問題，那正是我們所覺得難於使蘇聯和我們意見一致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一九四三年十月間，美國務卿赫爾曾經在莫斯科得到一次外交上的莫大的成功。靠了他的努力成立了一個協議：三強宣布奧國應恢復爲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

一九四五年四月紅軍侵入奧國，不久便佔領了維也納，在那裏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當時我們並不承認這個政府，因爲它是地方性而不是全國性的。後來在九月間開了一次全國政治領袖會議，結果把共產黨系內政部長權力加以限制，所有選舉、警務、公共安全等管理權，置在三大政黨所合組的五人委員會之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我們承認了奧國臨時政府，十一月廿三日，在盟軍當局的監視下，舉行了一次選舉，當選的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由四個佔領國予以承認。

在沒有成立條約確定奧國的獨立國地位以前，奧國將繼續受制於盟國管制委員會。像德國一樣，奧國及其首都維也納，各被分割成四個部分，其中蘇聯佔領區不但區域最大，而且擁有最重要的工業和最優良的耕地。

一九四五年的選舉，使奧國回復到德奧合併以前的政治陣容，社會黨和人民黨佔了優勢，共產黨僅得到全部選票的百分之五。在這次選舉以後，蘇聯對奧政策有着顯著的變動。可是當我們在波茨坦舉行會議時，奧國大選還沒有舉行，那時對奧決議比較容易成立。蘇聯代表團建議奧國臨時政府的權力應當擴張到各佔領區去，我們最後與英人同意，俟軍隊開入各佔領區後，再檢討這個問題。當時英首相邱吉爾曾指責蘇軍遲遲不退出各佔領區。兩天以後，史達林宣布蘇聯軍隊開始撤退到自己的佔領區，後來他又接受邱吉爾的要求，協助供給非蘇軍佔領區中維也納人的食糧，因為維也納的糧食平常是從東部蘇聯佔領區運來的。

這一個問題和平解決以後，我們又轉到賠償問題上去。莫洛托夫建議奧國賠款應規定為二億五千萬美元，以實物付給，為期六年，並指定三強和南斯拉夫為接受賠償的國家。英美兩國非但不提出賠償要求，而且主張遵照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宣言，應該把奧國視作解放區，而不應該視作敵國，因此不應向它勒索賠款。

莫洛托夫却答稱：美國沒有被奧軍佔領過，而蘇聯却遭受奧軍極大破壞，因此不能不給他們一些懲罰。我告訴他：我們對蘇聯犧牲了許多生命表示同情，至於損失的財產，那我們也化了很

大的戰費，彼此的損失是一樣的。後來他問我們如果拿奧國和義國的器材和物資作爲賠償，我們是否同意。我回答說：奧國既是一個解放國，就不應負賠償之責，但僅供作戰用的器材，不妨作爲義國的賠償，那是我們可以同意的。

史達林在三強會議議定書中雖會同意奧國不應負責賠償，但我不久就看出莫洛托夫決定用另一方式獲得同數量的賠償。他藉口議定書中會規定奧境蘇聯佔領區內的「德國資產」可作賠償用。德國佔領奧國七年中，曾用武力攫得大量財產，如油田銀行船隻等。蘇聯堅稱這些財產都是「德國資產」，所以可給蘇聯作爲賠償用的。其他三個佔領國都沒有意料到蘇聯會對波茨坦協定作如此解釋的，當然誰也不能承認它。這顯然與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倫敦會議宣言相衝突，那宣言聲明凡是用武力取得的財產都不加以承認的。如果把蘇聯所要求的資產拆遷去，將使奧國經濟陷於破產；如果留在奧國而受蘇聯管轄，那麼將使奧國失去獨立國的地位。

奧政府曾企圖把這些資產收歸國有，以制止蘇聯的攫取，但蘇聯藉口此種辦法違反波茨坦協定，而置之不理。直至著者屬筆時止，由外交途徑以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切努力——無論是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中或在外長會議中——全沒有得到成功。管制委員會美方代表克拉克和本人在歷次外長會議中所獲得的經驗，使我得到一個結論，即蘇聯毫無對奧成立和約的誠意，它需要延長佔領時期，使控制下的奧國經濟和政治機構，牽入東歐集團中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時，我想討論奧國境內德國資產問題，並建議削減佔領

軍，以輕奧國經濟負擔。莫洛托夫始則答應加以考慮，繼而指謫奧人企圖「拉攏」法西斯黨參加政府，後來又指責英人重建奧國陸軍及納粹反共白俄軍隊，顯欲與蘇聯作對。貝文先生當加駁斥，指蘇聯代表輕信無稽謠言，並謂四強委員會正在各佔領區內調查真相。

我們在莫斯科會議中，關於奧國問題就只談到這個地步。

一九四六年二月，美國代表向外長會議其他代表提出，擬在下次巴黎會議中討論對奧和約。四月廿五日舉行首次會議時，我就想把這個問題列入議程，可是莫洛托夫立即加以反對，說蘇聯代表團還沒有機會研究我們所提出的建議。

其後我又一再和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作私人商談，可是他們對我說，奧國政府還沒有能力肅清納粹勢力，佔領軍隊至少應該再留駐一年。我又建議由四國外次先把對奧和約研究一下，可是我所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必須由四國外長加以考慮。在會議將要結束，準備討論下次會議議程時，我又建議把對奧和約問題列入議程，並由四國外次先草擬一和約草案，可是莫洛托夫一再推託，說目前正在討論小國和約，還沒有結束，無暇旁及對奧和約，因此這一個問題又擱置下來。

在休會期間，美國代表將對奧和約草案一件送交其他各國代表，以便在會議重開時作為討論的根據。這回莫洛托夫並不直接反對將此問題列入議程，僅要求暫緩成立決議。後來會議中接受皮杜爾的建議，把「奧國問題之檢討」一議案，列於議程之末。六月廿六日英國代表又提出第二件草案，但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於是我便要求各國責令外長代表研究這兩件草案，以及法蘇代表

團或許提出的其他草案。

這時候莫洛托夫提出一件決議案，包含四點，首先提起盟國管制委員會最近成立的協議，增強奧政府的權力。其次提到西部佔領區中尚有難民四十三萬七千人，其中有不少是「法西斯黨」，認為是毗鄰各民主國家的一個重大威脅，主張「緊急」撤退。第三，該決議案說明此項撤退工作的完成，為恢復奧國完全獨立的必要條件。末了，莫氏主張在其他和約完成以後，各國外長代表方纔可以着手進行對奧和約的議訂。

貝文和我一致反對把難民問題的解決作為開始討論和約的先決問題，並主張必須先行查明事實，然後纔能確認決議案中的種種主張。

奧國問題的討論至此即告停頓。我們在巴黎外長會議中並沒有更多的進展。

在紐約我們預備再嘗試一下。這回莫洛托夫贊同了一個建議，把德奧問題在三月間召開的莫斯科會議中提出討論。貝文和皮杜爾代表慕維爾附和的主張，從速指定各國外長代表立即開始初步工作。兩天以後即十二月十一日，莫洛托夫同意指派外長代表研討對奧及對德和約，並決定於一月十四日在倫敦開始工作。這時我又提出奧國境內德國資產問題，但莫洛托夫表示不預備討論這個問題，我因為知道各國外長代表會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也沒有堅持要提出。

對奧和約的着手進行，從二月一直到十二月，快將一年，我知道工作的完成為期尚遠，而對德和約更屬渺茫。於是美國代表團決定把裁減歐洲各地盟國佔領軍隊的問題重行提出討論。我們

力陳此一行動足以減輕戰勝國以及戰敗國的負擔。我們建議四國成立協議，在四月一日把奧境四佔領區內的軍隊各裁減一萬人，同日在德國境內的駐軍裁減至如下數目：蘇聯佔領區二十萬人，英、法、美、日佔領區各為十四萬人，法國佔領區七萬人。這樣，沿交通線的駐軍也可以同樣比例減少。我們建議波蘭的駐軍以二萬人為限，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各以五千人為限。

莫洛托夫說這是一個新問題，他不預備加以考慮。等到貝文問他，如果這問題在莫斯科會議中提出時，他是否願意討論，他才表示了同意。可是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把這建議重行提出時，莫洛托夫却又不同意了。

在莫斯科會議中，馬歇爾雖努力於對奧和約的簽訂，但是沒有得到成功。當時所成立的對奧和約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進展。

我們應該記得，我們目前並非對付一個敵國，對奧和約的目標，無非是要重建奧國的獨立和劃定它的疆界而已。如果到奧國解放三週年，即一九四八年四月那時候，奧國已經恢復了三強在一九四三年所保證的自由和獨立的話，那才真幸運了！

說到德國問題，初步的協議倒很令人滿意，可是後來的發展却不能不使人失望。我們在波茨坦即會對德國問題作過初步的商談。我們一面努力對先訂小國和約一點成立協議，一面率先取得各國同意，確定支配德國佔領問題的政治及經濟原則，這些原則可能促成和約的早日成立。

在政治方面，這些原則不但規定一切納粹份子應受懲罰和排斥，並且準備好在民主的基礎上

建設德國政治生命的輪廓。它們依據民主思想指導司法和教育制度的改組，促成自由的地方政府和自由的工會組織，並且在財政、運輸、交通、工業及國外貿易各方面設定中央行政機構。

在經濟方面，這些原則禁止一切軍火製造，限制平時工業的轉變為戰爭工業，消滅中央集權的經濟統制，如卡特兒（同業者的同盟）等。三強同意應把德國視作單純的經濟體系，應着重於農業及平時國內工業的發展。盟國對於工業生產、開礦、運輸及交通、農業、工資及物價、國外貿易、通貨及銀行等問題，應採取一致的政策。

此外，賠償問題亦擬列入表中，但因紅軍於波茨坦會議以前曾搬走大批資產，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全面的計算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採取分區處理賠償的計劃。

在波茨坦成立的賠償協定的另一方面，並沒有受到應受的注意。在雅爾達所提出的建議，即賠償委員會應把「德國勞力的使用」，視作可能的賠償來源，被三強在波茨坦會議中所剔除，在那裏所簽訂的議定書中，並沒有規定勞力的使用可以作為賠償。然而無數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仍舊被強迫着作工，違反了莊重的國際誓約。

在對德戰爭的末期，我們收留了許多俘虜，我們無法在後方照顧他們，看管他們需要多數的軍隊，因此艾森豪威爾將軍決定把他們移交各解放國看管。可是這些俘虜向美國陸軍投降，所以我們不得不負起看管的責任來。拘留在美國的俘虜，我們竭力設法使他們即速回國，不顧雇主的阻撓和運輸的困難，最後一批的德義俘虜，終於在一九四六年秋間被遣送回國。



日內瓦戰俘協定規定，在戰爭結束以後，所有戰俘應儘速遣送回國。蘇聯並沒有簽字於該協定，但英國和法國都是簽字國。

鑒於各盟國對該協定所負的義務，我以為各國應同樣努力加速遣送俘虜回國。但是在自己沒有辦到以前，不能去責備他國。英國總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宣佈了一個計劃，預備把最後一批俘虜於一九四八年十月間遣送回國。同時我對於法國非正式提出了一個遣送俘虜回國的計劃。這時拘留在法國的俘虜還有六十萬人左右，都是艾森豪威爾所移交的，其中有四萬人在煤礦中工作，二十八萬人在農場工作，其餘做着各種雜務。

法國人要求我暫時不要有正式的行動，我答應了。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我要求為我們看管俘虜的三個國家——即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一律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完成遣送工作。我的文書中指出戰爭結束已十八個月，而美國人最恨強迫勞役，所以我們相信這些並非戰犯的俘虜，應該及早遣送回家。法國的回答是，他們雖然知道應該把戰俘送回國，但因為國內缺乏工人，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完成遣送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美政府宣佈已與法國簽訂協定，留在法國的俘虜四十五萬人，以每月二萬人的速度予以釋放。這就是說，最後一批的德國戰俘，要到戰爭結束後四年才能遣送回國。該協定並規定，戰俘釋放以後，或則遣送回國，或則留在法國作志願工人，悉聽自便。

於蘇聯境內戰俘——無論是德國人或日本人——的情形，我們不甚明瞭。史達林元帥曾於

一九四五年六月告訴霍布金說，蘇聯共有戰俘約二百萬人，其中一百七十萬都是德國人。他們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莫斯科區担任建設工作，或在煤礦和木廠內作工。一九四七年三月，蘇聯政府自稱已經把德國人一百餘萬遣送回國，還有八十九萬留在國內。

關於遣送德國戰俘的問題，在莫斯科外長會議末次會議中獲致了一個全面協定。那協定成立於四月廿三日，規定所有德國戰俘一律應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遣送完畢。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够如期解決，須知強迫勞動營是希特勒政體的一個象徵，我們應該儘速消滅它。

我們所認爲是一種諒解，最後未必能成立協議，看了上面所講的事實，我們又得到了一個例證。所以我曾經說過，波茨坦會議中對德成立的協定是失敗了。因此失敗便招致了一般人的指責。但過失並不在協定本身。蘇聯拒絕誠意合作，這便是過去以及目前德國問題的癥結所在。然而一直到波茨坦會議以後幾個月我們纔明白了一個事實，因爲法國分担了蘇聯所願意分担的許多責任。

法國並未參加波茨坦會議，所以不受該會議所成立協定的拘束，事實上法國對於若干協定反對甚力。在我們從德國返國以後，戴高樂和皮杜爾訪問華府時，就對杜魯門總統和我提出抗議。

他們所擔心的是設置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計劃，和萊茵地、魯爾及薩爾的處置辦法。戴高樂深恐這些措置會造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德國政府。他說，在目前促成德國團結，甚至會比過去更加危險，因爲德國會受到在東部崛起的一個强有力的斯拉夫集團的控制。他說：唯其因爲德國衰

弱，所以更容易變成其他強國的政治工具。波蘭伸張勢力到德國東部以後，把德國的重心向西移轉，因此威脅着法國的安全。他們要求萊茵地脫離德國而由法國管理，薩爾歸併於法國，魯爾則交由國際管理。

杜魯門總統和我竭力解釋運輸和通貨等中央管理機構的設置，並不會造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德國政府。由聯合國來促進法國的安全，比較由分割德國的領土來達到這個目的更爲有效。唯有各國行動一致，纔能獲得最大的安全。

我們的努力沒有成功。在倫敦外長會議首次會議中，皮杜爾重新提出他的辯論，繼續反對在德國西部邊疆未獲決定以前設置一個德國中央權力機關。法人深恐德國的勢力伸入魯爾和萊茵地以後，他們將不能在和約中保持他們所需要的控制權。

法國的政黨堅主政府應採取皮杜爾所聲明的立場，可是這一個立場已經阻礙了健全的經濟復興，同時予蘇聯以延宕的藉口，他們對於這延宕可以不負責任。我明白法人爲什麼要恐懼，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對大局重新觀察一下。他們應該對於經濟團結所必需的中央行政機構不再表示反對。貝文和我好久以前早已提出保證，在簽訂和約時，我們贊成把薩爾割讓給法國，因此法國很少理由再採取那種立場。他們繼續此種立場不能影響蘇聯的立場。蘇聯將繼續反對薩爾的割讓，直到最後幾小時，然後以交換條件要求法國在其他某種問題上予蘇聯以支援。

正如我們所預料的，在倫敦會議以後，「由外交途徑」所獲得的進展極爲有限，所以我四

月間前往巴黎時，我決定主張先從德國問題着手。因此美國代表團建議委派特別代表担任兩件工作：（一）對佔領問題編造一件報告，（二）開始討論對德和約。由於德國被分做滴水不入的四個部份，使得人物和思想不能互相流通交換，美國乃不得不每年耗費二億美元，以供給糧食，這糧食平常時候是從蘇聯佔領區那裏運來的。爲了償付我們帶進來的糧食，必須增加輸出品生產量。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不能繼續拆除工業設備送給蘇聯作爲賠償。

我們主張四國代表不必等到德國政府成立以後才開始工作，我們對於和平解決的性質和未來德國政府究竟應該是怎麼樣的政府兩點覓取協議，然後佔領國和德國人民才知道今後應走的路綫。

英法兩國都贊同我們的建議，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委派代表，而且他還拒絕我們的附帶建議，即四強簽訂二十五年條約以防止德國黷武主義復活，這使我們更加失望。

九月間在倫敦時，我曾經非正式和莫洛托夫討論到這個建議，那時他似乎很關心，可是後來不再聽見他提到這件事，我就把它列入預備在莫斯科會議時和史達林討論的各項問題內。

在聖誕節前夕，史達林設宴招待我們，宴後我和他在一間會客室裏面作密談，旁邊只有他的翻譯官巴夫洛夫先生。我告訴他，我們在倫敦討論過的和約，莫洛托夫竟一言不提，很覺失望。我說：「這種和約的簽訂，可使歐洲各國相信美國決不再採取孤立政策。我常常想起在雅爾達時對德國又一次侵略行爲表示憂懼的情景。你說唯有四強繼續合作解除德國的武裝，才能够減輕你

的憂懼，或許更會左右你在巴爾幹各國的行動」。後來我又說許多美國朝野重視這種和約的話。史達林回答說，這是一個絕好的建議，他說：「如果你決心爭取這個和約，你可以相信我一定會支持你的」。

我把這段談話記在心裏，當我們回到美國以後，我就開始草擬對德和約。爲減少誤會的可能起見，我儘量依據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關係佔領期內解除軍備的盟國宣言的條文。我又加添一條規定，即四強在締結對德和約以後，應該保持一監察隊，由具有工程知識和特種技能的人組織之，目的在防止製造軍器工業的建立，如果這些監察者發覺有破壞條約的情形，應立即報告當局，四強就應該責成德國政府命令製造者停止這些危險的活動。要是遭到拒絕，那麼四強可以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強迫其服從。

這種辦法可使四強不必在德國維持大量軍隊。被解除軍備的德國，要是它的政府知道了萬一破壞條約，四強任何一國或數國可在數小時內派遣空軍到德國領土上面的話，決不敢違抗盟軍總部所發出的命令。

照我所草擬的條約，得到多數的同意後，即可採取行動。就四強而論，所謂多數當然指三國而言。此項規定的目的顯然是要防止任何一國對於採取行動橫加阻撓。這種不承認否決權的辦法或許就是蘇聯要提出反對的一個理由。

杜魯門總統十分贊成我這個建議，他認爲一定能够得到各方的接受。我又曾和參議員康納利

和范登堡討論到它，並且把這個計劃交給其他參議員研究，他們在原則上一致贊同這個計劃。

在獲得各方一致贊同以後，我便在二月初把草約副本送交蘇聯、英國和法國外交當局，請他們把它視作討論的根據，歡迎他們提出修正案或其他草案。貝文和皮杜爾看後立刻表示贊成，不過還得略加修改。我在離開華盛頓前往巴黎時，接到莫洛托夫的一封信，說他對於那個草案有幾點不能同意。

四月廿八日我和莫洛托夫一同吃飯時，我就問他不同意的地方在那裏。他竟說這個草約好像把解除德國軍備的問題延擱到佔領時期以後了，這很使我吃驚。他說關於德國應該立即解除軍備一點，早已成立協議，他又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考核解除軍備實施的情形。他又說，等到這種調查工作完成以後，才可以把未來管制問題加入另外的條約中去。

我竭力向莫洛托夫解釋，我說：「這條約對於防備德國再度侵略可多一重保障，同時可以消除關於美國是否願意分擔保障和平責任的懷疑。我得坦白告訴你，許多美國人不能明白蘇聯的目的究竟何在——是爭取安全還是只圖擴張勢力？像這樣的和約，以及同樣的對日和約，決能有效地解決安全問題的。」

莫氏答稱：蘇聯贊同對德對日簽訂二十五年解除軍備條約，但特別強調關於立即解除德國軍備以前的協議應付諸實施。我和莫洛托夫討論了許多時候，竭力說明我們的草約不會把德國的解除軍備問題延擱下去，反之，它是根據解除軍備應立即完成的假定而擬定的。

第二天我把這問題在會議中提出，莫洛托夫仍舊作同樣的爭辯。他說他願意鄭重考慮我們的建議，但是覺得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完成目前的協議。

爲了應付莫氏關於現行解除軍備協定缺乏行動的辯論，我特地去會晤柏林的克萊將軍。幾天以後，他向盟軍管制委員會建議組織委員會訪問四佔領區，查報解除軍備的進行情形。當我將此一措置向會議提出報告時，莫洛托夫說，他的政府將支持這一種措置。可是他對於和約的見解却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

當和約再度提出討論時，莫洛托夫採取了攻勢，他說，和約的時期定得不够長，至少應當定爲四十年。我立即表示同意。他接着又說，那和約「一點也不妥當」，「不能可靠地保障歐洲和全世界的安全」，因爲那解除軍備的條文，不很完備。我告訴他，關於解除軍備的條文，是從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美英法蘇四國政府所公佈的協定中摘錄來的。如果認爲不很完備，儘可加以修正的。

可是莫洛托夫始則謂除非立即採取解除德國軍備的行動，這種和約是沒有用處的，再則又說那和約把德國民主化等問題避而不談。我就說明關於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目的可以在今後和平會議中成立的條約中加以規定。

就這些辯論看起來，足見莫氏並沒有認真討論和約的意思，而一味推三託四，企圖延宕下去。當莫氏繼續下去說：「和約把羅斯福總統曾在雅爾達同意交付蘇聯賠款至少百億美元的一件

事略而不論」時，我是忍無可忍了。我回答說：「美國自願放棄以往的政策，而提出這一個和約，以便幫助保障歐洲的安全，想不到有人提出毫不相關的賠償問題和有關佔領的次要的困難問題，實可遺憾！」我和莫洛托夫又交換了許多意見，已到吃夜飯時候，最後接受貝文先生的提議，預備在次日繼續討論。

次日早晨，貝文和皮杜爾發表強硬的言論，一致擁護我們的立場。貝文說：英國人認為德國的復興是對於和平的最大威脅，對於那長期解除德國軍備的條約，英政府熱烈表示贊同。他又說：維持歐洲和平有三條路綫；第一、實力相等的各國間保持一種均勢；第二、由一個強國或兩個國家集團來統治歐洲；第三、四強在其盟國合作之下實行聯合管制。他強調說：英政府相信那最後一條路綫最能够促成歐洲的穩定。

皮杜爾說：德國的「黷武主義的普魯士性格」，我們必須設法摧毀它，美國所建議的和約不致阻礙賠償、肅清納粹勢力或其他重要的佔領工作，非但如此，並且能加強聯合國的團結，以避免德國復活的危險，且能藉美國的支援以保障歐洲的安全。

這些言論都很深刻動人，可是仍不能左右莫洛托夫的立場。當一九四七年四月，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再度提出討論廿五年或四十年和約時，蘇聯外長又提出新理由來反對那和約。有幾點理由和修正案竟異常荒謬，好像有意那樣使得它們難以接受。

至此，我不得不作如下的結論：在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答應支持那和約以後，



蘇聯最高統帥部即政治局，決定不需要美國分担維持今後廿五年或四十年中歐洲安全的責任。美國所施的壓力足以嵌制蘇聯的行動自由。同樣一種保證，使皮杜爾覺得那和約「深得吾心」，可是莫洛托夫却對它表示異議。莫洛托夫那樣對蘇聯政府負責，很值得佩服。他的冷淡的態度自始就和史達林的熱忱相映成趣。

我們不能說莫洛托夫對那和約將繼續反對到底。他現在應該相信，無論簽訂和約與否，我們無意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利益。當他決定支持它時，他也許要聲明：蘇聯將提出含有若干合理修改的和約草案，他提出這個作為對我們的大讓步，或許會要求我們給他兩件東西以為交換，即賠款一百億美元和參加魯爾的管制。

當我們在巴黎討論和約問題毫無進展時，在七月十日那天重又提到美國的建議，即指派代表研究急切的德國問題及和約草案。

這次意義重大的討論廢續三天之久，皮杜爾先生首先發言。他闡明法國的立場說：在德國的疆界沒有確定以前，任何政策都無從決定。他重新提出法國的要求，即收回薩爾問題，國際共管魯爾問題，以及萊茵地的脫離德國的問題。他的第二個目標是從德國獲得更多的煤斤。

貝文亦同意指派代表研究這些問題，並謂英國願意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他特別強調把德國視作整個經濟體系的波茨坦協定應即付諸實施。他說維持英國佔領區要使英國人民每年支出三億二千萬美元，現在已不能再持續下去了。理由是其他佔領區尤其是蘇聯佔領區內的剩餘食糧，

被搬運到德國以外的地方去。

莫洛托夫表示反對，他說在外長尚未解決其他問題時，決不能再指派其他代表。這些問題之一當然是蘇聯所要求的一百億美元賠款，另一問題便是魯爾的管制問題。關於後面一個建議，他指責西部佔領區內並未實行裁軍與解除軍備。

現在這問題已經是耳熟能詳了。蘇聯曾譴責英人在他們的佔領區內養有納粹殘餘軍隊。英人曾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派員調查各佔領區，這事因蘇聯代表的反對而作罷。後來英人又向柏林的管制委員會報告，說蘇聯佔領區內仍舊在製造軍用物品，並建議派員調查該國的解除工業武裝的情形。當我們在五月初提出調查的建議時，莫洛托夫曾說他願意加以支持，可是他派在柏林的代表却多方阻撓，使調查工作無法進行。現在蘇聯既然提出責難，我就重新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組織調查團調查各區拆除戰具工作和毀滅軍火及遣散軍隊的情形。但莫洛托夫却回答說：在我們沒有決定一個德國經濟裁軍的全面計劃以前，這種調查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這時皮杜爾插入辯論，他說他覺得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好像在「兜圈子」。我便接下去說，要避兔兜圈子，只要責成各國外長代表把各項問題的範圍縮小一下，那麼下次會議討論時可以更加有結果了。莫洛托夫責問我為什麼不同意在十一月間召集一次特別會議。

我的回答是：「對於這個會議我並不反對，可是為什麼要等到十一月才召開這會議呢？我所恐懼的倒是在十一月裏我們提出這建議時，恐怕蘇聯代表又要建議把這問題交給各國外長代表去

研究，又要經過五個月以後才能開始工作。我覺得倒不如現在馬上着手的好。」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恐懼果然是不出所料。莫洛托夫在紐約外長會議裏把責成四個外長代表研究德國問題的建議延擱到十二月十一日實行。一月間四國外長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聽取曾經對德作戰的弱小盟國的意見，並討論草擬德國和約的程序。我們已經明白一九四七年三四月間召開的莫斯科會議，進展的程度是怎樣的遲緩。現在世人正期待着十一月間召開的會議，希望能對和約問題的解決獲得真正進步的朕兆。

## 第十章 一個行動的路線

德奧和約的早日成立，對於歐洲政治、經濟健康的恢復是必不可少的。軍事佔領的壁壘，佔領費用的負擔，加上將來之不可預料；這些因素使歐洲的「腹地」陷於解體的危境。其損害我們的盟友，好像給德奧兩國以不加區別的懲罰一樣。

在我寫本文的時候，波茨坦和會差不多已經開過了兩年。那時我們在雪林霍夫宮裏所圍桌會商的，在當時相信是一個永久和平機構的適當草案，可是這個草案並沒有滿足我們的期望，因此，重新衡量情勢和計劃一個新行動路線，在現在是必要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長會議的聲明，是蘇聯對德政策最富有意義的表示。他對於這篇演說的重視，可以由下列的一個事實上表示出來，就是在演說之先，演稿先交給報界發表，這對於我們是常事，但是對於蘇聯外交家，却是非常的舉動。這個蘇聯對德態度首次而至今尚有權威性的表示，在我們計劃將來的時候，值得特別提出。

莫氏演說辭的開頭，就對德人強烈的呼籲，而批評一切將德國改變為農業國家的所有建議。他說：「採取毀滅德國的方針，或使德國農業化，包括消滅它主要的工業中心在內，都是錯

誤的路線」。他用多種方式，一再強調這個見解：「我們的宗旨不是要毀滅德國，而是在造成一個民主而和平的國家，在它農業之外，有它自己的工業和國際貿易。……消滅德國的國家形式，農業化德國消除德國主要工業等政策，將使德國成爲危險情緒和復仇思想繁育的地區，德國將重入反動份子的掌握中，進而剝奪歐洲的安寧與和平」。

然後他談到魯爾問題，這裏他又設法使其兩方面都講得通。他指出把魯爾與德國分割，「亦是導源於毀滅德國和農業化德國的政策，因爲我們很容易明瞭，如果沒有魯爾區，德國不能成爲一個獨立 *Viable* 的國家」。不過，莫氏接着說：「魯爾應在四強管制之下，以防止德國戰爭工業的復活」。

德國未來的國家形式，是莫洛托夫第二件關切的事，對於分裂德國爲若干自治邦，與德國聯邦化的類似建議，這些「時尚」的談論，他都大加批評。他說：「西部佔領區內的盟國當局，已經在鼓勵德國實施聯邦制的觀念，而沒有顧到德國人民的願望」。蘇聯的主張是：「對於德國人民自身的問題，強制的提供解決辦法，是不應該的」。這類的行動都不該採取，除了由公民投票決定外，不該分割德國任何領土。當然，莫洛托夫不會提到蘇聯支持波蘭取得西來西亞和奧德河、尼塞河以東全部土地的要求。

他又說：「德國煤鐵產量之提高與和平工業產品增加，我們均不應加以阻礙」，至此他提及盟國管制委員會正在規定未來德國工業水準的行動，接着說：「現在必須承認這點，就是德國的

和平工業必須給它一個機會，作更大範圍的發展……」。可是莫氏免避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規定德國工業水準時，蘇聯代表投票贊成最低的數字，直到英、美代表極度堅持之後，方才規定爲一個較高的數字。

莫洛托夫最後談到對德和約問題，「在談到對德和約之前，必須解決成立德國政府的問題。……但是即使在一個德國成立之後，亦需要若干年去考驗這個新政府究竟代表什麼和是否可信任……未來的德國政府，必須是個民主的政府，能够肅清在德國的殘餘法西斯力量，而且同時能够實行德國對於同盟的義務。最重要的一件，是必須能實行對於盟國賠償工作，只有在這個新德國政府能够應付這些任務，同時真正能誠實的予以執行，而使我們感覺到滿意時，方才能够鄭重的談判締結對德和約」。

在最後一段談話中，證實了我們的恐懼，就是蘇聯除非被世界輿論逼得沒有辦法，否則在若干年之內，它不會同意和德國締結和約。它會利用在盟國管制委員會和外長會議中的否決權，去保障採用他們「民主」政府的觀念，保障參加德國工業的管制，特別是魯爾區的工業，同時保障實行一百億美元的賠償。

這是一篇有效果的演說。這時候德國將在各大城進行選舉，這篇演說恰在此時發表，目的在爭取德國人的好感。德國人對於賠償問題的厭惡，已被反對不經公民投票而割土和瓜分所引起的同情抵消而有餘。演說中最使德國人高興的，是斥責消滅德國工業和「農業化」德國這一點。我

立刻了解這個呼籲的力量，這是清楚的計算好的來利用德國人對於所謂「摩根索計劃」的普遍恐懼。而摩根索計劃已經被美國新聞界廣泛的討論着。

當一九四四年十月，大戰尚在進行，我那時恰在巴黎，在我所在的嘉賓館中，有一個能講德國話的伍長，每一個夜間，他爲我翻譯柏林的廣播，內容是一貫不變的向德國人民呼籲不要去考慮盟國投降的建議。他們提出警告說，投降的意思是實施「摩根索計劃」，將摧毀德國全部的工業，而把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這個計劃被故意誇大，來激勵德國人作殊死戰，不作投降之想。莫洛托夫的演說，是針對着這些收聽無線電廣播的人們而發，他們被教育得只希望由美國得到最粗暴的處分，他是利用德國人民對美國政策的認識不清，而從中漁利。

我不得不承認這種努力的有效，因爲在我們自己國家裏，對於處理德國政策，亦曾經發生過紛亂，事實真相是：在我們內閣中，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更大的紛亂。

我國想到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下半月份，有一次在白宮裏，羅斯福總統亦討論到他建議的對德和平方式，他提到國務院裏有幾位有善意而用得不得當的官員，正在計劃他所認爲「軟弱」的對德和平條約。他說他的計劃不是這樣，德國人應該好好的受次教訓，使他們明瞭對於這次大戰所負的責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一日三餐只准吃一隻湯，這些話不像是羅斯福總統說的話，原因是他很憤然。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指定了一個內閣委員會去研究對德和平問題，裏面有國務卿赫爾，財

摩根索，陸長史汀生。但在這個委員會中，彼此意見分歧，在同年九月九日，他們在總統辦公室內開會，霍浦金亦列席，陸長史汀生首先發言，認為他們都在研究一種方式，使德國不致再度嘗試控制世界，但是對於方法一層，彼此意見互異，他辯論着說摩根索計劃將大量的消滅德國的工業，他引一段摩氏計劃中對於魯爾及週圍工業區的處理方法，作為證明；原文：「是這個區域不但要取去現存的所有工業，並且要加以軟化和控制，使它在看得到的將來，不能再成為工業區。所有沒有被戰爭摧毀的工業設備，應當完全的拆卸運走，否則即須全部予以毀滅。所有礦內的機器應全部折運，礦山本身應該澈底的破壞」。史汀生當時提出辯駁，認為這地區的資源是歐洲生產力自然與必需的資產，應當予以保存，用於整個大陸的福利上。他的想法是把魯爾國際化或是托管它的產品，如此的處理辦法，可與全世界的需要和利益相一致。對於摩根索建議中主張主要戰犯由軍方認出，不需審判，即可處決一點，史汀生亦表反對。認為整個程序至少應當包括人權法案的基本要點，他力言假使這些罪人能在文明的莊嚴的情況下予以處罰，對於後世將有更大的影響。

就在這個時期，總統和赫爾國務卿要我考慮美國駐德高級專員的位置，在過去，我已經告訴過總統，在戰事結束後，要離開人力動員局，但是對於這個建議，我並沒有興趣。雖然如此，我仍答允加以考慮，並對於已經提出的佔領計劃加以研究。國務院的力特爾倍格先生，他在戰後時期中是很能幹的指導德國事務的，當時把佔領德國計劃交給我，並建議願答覆一切我所提出的問



題。這個計劃給我的印象是遵照財長給總統建議的方針，進行一個懲罰的和平，對於總統之反對「軟弱的和平」我有同感，但我認為這個計劃是不必要的粗暴，為歐洲將來着想，更不明智。有一條規定尤其引起我的注意，它的措辭是等於說主要戰犯應當加以審判與絞死，我就問對於無罪釋放一節是否考慮到，力特爾倍格亦同意，條文的措辭有問題，同時他補充說計劃的許多部份包括這節在內，是由財部代表準備的。不久之後，我就報告總統和國務卿不能接受這個任命，因為不能勝任。

內閣委員會中的意見衝突，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邱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時才發展到頂點。赫爾國務卿沒有參加這會，他告訴我，因為總統說過這次會議中只討論軍事，因為摩根索財長參加這次會議，很明顯的，計劃已有變更。陸長史汀生也沒有去，不過在開會時，他對德國的戰後計劃有意見送陳總統。

事實的發展證明魁北克會議很重要，舉例來說；英、美在德境的佔領區即在會中獲得協議。我們接受了南德的部份，而邱吉爾則同意英軍區內的 Bremerhaven 港作為美軍佔領區的一部，使我們能够利用這大港作供應上的用途，在九月十四日又有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在對日作戰期內，對於英國很慷慨的租借計劃。

到九月十五日，羅邱批准了一個對於戰後德國的備忘錄，以後就被人稱為「摩根索計劃」的，總統是追隨了財長的見解，而沒有接受國務卿和陸長的意見，這個協定中關於「德境冶金化

學電氣工業」的部份，立即引起華府官員的注意。備忘錄裏面指出經驗足以說明這些工業可以由和平性質轉變成爲戰爭性質，在德人手中受到損失的政府，有權去搬走他們所需要的機器，去彌補自己的損失。

備忘錄的原文是：「因此，魯爾與薩爾的工業必需停工和結束，同時感覺到，這兩個區域應由世界組織下的一個團體加以管理，由它來監督工業機器的拆卸，和確切防止用狡猾手段來恢復」。

「消滅魯爾和薩爾區戰爭工業的方案，目的在使德國變成一個以農業及畜牧業爲主的國家」。

「邱吉爾和羅斯福對於這個方案，雙方同意」。

赫爾國務卿沒有批准這個方案，在九月廿五日，他忠告總統就對德政策與英、蘇兩國政策成立一個堅定的協議，並表示這一類的事項，向來是在三強協議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他補充說：國務院迄無消息，表示英政府會贊成魯爾和薩爾兩區的全部生產力，至於蘇聯的意見，則尙不明瞭。

邱吉爾之肯批准這個備忘錄，實是難於理解，以後在雅爾達時，他慨嘆這個和平充滿了報復氣息。在波茨坦會議時，他主張重工業不應減少到一個水準，使德國的經濟，必須依賴外力來維持。會後四強商洽德國工業水準時，英國政府主張的水準，較其他三國都高。同時，羅斯福總統當時採取的態度，亦難於理解。他於九月廿九日送出一個備忘錄，答覆赫爾國務卿，裏面說明國

務院或其他部份於此時試探英、蘇對於德國工業的意見，並無裨益。總統力言：「時局之真正核心所在，是防止英國在大戰結束之後，完全陷於破產」。總統說有人把這個聲明供給報紙發表，但這聲明是「根本不正確的」。他補充說：「沒有人再要把德國造成一個完全農業的國家，但是有人把這消息供給報界，我希望我們能發現他而加以處分」。總統再度陳述，他不能看英國經濟崩潰，而德國在同時重整軍事潛能，可能在二十年內再發動另一次大戰，只是工廠的檢查不足防止此事，可是也沒有人要把魯爾·薩爾的工業生產能力全部摧毀」。

同一天，赫爾在收到備忘錄後，有一封信給總統，赫爾說：「內閣委員會對於戰後處理德國的政策迄未獲得協議，財政部所送出的備忘錄，與國務院內的意見大有出入。同時，我已經收到閣下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和魁北克會議中決定的有關魯爾·薩爾與轉變德國成爲農業國家的意見聲明，這個備忘錄好像大部份是反映財長對於處置德國的意見，因此，我覺得應該把國務院對於這事的看法貢獻給你」。跟着就是赫爾國務卿的政策聲明，在經濟的部門，他說：我們目標之一，是使德國永不能再度作戰，並永久消滅德國對於歐洲的經濟控制。要達到這兩項目標，有下列各項必要的措施：（一）毀滅所有不能改變成和平用途的戰爭工業，並防止其重建，（二）其他軍用工廠一律強制其生產民生用品，史汀生陸長在大體上贊同赫爾的意見，在一次與總統的談話中，他表明了他的態度。總統當時說他們之間的看法沒有大出入，他無意使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可是史汀生當時就提醒總統對於魁北克聲明的措辭加以注意。陸長對於總統，平日衷心敬

要，對於後者在大戰中的作爲，更有很大的欽佩，他表示：希望總統不會贊成一個報復的和平，總統同意史汀生的見解，並說魁北克文告中的幾句特別句子，必是當時不經意所造成。此外，總統並有備忘錄給對外經濟局長克勞萊，對此事有所解釋，綜合言之，魁北克會議中的對德協定，實給羅斯福總統不少的煩惱。

各部間對於這個問題繼續交換意見，直到三月廿五日，經過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會商之後，產生了一個書面文件，由三部代表簽字，而由羅斯福總統批准。以後助理國務卿克萊頓出席波茨坦會議的經濟委員會時，就用過這個備忘錄，這個文件中沒有提到使德國成爲農業國家的話。同時，創意魁北克計劃的邱吉爾首相，在波茨坦時，對杜魯門總統和我亦沒有提到這點。事實上，在波茨坦時沒有一個人向我們提過，而在那裏，我們的建議成爲對德政治、經濟方案的基礎，以後即被各國元首所批准。

當然，莫洛托夫已經從報紙上獲悉由於魁北克協議在我們政府中所造成的紛亂。他很明瞭德國人民如何的恐懼把一個熟練工業技工的國家轉變成爲農夫國家的任何計劃。莫洛托夫成功的利用了這種恐懼，蘇聯佔領區內的報紙，幾乎每天都在曲解我們的意見，在柏林的共產黨領袖們散布謠言，說美國對歐洲情勢感到厭惡，在短期內將撤退在歐陸的軍隊。

在莫洛托夫發表蘇聯對德政策的後一日（七月十一日），我對於美國立場作了一個一般性的聲明，我當時說得很簡短，因爲我要集中注意力在派定代表，並使他們立即工作的緊急目標上。

我想暫不發對德政策的詳細聲明，直等到外長會議預備處理德國問題時爲止。後來我改變主意，由於蘇聯代表強把德國問題的處理拖延到十一月，由於蘇聯在德境的宣傳攻勢繼續不輟，我決定立刻作對德政策的全部聲明。因爲巴黎正在開和平會議（按即處理義大利及巴爾幹之和會），不適宜於發表這個聲明；所以趕往德國，和美軍佔領區的佔領軍和文武官員談話。克萊將軍很鼓勵我如此做，他告訴我如果在德國境內發表一個政策的聲明，對於佔領機構極有幫助，同時他很快地安排斯圖加特的會晤，由於他的請求，我們先到柏林，爲了看看德國和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我們是搭了火車赴斯圖加特，我們乘着納粹政府爲希特勒享受而造的火車旅行，這車子確實是比美國總統的專用車來得奢侈舒適，希特勒的車廂包括兩個房間和一間大的浴室，我的太太和我對於過去希特勒和伊芙勃倫所佔用的房間，略有新奇之感。

我們在九月六日正午之前抵達斯圖加特，在彈痕纍纍的車站上，美軍佔領區內符登堡、巴伐利亞海西各縣的官員都在恭候，我急於和他們見面，因爲他們代表着我們重建德國地方自治政府與民主程序的第一個實驗。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問了他們幾個問題，我們和他們共處了半小時左右，然後一起到符登堡國立劇院，這劇院是斯圖加特僅存的較大集會場所。麥克納利將軍和克萊將軍已經盡最大努力，去安排一個發表美國政策的動人場面，但我確信他們的計劃沒有包括一個小的項目，當我和麥克納利將軍、墨飛大使和兩位議員步上講台的時候，軍樂隊奏着「惡劣的天氣」，我真想問問克萊將軍：是不是他命令軍樂隊奏這個象徵性的音樂。克萊爲了避免出風頭，

竟坐在來賓之中。

演說一開頭，我說美國人民已經明白我們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和平與福利是不可分割，同時，我們的和平福利，不能以犧牲其他人民的和平福利為代價的」。

「我希望德國人民不要再犯這種錯誤，認為美國人因為愛好和平，對於任何國家利用武力和威脅去控制其他民族及政府的行為，就會袖手不顧。……我們意欲繼續對於歐洲和世界事務的興趣，我們已經協助去組織聯合國。我們相信聯合國將阻止侵略國家發動戰爭，因為我們對聯合國信任，我們將以全部的力量與資源來支持聯合國機構」。

然後我談到美國認為應當在德國實施的和平，我說我們老早已經不談所謂強硬或軟弱的和平，因為我們所要的是永久和平。「我們將反對阻礙有效的和平的一切粗暴及報復性措施，我們亦將反對招致破壞和平的軟弱措置」。

我們首先必須消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時要給德人以機會，「把他們偉大的精力與技能用在和平的工作上，而在適當的時機，在聯合國中取得一個榮譽的地位」。

「如果德國在東方西方爭霸的軍事鬥爭中，成爲一個工具和夥伴，則決非德國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在一般性聲明之後，我提到需要的特定行動。德國在一代中兩度給予鄰邦的損害，應該盡它補救的責任。美國願意看到波茨坦會議中關於解除武裝和賠償的協定全部實施，如此德國的戰爭

潛能，將因戰時工業的廢除與重工業的減少和遷移而降低。但是，實施的程度，應以不剝奪德人一般歐洲的生活水準而不致依賴外國援助爲限。

我聲明：「在決定工業水準時，沒有允許從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因爲自現行生產中提取賠償，將與波茨坦協定所規定的工業水準完全矛盾」。我接着說：美國不能同意比較波茨坦協定中更大的賠償。我解釋：由於盟國管制委員會未能在德國經濟統一的點上獲得協議，因此波茨坦協定未能實施。沒有經濟統一，就無法達到盟國管制委員會所決定的水準。我說，美國的意見主張成立德國的中央行政機構，來發表一個共同的財政政策，和一個全國性的運輸、工業與國際貿易組織。

我繼續說：「德國必須予以輸出商品的機會，使它能夠充分進口而造成經濟的自立，德國是歐洲的一部份，如果擁有巨大煤鐵資源的德國竟成爲一個窮人院的話，歐洲的復興特別是荷、比和接鄰國家的復原，將因之而延遲」。

在聲明經濟原則之後，我轉到政治的領域，佔領的目的並不期望一個德國政治經濟生活的「長期外國獨裁」，而是「由下而上」的建立德國的政治民主。我們相信德人應在地方政治的推動中負起主要責任，我們要這樣的治理德國，使他們的政治機構走向地方分權。我力言：我們不信「大量的外國軍隊和外國官吏，不論他們的動機紀律如何的好，能在長期內成爲其他國家民主政治的最可靠的指導者」。我們要盟國政府確定一般的通則，在這樣規定之下，「德國人民能够

管理自己」，這樣盟國的佔領軍可以限制到「監督實行這些通則的數目」。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建議成立一個和約，包括一個駐德廿五年至四十年爲期的武力，去保證德國不再重新武裝。接着我就發表一個陸軍機關報星條報描寫爲「正像醫生診斷」的聲明：「安全武力可能長期留駐德國，我們不願有任何誤解，我們不願推諉責任，我們並不預備撤退，我們準備繼續留駐下去，並在安全武力之中，供給我們的部份」。

同時，我們贊成及早成立臨時政府，但這個政府的負責人士不應由其他國家來安排一切，而應包括四個佔領區中各邦各省民主而負責的主要官員。在管制委員會權力之下，這個政府應做到使中央政府正常的進行，同時還要起草一個聯邦憲草。

我接着說：「確定新德國疆界的時機已至，奧地利已被承認爲自由獨立之邦，波茨坦會議，各國元首支持哥尼斯堡劃歸蘇聯的要求，至於西里西亞及東部領土爲行政目的而轉移給波蘭一節，在會議前蘇聯已經提出，但是波茨坦會議的換文中，清楚地指出：「各國元首不同意在和會中支持任何特定領土之割讓」。我們的確在雅爾達會議中同意，寇松線以東的領土——應由波蘭轉移給蘇聯，同時亦相信波蘭的西北疆界應有補償的修正，可是德國領土割讓的範圍，必須在最後解決獲得同意時方能有所決定」。

我指出：我們不能否認法國對於薩爾的權利，但是提到魯爾和萊茵區「美國不能支持對於無可爭議的德國領土的侵佔，和不是真正有關人民所要求的領土分割」。我們是決心使這些區域內



的資源，不再用於破壞性的目的，因此我們贊成「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管制整個德國，包括魯爾及萊茵區在內」，但是我們不會贊成任何使魯爾及萊茵區落入列強政治控制及利用的管制方式」。

我結束我的演講時說：德國人民必須明白，「想統治和屈辱全球」的是德國的武力，「德國人民目前的痛苦，是他們領袖所發動的戰爭所賜予的，美國無法救助」，但是我們想法給德國人民一個機會，「只要他們能够尊重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有一天他們能自重重苦難之中，尋出一條生路」。

演說完畢，樂隊奏美國國歌，所有的聽眾，包括德國領袖在內，都肅立致敬。地點和環境，特別是佔領軍文武當局的出席，造成一個特別感動人的場面。當最後一個節拍沉寂下去的時候，離國好幾個星期的范登堡議員，掉頭對我說：「美國國歌以前從沒有給人如此的感動」。

這個聲明在英、美佔領區均廣為登載，法國佔領區略為登得少一些，除開蘇軍佔領區外，電台均有譯成德文的廣播，但在蘇聯佔領區內，除了一家報紙之外，其餘都把它登在第二版，記載最長的亦僅有一百四十行。而在一個短時期之後，全歐洲共產黨所控制的報紙，發動了一個嚴厲批評的攻勢，在波蘭，波德邊疆的聲明尤其受到攻擊，說美國破壞波茨坦協定，但是事實並不如此，我們當時會指責蘇聯將自己佔領區分一部給波蘭的片面行動，史達林就向美總統說：「波蘭西部邊界問題正待解決，蘇聯沒有任何約束」。最後的換文上說：「三國元首重申他們的意見，波蘭西部疆界應在和會中作最後決定」。史達林當時對總統的聲明是真誠的，但是在波茨坦換文

簽字半月後的八月十六日，蘇聯竟與波蘭締約，承認奧得·尼塞兩河爲波蘭的西疆。

斯圖加特的演說，使蘇聯再不能在波蘭人前面說這一套，而在德國人前講另外一套，他們被迫來作一個選擇，終於正式宣布支持波蘭的領土要求。以後，德國領袖們力言蘇聯這種立場是與他們的諾言相背，因此，德國人對於共產黨的擁護就開始減弱了。我相信，由於我們政策的宣布，蘇聯希望擴展到柏林的勢力範圍，被迫後退到波蘭控制區。

當我們回到巴黎時，好幾個歐洲政府的代表向我表示，他們對於美國對德方案的贊同。貝文先生亦會深表賀意，他說其中有大部份是英政府準備提出的，莫洛托夫沒有提到這件事，不過據他的屬員說，我的演說在蘇聯大使館沒有受到喝采。

邱吉爾從瑞士打來一個賀電，因爲他大約於一週後要路經巴黎回到倫敦，會問起是否可以會晤。我立刻告訴英大使說，我很高興到大使館拜訪邱吉爾先生。英大使很用心的保持邱吉爾在巴黎行縱的秘密，邱吉爾剛剛在日內瓦和比利時京城受過盛大歡迎，對於保證秘密的種種步驟，反覺有些討厭。我亦感到同樣的煩燥，但是這次保守秘密是個成功，我從旅館赴英使館和邱吉爾談話二小時，竟能跳過絕頂警覺的美國記者的耳目，這件事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星期六下午，美國記者按照法國習慣去休息了。邱吉爾只想表示對於美國立場的贊成，和討論幾個時局問題，他並不批評英政府的任何官員，同時我猜想，因爲他是反對黨領袖，他並沒有得到英國外交的情報，感到不大快樂，我們談到許多事情，在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史末資元帥來訪，我們又繼續討論世

界問題，以後我就向這兩位偉人告辭，希望他們愈老愈健。

對於有幾位法國政治領袖，斯圖加特演說使他們失望，因為反對魯爾·萊茵區的分割，並堅持德國中央政府的成立，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保證在和會中支持法國對薩爾的要求，並維持在歐洲的佔領軍，因此感到高興。因為幾個法國政治領袖的反響，我接受巴黎美國俱樂部邀請的機會，重申我們維持歐洲安定和平的決心。在這篇十月三日的演辭中，我說：「過去美國已盡力之所能，站在歐戰漩渦之外，所根據的理論是美國應只管自己的事，歐洲的事與他無干，可是這條路走不通，美國人民已經發現，當一個歐戰發生在未結束之前，我們自己的安全與和平，已經無可避免的牽涉在裏頭。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如果必須要美國協助結束每一次歐戰，還不如盡他們的責任來防止歐戰的發生來得好」。接着我向法人力陳我們建議的四十年和約的價值，我說「美國不但願意看見在約和之前德國被解除武裝，而且願意取得保證在和約締結四十年之後，德國依然沒有武裝，只要這樣的和約被執行，魯爾決不能成爲德國與歐洲的兵工廠，這是我們所建議和約的首要目標」。

「美國是堅決的反對德國軍事力量的復活，我們亦反對控制德國的角逐，這樣會再給德國分化和征服的力量，我們不願意看見在東方西方爭霸戰中，德國成爲工具或伙伴」。我亦解釋，我們在德國正在培養地方責任的意識，使人民注意到各邦，少留心到中政府。「我們願意看到由各邦產生的聯邦政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創造的各省」。我這篇演說再度向法國人民保證，美國願

意看見一個新生的德國，能够尊重國內的人民自由，同時不威脅鄰國，尤其法國的安全。

馬歇爾國務卿在一九四七年春季在莫斯科宣稱：斯圖加特演說，繼續代表美國的對德政策。

蘇聯的政策仍如莫洛托夫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所透露的一樣，沒有變化，外長會議的最後一天，也就是莫洛托夫宣布對德政策後二日，我和國務院的兩位高級官員出席蘇外長的宴會：在席終時我對他表示：他既是事先知道不會同意討論德奧和約，我對於他的不坦白相告深表遺憾。因爲這樣做，可以避免許多一事無成徒傷感情的激辯，他很客氣的承認我的見解正確。我就問：「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對於德國問題的真正意義」？他說：蘇聯需要在雅爾達會議時的條件——一百億美元的賠償，並「參加魯爾區工業的四強管理」。從那個時期起，有許多關於蘇聯對德國野心的種種推測，而蘇聯的代表亦可能爲本身及其附庸提出其他的要求，但我深信莫洛托夫那一天晚上的聲明，確可代表紅軍高級指揮的真正願望。

在這兩項條件之內，蘇方對於參與魯爾工業的管理，有着更多的興趣。這個地區煤鐵的蘊藏，使蘇聯把它認爲歐洲的兵工廠。他們要參加決定魯爾區產物的分配。我們在盟國管制委員會的經驗，證明這個建議之何等不切實際，兩年多來，這個委員會努力爲各佔領區之間取得若干諒解，但是管制委員會各委員之難於取得諒解，一如外長會議中各代表。我們在朝鮮有另一個實例，在那裏我們被假定與蘇聯共同治理，但是直到七月，過去因雙方不協議而於一年前停頓的談判，始告恢復。如果除了空費數月談判之外，在任何方面都無法取得協議，四國共管魯爾的工業

是不切實際的，對於這區的任何工業，他們會有很少的協議。因此，四國共管將有效地摧燬魯爾的工業。反之，如果有適當的監督，它對於歐洲的經濟健康是必不可缺的。

在討論魯爾問題時，法國表示贊成由西歐的盟國政府共管，而不提蘇聯參與的事，至於不包括蘇聯在內的魯爾國際共管，要希望蘇方同意是太不現實的事，沒有那國政府鄭重討論過。

魯爾區的工業，應與德境內的其他工業，在和約中同樣的考慮，一旦和約取得協議，德國工業的管理應發還其所有者負責，我們的利益和責任，是要求這些工業不再製造軍火，要做到這點，可以採用我在四十年和約建議中的聯合監督辦法。我想這是蘇聯反對這和約的理由之一，他們知道有許多人主張國際共管魯爾，如果四十年和約一旦通過，極大多數人將感到滿意，這樣會減少蘇聯取得魯爾區工業的機會。

智慧和正義感均將阻止美國在魯爾問題及賠償問題上，遷就蘇聯的要求。可是莫洛托夫說過，這是任何和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為我們相信、和約及早締結、對於歐洲復興極端重要，我們被迫去考慮必要的措施。

第一個步驟業經採取，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巴黎，我宣布合併各佔領區，不論蘇聯同意與否，這是我們最後一着棋，當時我表示，希望在「這次會議」中，大家能同意建立德國中央行政機構。以謀德國的經濟統一。爲了滿足皮杜爾外長的恐懼心理，我表示我們同意法國繼續管理薩爾，直至德國的西疆決定爲止。如果會中不能同意成立中央機構，美國另有建議。德國沒有一個

佔領區是完全自給的，如果把兩個佔領區作爲一個經濟單位來處理，一定能改善現狀。我指出：英美佔領區內的官吏，近爲交換若干產物，曾經討論過共同的農業政策，當時我宣佈：「四強成立協議實施波茨坦協定，須將德國作爲一個經濟單位治理，美國願與其他佔領國政府合作，將各佔領區作爲一個經濟單位處理」。『現狀之繼續將造成通貨膨脹及經濟癱瘓。如此，將使佔領國費用增加，德國人民亦因此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美國不願意分担這種情勢延長的責任，我深感我們的責職是爲佔領國尋求合作之道，將德國作爲一個經濟單位治理』。

翌晨，貝文外長宣布英政府原則上同意美國的合併建議，以後克萊將軍就和英方代表勞勃生中將在柏林進行談判，直至在紐約舉行外長會議爲止。

在柏林與華府的談判中，所有的問題俱獲得協議，只有每年虧空由各國政府負擔這一點，懸而未決。一九四七年美國佔領區的虧空估計約二億美元，英軍佔領區約四億美元，英美雙方代表都相信虧空額將累進的減少，而合併的佔領區可以在三年之內自足自給。這個問題放在貝文和我的前面，貝文告訴我：英國財政部的官員認爲，英國沒有充分的美元支付未來三年的虧空，因此，希望美國能負擔百分之六十的負擔。我答覆道：因爲英軍佔領區的虧空數字比我們大得多，所以當我們同意平均負擔時，我們已每年多支出一億美元，因此負擔百分之六十的建議，礙難接受。我接着說：我國在德國代表的自信心也許是錯誤的，可是他們堅決的相信，如果由他們管理英軍區內的工業和煤礦，他們將消除大部份，即使不是全部的虧空。於是我十分嚴重的建議：如

果英美交換佔領區的話，我們願負擔百分之六十的虧空額。

貝文笑着回答說：「你知道英國政府不會同意這件事的」。我承認我確懷疑英國會把工業中心區和它豐富的資源，來交換我們以農業及風景爲主的佔領區。可是我又指出，我的建議可以幫他給逼迫他的財部官員一個好答覆，於是貝文才同意平均負擔費用。我是想到把英國當作窮親戚和低級的伙伴，使他們負擔百分之五十以下的費用，不是件聰明的事情，因爲他們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如此會容易引起憤怒，看起來還是從其他方面援助他們比較好。

英國應付虧空的困難不應加以小視，在一九四六年英美借款成立時，他們沒有想到要用美元購糧供給德國，這是一筆沒有預料到的大支出。這件事影響我對於另一點的决定。所以在我們開始合併佔領區內的輸出時，我支持英國的主張，結果省了他們三千萬美元。

我曾經希望法國參加我們的合併計劃，所以我宣布對於薩爾的决定。法國希望蘇聯亦能同意薩爾的建議，但是莫洛托夫一再反對，這是令人失望的，因爲我知道法國聯合政府不願採取得罪國內共產黨的行動，莫洛托夫之拒絕協助一個普遍支持的法國目標，很使法共受害，他們很願意有另外一個事件來分散對於薩爾問題的注意。最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書面勸告法國政府，並謂在和約締結時，我們會支持法國對於這區的要求，英國亦提出同樣的保證。但是，法國政府沒有參加。

我希望法國不久能接受我們的邀請，把他們六百萬人的佔領區與英美佔領區合併，使四千六

百萬人民能在三年中自足自給，這種建議對蘇聯同樣有效。

但是盟國的合作並不是蘇聯計劃的一部份，蘇聯政界對合併這事大聲抗議，在大戰結束之後恐怕沒有一件事受過莫斯科如此嚴厲的攻擊。這表示否決權並不是到處有效，亦表示我們不會一味遷就莫洛托夫的想法，同時可以表示西方強國亦願以行動支持他們的利益，與他們相信是歐洲亦是蘇聯多數人民的利益。

我們的次一行動，必須是和德奧締結和約，而問題的關鍵是德國。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時候，我在準備對德和約事件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協議，是在十二月紐約開會時考慮這個問題的諾言。在紐約，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協議，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莫斯科會議中處理德奧問題。可是在莫斯科經過六星期長談後，德國問題事實上還是和去年七月間一樣，外長們決定休息至本年十一月間，再繼續討論。除非蘇聯在十一月間改變態度，否則又將沒有協議，休會到一九四八年再開會。貝文、皮杜爾、馬歇爾三位，在莫斯科盡力在重大問題上謀致協議，但是因為蘇聯的反對而沒有成功。

我們必須記得莫洛托夫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巴黎的聲明：「即使德國政府成立，亦必須於數年之後與他們締結和約，方是明智的舉動」。我們必須回憶他另外一個聲明，說我們務須着急，「我們應當把明年的光陰，用來想想對德國應該做些什麼工作」。

世界輿論也許逼得外長會議下次在倫敦開會時，對德國問題鄭重考慮，但是我們應該明白，



即使蘇聯會最後同意邀請各國召開和會，事先他必然利用否決權的武器，從英美法三國取得讓步。我們已經有過這類經驗，這個印像會保持得很久。印度人的說法很正確：「欺騙我一次，是你的恥辱，欺騙我兩次，是我的恥辱」。

因爲是我首先向杜魯門總統建議，把外長會議成立作爲起草所有和約的機構，任何人可以明白當我下這個結論說認爲這個機構不能符合設立的本意時，是如何的勉強。我最初建議時，是假定外長會議中各代表都急於取得和平，我們從沒有想到這個有價值的原則，會被一個會員利用來強迫他人接受他的意見。我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點，是由於我們假定大家有早日恢復和平的共同目標。現在我不再確信是如此了。同時，如果蘇聯領袖們繼續用各種方法去阻撓和平的恢復，繼續駐大軍在德、奧及其鄰近國家，我們將尋求其他締造和平的方法。

在德國問題的解決中，可爭議之處較之義大利及巴爾幹和約爲多。因此，外長會議中的任何一員，很容易延遲其工作並能提出動聽的理由。即使由於我們的委屈求全，使和會的請柬能够發出，和會的進度亦不會迅速。這次巴黎的和會是從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廿九日開到十月十五日，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的假定，對德和會將開得更長。假使我們採取過去的途徑，和會的建議將先送外長會議，對於是否應包括在和約之內作一最後決定，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在最順利的情形下，歐洲和約締成的展望，是在遙遠的將來。爲了和平與安全的利益，爲了盟國和過去敵國百萬人民的政治、經濟的福利，我們不能允許如此長久的延遲。

馬歇爾國務卿在莫斯科會議時宣布，如奧國和約不能獲得協議，美國將考慮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十四條規定，將此事提交聯合國大會。我了解他的態度，且深表同情。在討論義大利及巴爾幹和約時，我遇到一個相類似的環境，我在用無線電廣播中向美國人民報告時，曾作類似的聲明。可是在再度考慮之下，我覺得這個辦法沒有什麼幫助。聯合國憲章並沒有給全體大會以行動的權力，它只有建議的權力。過去我曾經希望大會提出建議後，在建議中反映出來的世界輿論的威力，將誘導蘇聯去接受，現在我是傾向於相信此事不會發生，蘇聯將向全世界辯論說，大會中許多國家根本沒有對德作戰。蘇聯的發言人將指責重要而有爭端問題之決定，例如魯爾區的管制等，將被南美及阿剌伯等國家的投票所決定，而這些小國對於戰敗德國，並無重大軍事貢獻。使聯合國大會成爲這個爭議的中心，將給與一個不願承受的負擔，這類責言將嚴重的損害它的威望，並減少舉世人民對於牠的信心。

我們應該採取另一個行動的途徑，美國應當邀請構成外長會議的國家（當然包括蘇聯在內），同意儘早在一九四八年內舉行和會。

在莫斯科時，馬歇爾國務卿建議下次開和會時，應包括一切參戰的國家，他建議一項決議案之被採用，不但須有二份之二的多數通過，且須有在大戰中作軍事貢獻的國家三分之二多數同意，這項建議符合我們自始主張的目標，就是由共同作戰勝利的聯合國全體參與和平的締造。同時，美國所建議的投票程序，可以阻止僅在戰爭中作經濟貢獻的國家，在和會中具有不應有的權

力。

假使外長會議一個會員反對我們及早召開和會的建議，其他的份子可以進行召集。召開的方式，是使不同意的會員，如果一旦改變宗旨時，以後仍有機會參加，而成爲發起人之一。舉個實例來說，法國當初沒有做舊金山會議的發起國家，但，以後成爲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會員，在上述情形之下，其他國家應盡力催促不同意的國家，來發起並參與和會。

每個發起國家應各自提出和約的草案，無疑的，在和會開幕前，應儘可能先在許多項目取得同意，德國投降到現在，已經快兩年有半，德國問題在這個時期內，已被四強一再討論，在波茨坦會議中，四強中的三強已就政治、經濟和賠償問題有所討論與締結協定，法國最後表白了它的見解，如果在這種努力之後，四強還摸不清楚他們的立場，他們將永遠不會有結果的。在巴黎和會中，我們對於處理草案和其他程序問題，已有充分的前例。像在巴黎和會時一樣，和會應該由它的會員中，任命幾個委員會，來考慮發起國所送來和約草案的各個不同部份。例如一個委員會考慮政治問題，另外一個考慮經濟問題，再有一個研究軍事問題。如果需要的話，各委員會還可設立附屬團體，在職權範圍內，各委員會可就自己的部門準備和約的草案，在這種方式之下，凡是對德作戰的國家，在起草和約時都能參與。假使我們最後終要召開和會，並像巴黎會議時由委員會研究草案，爲什麼不就在今日召開和會？

我們必須鄭重表明，我們並不想嘗試單獨議和或是操縱和約的條款。我們亦並不企圖強要和

會接受特別的計劃，而是由我們提出計劃，並催促英法蘇同樣的提出他們的計劃，一切由和會全體來作決定。

鑒於過去的經驗，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可能性，就是蘇聯可能拒絕參加和會，這對於舉世愛好和平的人民，自是深表痛心，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希望此事不致發生，可是不必因這個可能性而致停止我所建議的步驟。

在和會開幕的時候，合併的英美佔領區可能是在成功的進行着。同時，我希望即使蘇聯佔領區不參加我們，擁有六百萬人口的法國佔領區已和四千八百萬人口的英美區能够合而爲一。和約可由已合併的佔領區內的政府簽字。事實上，德國批准和約有好幾個方式，馬歇爾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建議，當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接受憲法時，將被請同時投票決定成立那一個政府來接受盟國的和約，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如果這點辦不通，我們可能考慮把和約本身交由德人來一次公民投票，那時德國人民將自行決定，還是接受和約？還是無定期的在軍政府和軍事佔領之下生活下去？最後一點也許要造成一個印象，就是這和約本身必需是德人所願意接受的，但這個印象是可以被另一好處所抵償。將來我們所接受的德國政府，可以因爲沒有締結大多數德人認爲壓迫性的和約，而避免了政治上的困難。而且在現狀繼續之下，我不相信德人會把和約當作壓迫他們的。

在無蘇聯參與而採取行動之前，我們應該再度邀請蘇聯政府一次，和我們共同參加和約的訂立。

這個和約將和義大利巴爾幹和約一樣，規定不簽字的國家不能分享和約中之任何利益。所以如果蘇聯拒絕簽字的話，他們將決不能取得西部佔領區內任何賠償支付，同時，亦不應該接受因和約而必然產生的利益。

如果有人問，假使蘇聯拒簽和約，我們下一行動將如何？

假使蘇軍自德境撤退，其他國家自無採取行動的必要。如果紅軍不撤，我們將被逼採取最後的手段，把此事提交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這問題不再是起草和約事件（這件事不在聯合國職權範圍內），而是我們已經面對一種和平將受危害的局勢，過去聯合國之創造就是爲了要應付這種局勢。

蘇聯已經表示過忠於大西洋憲章，而憲章中載明簽字國不作領土的擴張。在憲章中她莊嚴的保證「不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來危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或是採取任何與聯合國目標相牴觸的態度」。

德國東部，像德國的其他部份一樣，軍事佔領是臨時性的。到和約締結時爲止。如果在盟國訂定和約之後，而蘇聯仍是駐屯大軍，則就是蘇聯要在這些土地上無限期留駐意向的明證。這種行動，將威脅世界和平，聯合國應該要求蘇聯從德國撤退。

## 第十一章 向亞洲和平邁進

我們必須永遠不要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太平洋爆發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米蘇里艦上閉幕的戲劇，是在一九三一年同月開場於滿洲。繼之而發生的一幕又一幕，是我們在美國的人們所關注的——首先是義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侵入阿比西尼亞，繼之又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的內戰，一九三七年日本的進攻中國，一九三八年奧地利與捷克的淪陷，以及一九三九年希特勒的進攻波蘭。但是所有這些事件已把我們引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悲慘的珍珠港事件。

假使我們把歐洲視做可能的世界大戰的導火綫，那末我們就必須把亞洲看做一團很大的潛伏着的火種。那里佔着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民，亟待文明的提攜。所不幸的，中國一戰未已一戰又起。我們的熱忱努力，至少在眼前已經失敗。而日本以吸收近代文明佔有先着，進步却很顯著。日本人民從封建和傳統的經濟制度，及宗教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一切革新，無不為民主社會之發軔。凡此進步，要須歸功於麥西阿瑟元帥的指揮有方，而我們維持日皇制度之存在，以執行最高統帥的命令和政策，也是已著成效。

七月十七日，杜魯門總統和史達林元帥初次會面，討論蘇俄向日作戰之舉。史元帥說，他還沒有和中國締約——這是蘇俄對日宣戰的先決條件。在會議結束之後，將和宋子文院長，繼續談判。關於大連港的主權，是一個尙待解決的問題，杜魯門總統宣稱，美國堅決要大連保持爲通商港。史達林回答道，如果蘇俄獲得其管轄權，那末這個狀態是可以實現的。當時我就指出，根據羅斯福總統所參予的雅爾達密約，中國應保持掌握大連的主權。

七月二日，陸軍部長史汀生曾以具有卓見的備忘錄咨呈總統，爲向日提文的張本。總統根據此備忘錄，就起草中、美、英三國的聯合宣言。總統和我會一再斟酌，邱吉爾首相的若干建議亦經採納。這個邱氏所同意的宣言，除了關於日皇將來的地位問題沒有涉及之外，其綱要即係根據史汀生部長的建議。這個提議式的宣言，就送給蔣介石氏簽署。

未幾邱吉爾，艾德禮二氏返英，杜魯門總統也利用這個機會，往法蘭克福的美軍佔領區總司令部，我也隨着同去。當我們返抵「小白宮」的那一晚，有兩件電訊等着總統。一件是威耐德大使報告邱吉爾競選失敗的驚奇消息，第二件是蔣介石元帥認可那現在稱爲波茨坦的宣言。這宣言就立刻發表公布，並以一份由專差遣送給莫洛托夫先生。

當晚深夜，莫洛托夫氏來電話，要求把這宣言擱置二三天，當告訴他說這宣言已經宣佈時，他似乎煩惱了。第二天，我解釋給他聽，在這宣言發表之前，所以未曾送他過目者，因爲我們不要叫蘇聯由於向猶未對之作戰的國家，提出宣言，而感覺困難。他沒有說，他希望有所修改，不

適單純地說，我們總得先和他商量一下呢。

兩天之後，七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再來訪晤。原來商決，總統及我將和他並史達林元帥相見，但莫氏告訴我們，史達林那天是病了。他教莫洛托夫先生和我們討論蘇聯參戰的直接動機。莫氏說：蘇聯政府以為，最好由美、英，和其他聯合國國家，向蘇聯提出參戰的正式請求。他補充說，蘇聯政府當然以為在參戰之前，應先和中國政府締約。

這個請求對我們便是個問題了。蘇聯已與日本締有不侵犯條約。蘇聯政府又曾與希特勒訂有同樣條約，但是破壞這個條約的是納粹黨。我們不信美國政府在沒有良好和充份理由之下，應該要求其他政府去違反協定。蘇聯業已於幾個月前通知日本，對此約不擬續訂，但是有效的期間，還近近乎一年。總統對此覺得煩惱。

我們接獲報告稱，宋氏告知他的政府，蘇聯在雅爾達密約之外，有所要求。由於談判是根據了羅斯福總統的囑付而進行的，我倒發生了興趣。深恐宋氏受不了蘇聯的壓迫，在沒有明瞭我們的態度之前，也許再有所讓步。因之在獲得總統的認可之後，我就通知中國政府說，我們不勸告中國在雅爾達密約的條件之外，作任何的讓步。

中國和蘇聯後來終於締了約，但是事實所揭示的，我們對於大連所關懷的却沒有看錯。在日軍戰敗後二年，大連仍舊不是一個自由港。在一條船要駛入這港口之前，先要獲得莫斯科方面的准許，不但船隻如此，連船上的人也是如此。



在後來的會議中，史達林對總統和我說，駐莫斯科日本大使會探詢蘇聯的意思，是不是願意担任結束這次戰爭的居間人。史達林說，這個請求，並不是表示日本，願意像同盟國方面要求的無條件投降；語氣非常籠統，因之莫洛托夫僅僅對日大使說，這件事不久當再和他討論。史達林說，後來日本大使又送來了一件公文。裏面說道，日皇願意遣派近衛往莫斯科，表示日本意欲結束戰爭，假如要求她無條件投降的話，日本一定以全力作戰到底。史達林補充說，因此會去了一封信給日本大使，說明關於這一點，因為含混得很，並沒有特殊的建議，無從予以確切的答復。杜魯門總統對於史達林的措置，表示贊同。

此時史汀生部長告訴我們，他已接獲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試驗原子彈的報告，這炸彈已經盡如人意，一旦使用的話，定能將早已立腳不定的敵人，一舉殲滅。在沒有試驗之前，我們約定。如果證明成功的話，一定先給日人以最後的嚴厲警告，然後使用。

至於我個人呢，我可以很坦白的說，蘇聯在東部德國的行動，和在波蘭、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違反雅爾達密約。假如蘇聯決心不參戰的話，我真要深覺滿意呢。日本雖則一再堅持不願無條件投降，我却相信原子彈定可成功，而令日本在遵從我們的條件下接受投降。我深恐紅軍進入滿州後將發生怎樣的事態，在他們撤離滿州之前，我的恐懼實現了。

當蘇聯參戰的雅爾達條約成立時，軍事局面完全改觀，羅斯福總統和我們的軍事領袖們，需要蘇聯來作戰。沒有一個想得到雅爾達會議後我們所遭遇的種種困難。無論如何，條約業已締

結，我們只有遵守而已。

總統答復蘇聯的信，由我起草。開頭提起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蘇、美、英、中聯署的莫斯科宣言曾規定，爲維持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四國間應隨時相互商洽。其次又提到聯合國憲章一百零六條，及一百零三條條文：「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這封信的結語是：「憲章雖然沒有正式批准，但蘇聯代表在舊金山時，却已同意蘇聯政府將爲安全理事會會員之一。鄙意在莫斯科宣言與憲章條款之下，蘇聯政府正宜表示其願意與其他強國商洽合作，對日作戰，以期達到維持各國間的和平及安全目的」。總統後來告訴我，史達林元帥對此曾表示其很大的感謝。

八月七日下午，我們返抵華盛頓。前一天我們在船上已獲悉第一棵原子彈已經擲在廣島了。我們回來後的翌日，長崎也遭受原子彈轟炸，從八月九日開始，蘇聯向日宣戰。八月十日清晨，瑞士政府轉來日本預備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公文，「具有這宣言並不含有損及日皇爲最高統治者，任何要求的默契」。

這消息來的時候已在夜間，到了翌日一早，才來訪總統和我。我立刻到白宮去，陸海兩部長不久也到了。李赫海軍上將主張應立刻接受日本的提議。我對總統說，容再考慮一下去回答這文書。

我說：「我們爲何要退讓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這要求在投擲原子彈和蘇聯加入作戰之前提出的。如果有什麼條件要接受的話，應該由美國，而不是日本，來提出」。總統同意我的見解，命我起草答復。文中包括三要點：（一）自投降時起，天皇及日本帝國政府統治國家之權限，置於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之下。（二）日皇應命令及確保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爲履行波茨坦宣言，簽證於投降條件，並立刻命令日軍停止作戰。（三）根據波茨坦宣言最後成立日本人民自由意志之政府。

八月十一日送出了這個復牒，我深信日本必能接受的。十四日下午四時後，才接獲我們駐瑞士大使哈立生的電話，通知我日本回文的內容，我就令陸部把通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的無線電路接通，就把哈立生的消息通知三國的外長。五時半，我把會話的經過報告總統。一切措施均經核准。六時，瑞士使館外交代辦葛拉斯里氏來訪，把日本來文讀給我聽。一小時後，杜魯門總統向全世界宣佈，這次最可怕的戰事的結束。

日本在投降之前的一切，將來當有詳細的紀載。據向日本高級官吏探詢，和所得的公文材料看來，日本在投降之前五星期，對於史達林的意旨，猶無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中國外長宋子文氏到了莫斯科，日人才疑到蘇聯的意向。那時外相東條曾說：「我們知道宋氏在莫斯科受到優渥招待，並與史達林有所商討……也許有什麼條約要締結」。可見就是在那時候，日本的情報工作效率並不强。

還有從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給日外務省的公文看來，他倒是一個實事求是，和有作爲外交人員。他告知日本政府說，他所接到的文書，在性質上過於含混，蘇聯政府決不會加以考慮。

假定只憑美麗的詞句而沒有實質，他們決不會被說服的。除了日本預備投降之外，曠廢時日的去試探蘇聯政府的意思是徒然無益的。蘇聯既力主德國無條件投降在前，她當然順從英美所提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佐藤說，他明知他的見解與聖上的懿旨相悖，但是即使「罪該萬死」，「我還是要保留數千百萬，徒死無益的生靈」。他更加强地說，「日本除了無條件投降之外，不再要有其他選擇」。

如果日本政府真能聽從佐藤之言，而無條件投降的話，投擲原子彈誠非必要。但是軍閥們還夢想着和平談判，置佐藤之忠告於腦後。七月廿一日，日本政府訓令其駐莫斯科外交代表道：「在任何情狀之下我們不能接受無條件投降。即使戰事延長，流血更多，在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下，我們要遵從天皇的命令，對敵人作戰至一兵一卒而後已」。

日本政府不再經由瑞士或瑞典，而直接和蘇聯來往，以便通知蘇聯，他們準備全部接受蘇聯在遠東方面的一切要求。他們希望，由於應允蘇聯的要求，可從而在和談中獲得幫助，他們還希望由於這樣的商談，去切實找出蘇聯會不會參加作戰。

直到原子彈擲投於廣島之後，日本內閣才決心投降。據日本外務省的紀錄，八月十日蘇聯駐東京大使咨文東條，蘇聯已簽署波茨坦宣言，並與日本成立戰事狀態。東條接着便把請由瑞士轉

交美國，表示日本除了保持日皇統治權之外，願意接受投降的文書副本，給蘇聯大使帶交蘇聯政府。

日本的投降較我們理想中的時間爲快，但是我們已早有準備了。國務院、陸、海軍部等組了一個委員會，準備處理投降及佔領的一般命令。有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就是誰配去接受日本的投降呢？諸強都同意麥克阿瑟將軍堪以代表他們和美國去投降。但海軍方面對此表示異議。福萊斯特海軍部長綜合他們的意見爲：太平洋作戰海軍是主幹，海軍士卒從珍珠港起，一直一個島一個島的打到東京；他們把日本的海軍給消滅了。因之麥克阿瑟可爲聯合國簽證降書，而尼米滋上將應該代表美國簽字。我同意福氏的理論，海軍自應參予其盛，並答應他設法一切。當夜，福萊斯特從電話中建議，接受日本投降的儀式在「米蘇里」戰艦上舉行。我深切了解，這就是陸軍所謂的「海軍噓頭」了。假使他僅僅的說「一隻戰艦」，這問題辯論之處尙多。但是他既提了米蘇里，我知道這件事獲得解決了。當總統接到這項建議時，自然，他以爲這個主意再好沒有了。這樣，一件海陸軍相持的事情，總算順利解決！

可是蘇聯人民也許不會知道福萊斯特的勝利，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們在莫斯科開會，聖誕前夜，史達林元帥款待我們吃飯之後，放映蘇軍闖入滿洲的電影。裏面講到：日軍的備戰僅僅是針對着蘇聯；滿洲人民熱烈的歡迎紅軍；最後是投降條件的簽訂。根據這張影片，投降典禮中的主要參加者爲日本和蘇聯的代表。最高指揮麥克阿瑟將軍倒在後邊。這一個場面的說明爲：「在

一艘戰艦上簽降書」。並沒有說明這是「米蘇里號」，甚至連這是一艘美國船也不提。全部的場面，很可以叫蘇聯人相信，這是蘇聯和日本兩國間的戰事結束，而在蘇聯軍艦上簽降書。蘇聯重視電影宣傳由此可見，而蘇聯政府現在歐洲各國推映蘇聯影片，在我看來亦不足怪了。

我們負担着擊破日本軍事力量的大部份責任，常以對日作戰即爲對軸心之戰，而希望佔領日本應由聯合國負起責任。早在八月二十二日，我們邀請蘇聯，英國和中國，來和我們共同組織一個十強諮詢委員會，以期實行波茨坦宣言和投降條款的目標。除了英國之外，蘇中兩國很快的接受此議。

九月中外長會議在倫敦舉行之初，我就和貝文商討，以期獲得兩國間的洽協，商談尙在半途之中，却又生出了一個枝節。莫洛托夫奉了莫斯科之命前來看我。他對於投降條款之提出予以責難。尤其對於日軍的復員指摘更甚。他說僅僅把日軍解除武裝而遣送他們回國，是危險的；日軍應該作爲戰俘。我們應該效法紅軍在滿洲對付日軍的方法，就是叫他們做工。我會向莫氏說，波茨坦宣言中規定，「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沒有人可以正確的說，蘇聯方面的日本戰俘究竟有多少。一九四七年中，最接近的猜想大約還有五十萬人。運輸上的困難雖然遲緩了日俘的遣送，可是他們總是返國的呀。

但是在倫敦之時，當莫洛托夫講到日軍應該當作戰俘時，他甚至表示，我們的政策有使日本恢復其侵略的危險。副部長鄧恩氏當即指出，我們提議所組織的遠東委員會，可以使莫氏所代表

的政府，有機會表示對日政策的意見，包括戰俘的解除武裝問題在內。我說，我們應該與對付德人一樣，對日本也來一個非軍事化條約。

兩天之後，莫洛托夫主持開會時，提議成立一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由美、英、蘇、中四國組織，以美國代表爲主席，其權限較貝文君所建議的要大得多。其後又經兩次會議，我總以討論組織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爲不當，其他會員因爲急於要進行歐洲條約，支持我的主張，這時候莫洛托夫的要求，又是他緩兵之計中的一着而已。

九月廿六日，我發起和貝文、莫洛托夫兩位會談，尋求解決關於法國和中國參加會議的權利，我們所持的不同見解，但是莫氏立刻又回復到蘇聯主張成立管制日本委會的建議。麥克阿瑟將軍所計擬中的各種政策，使他發生「蘇聯代表繼續留駐東京，是不是對蘇聯有用處」的疑問。這次會議既以締結歐洲條約爲前提，我不擬再討論日本問題。我對莫氏担保，回國之後，一定澈底辦理此事，並與他保持聯絡。

他說蘇聯代表團不明白，爲什麼在目前的會議中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他更要問一問，報載美國人在日本所找到的一二十億金元是否屬實，而與目下的局面有沒有關連。要是英、法、或中國的外長有此聲明，不無叫人要想到有侮辱的意味上去。但是，由於表示的方法，更其以蘇聯在任何地方行動的見解來看，我的結論是，莫洛托夫並無侮辱之意。

在波茨坦的時候，莫洛托夫承認紅軍確曾搬運過大量的財產，並會建議不妨在他所要求的賠

償中減去十億元。雖則莫洛托夫在波茨坦，對於這件事似乎不無感到偏促之處，數星期之後，紅軍又在滿州把德國所做的事如法泡製了一下。蘇軍在他們盟國中國的領土上，把可以移動的東西，囊括而去。因之這是很可以了解的，當莫洛托夫看到美軍找到二十億金元，後來證明為不確的消息時，他以紅軍在這種情況下所做之事，我們也必能同樣的做之心理來測度我們。就是說在資財沒有藏到美國去之前，只管搬運金子，而拒絕討論日本事件。

在倫敦我再想法子和莫洛托夫作私人談話，力言設立遠東諮詢委員會，為考慮如何管理佔領日本之第一步。但是我的努力，未獲成效。同時我力促貝文，同意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的建議設立遠東諮詢委員會。我非正式同意，開會時我們將擁護在東京及華盛頓兩地開會，印度又應加入為會員。英國議會授權貝文接受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希望莫氏放棄新建議，仍舊回復到他所同意的八月二十二日我們的建議。我立刻寫信給他，內稱：四強既已同意，委會應於十月三十日舉行會議，我希望蘇聯能派遣代表參加。他的回答是：自蘇聯同意我們八月二十二日的提議以來，情勢業已變更，他所代表的政府，現在請求成立一管制委員會。當我回返華盛頓時，還不能決定在委會首次集會時，蘇聯是否有代表來參加。

這局勢是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們和蘇聯關係的一斑，使我真有不勝其煩惱之感。我覺得雙方若能對此問題繼續磋商的話，當可有調和之望，但是在這幾個星期中，雙方並未交談。

為促進和平工作之得以順利進行，打開倫敦會議的僵局起見，我們只得遷就地把締結歐洲和



約會議的提案加以修改，由總統出面，以措詞十分婉轉的信致史達林。

十月二十五日，哈里曼大使在加格里以總統的信面呈史達林，當他看到這封已經譯爲俄文的信件時，開口就說：「日本問題並沒有提到」。我們於接獲哈里曼的報告後，立刻覺得在倫敦的估計錯誤了。當時我們想莫洛托夫的延宕政策由於和平會議而起，現在史達林的問題，却證明他們對於日本格外的惱怒。

哈里曼同樣的感覺驚異，所幸我們在倫敦時，他也同在，得以八月二十二日的提議從詳告訴史達林。他聲明他並未受權磋商日本問題。他更說明，他知道我非常關心地在計劃一種方法，以便對於日本的政策，隨時得以通知蘇聯及其他同盟國家並互相商討，假定美國在執行佔領政策時，不受任何牽制的話。

雖則哈里曼力把這談話挽回和平會議的問題上，史達林的心目中却仍以日本問題應佔先着。翌日，他和我們的大使繼續談話時，一開始又談到這件事了。

他說，他不願意在遠東諮詢委會開會時派遣代表，誠如莫洛托夫已在倫敦說過，自從接受我們的邀請以來，局勢已經改變了。事實上，史達林已把他在東京的代表德拉夫揚科將軍召回，他說，這是因爲他的代表既無人去通知，也從未參加商討，在此種情況之下，麥克阿瑟以盟國名義所有的舉動，他自無從接受其責任了。

史達林宣稱，蘇聯被看待爲一個附庸的國家，而不像聯合國之一，這對於他的國家，未免有

損威信。他指摘日本的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已容許對蘇聯加以揶揄；政府的改組也未會通知他或和他商量；日本政府封存他們的存款時，並未有所聲明。

哈里曼解釋道，麥克阿瑟將軍執行的投降條件，係蘇聯所同意者，所有財產暫加封存，以待將來聯合國方面的處分。他指出在投降條件沒有簽訂之前，我們早已提議組織諮詢委員會，以考慮像元帥所提到的事件，他力促蘇聯派遣代表，出席將在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以免隔膜。

史達林並不滿意，他說，他在東京的代表，被視做爲「一件傢俱」，他恐怕如果再派代表出席華盛頓會議的話，爭執勢必重起。他極力主張，要是美國希望與蘇聯成立協定，除了兩國間從長磋商之外，別無他途。他對於戰事期中，蘇聯在滿洲邊界駐軍三十師，以牽制日軍七十師的事實，提出來叫我們注意，假定他們的建議得以接受，這些軍隊隨時可以協助佔領日本的工作。

因爲這個聲明，在討論日本和約時，無疑地將一再的聽到，這里倒不得不記下一筆，就是史達林元帥的聲明固然沒有錯，而日本駐紮在滿州邊界三十或四十師的兵力，沒有嚴重地影響到他們的作戰能力，也是事實。由於美國海軍作戰的成功，日人在作戰早期間，已缺乏船隻運輸兵力和給養到太平洋各戰場去。爲了兵力無法活動的緣故，日本儘可把兵留駐在滿洲邊界或任何地方。日本可能把這些兵運往中國在陸上作戰，但是我們現在曉得，即使如此，也不致根本更變這場戰事的結局。

我們接到哈里曼關於這場談話的報告之後，遠東諮詢委員會首次會恰好也就開幕，選舉了美

國代表麥克麥埃將軍爲主席。其後休會一星期，以便蘇聯得有機會重派代表參加。事實上，這會開幕之始，並不能多所活動，英國和澳洲雖經同意合作，而對於總統所批准的遠東委員會，和聯合國會議提案，中間又經多次的同意爭執。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這新的遠東委員會在華盛頓開始發生作用。這會有權決定管制日本的原則，由美國政府根據本會的決議，指令最高聯合國統帥執行。這作用就是在未經我們同意之前，不能採取任何基本政策，而在委員會同意之前，所有緊急事件的發號施令，我們又能自由先爲處置。

遠東委員會接續的向東京最高統帥建議和商酌一切。當委員會和管制委員會成立之初，我會說明麥克阿瑟將軍的權力，不應由於委員會在決策和施政方面的無能，而有所削弱。兩年以來這兩個團體，由於事實的證明，並未牽制麥帥的行政權。麥氏和他的部下實施各種困難的工作，獲得美國以外的各聯合國方面的稱譽。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的心上，還有不少關於日本的問題。第一，他問到處置日本海軍的計劃，第二，關於日本各島嶼。莫斯科會議前兩個月，我們已經建議所有日本剩下來的海軍船隻，應該一起鑿沉。中、英兩國同意此議，但是莫洛托夫却回答道，他的政府需要四分之一留剩着的船隻，自驅逐艦以至較小噸位的船舶。他又會問到商輪。海軍部長福萊斯特會說過，他們所要求的海軍船舶，實際上的價值甚小，我們於其和他爭論，例不如順從着莫洛托夫的論點爲得計。我對莫氏說，日本的商輪現正用之於遣送日人，似應暫緩提及。

除了他要我在其他外長之前，重行申述我們的立場之外，我不明白莫洛托夫爲何再度要在議會中提出此議。這是顯然的，他沒有知道，我已把送給他的公文，同時也送給他們了。莫氏另一動議爲參加處分日本的漁船，貝文立即指出，爲維持日本人食品的供給，漁船是少不得的。他說，日本縱已戰敗，生活無論如何總是需要的呀。莫洛托夫於是轉到日本託管島的問題上面去。

我回答說，美國對此尙無具體意見，除了下面兩點之外，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涉及太平洋日本各島的協議。即（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應該放棄以武力得來的領土。（二）雅爾達密約中曾涉及庫頁島和千島羣島。莫斯科會議之後，一九四六年的大部份時間中，我們對於國聯託交日本代管各島的問題，曾經深切研究。國務院和陸軍部方面的意見，這些島嶼既是國際委託日本管理，而我們的權限並不超過國聯，因之，如果必要的話，聯合國應該於託管協定之下，聲明這些島嶼在軍事上的重要而託由我們管理。我們既堅持着託管制度的設立，自不能出以不信任的態度。

海軍部長不要我們做對於聯合國有所不信任的事，但他又感到這些島嶼是由美軍的血肉所換來的，如有洽協，應以海軍獲得充份的基地爲原則，他深恐談判一經開始，折衝其事者對這主張未能貫徹到底。我力言美國的提議，假如有所更動，必先得總統和國務卿的核准。他對於託管制度的建議，深爲滿意。我們聯合國代表奧司汀氏終於把這個提議交與安全委員會。

紐約外長會議舉行時，聯合國正在開大會，若干未決定的託管制度的提議，尙待核准，並希

望聯合國託管制度會議得以成立。

關於託管制度爭論點中所稱直接有關國家一點，聯合國大會託管委會我國杜爾氏主張，應待託管會議成立之後決定，蘇聯大使諾維果夫，又加以反對。

莫洛托夫希望我同意，就是安全理事會中五個永久會員國，應視為直接有關國家。他又建議五強應交換牒文，承認這個默契。我回答，所謂直接有關國家的定義，乃是聯合國憲章中本身的解說。不應視為我們兩者間協定的題目。我又稱，在最後處置千島和庫頁島南部時，我一定對他的見地予以注意。這句話立刻得到很快的反響，他說，蘇聯並不想像對於庫頁及千島等成立託管協定；這些事件早經在雅爾達會議時決定。我指出，羅斯福氏在雅爾達會議時，一再說明，只有在和平會議時，可以決定領土的割讓，他又同意僅在和會席上支持蘇聯的要求。我接着說，我們在和會時當可支持羅斯福氏的諾言，反轉來，我們倒要知道，蘇聯對於我們提議把日本委治各島置於我們託管之下的態度如何。莫洛托夫氏很快的瞭解了這弦外之音，當安全理事會席上對於美國託管協定投票時，我很高興，但並不奇怪，蘇聯贊成我們的提議。

莫斯科會議時，朝鮮問題也是其他遠東領土爭執中的一個顯著題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美、英、中三國在開羅協定，朝鮮應該獲得自由和獨立。雅爾達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和史達林元帥又曾非正式協議，朝鮮理當予以獨立，假定在過渡時期必要的話，應組織託管政府。

當我們前往莫斯科時，朝鮮已分裂為二。日本投降之頃，軍事領袖同意，在緯線三十八度之

北的日軍向蘇投降，在線北的向歸順我軍。

我們建議成立一個蘇美聯合委會，以求幣制商業運輸等的統一管理，又提議建立四強管託制度，使朝鮮得以組織獨立和有效率的政府。數天之後，莫洛托夫提出蘇聯方面的建議，爲求最緊要的經濟問題的統一成立聯合委員會，以及組織臨時政府，和一個期限四軍的四強託管委會。我們於原議上稍加修改之後，同意蘇聯的建議。

一九四六年一月，蘇美委員會開會，執行莫斯科會議的訓令，但是由於文字上的差歧，又起爭執。至今一年又半，朝鮮分裂如故，即臨時政府的組織，也是同樣的失望。蘇聯管理區中紅軍所訓練的朝鮮軍隊，人數在十萬至四十萬間。一俟聯合委員會，和蘇美佔領軍撤退，這些蘇聯訓練的軍隊，勢必左右政府，因之假定委會要撤消，這些軍隊也須解散，朝鮮不需要蘇聯或美國訓練的軍隊，她所急需的爲經濟上的幫助。

其他一個主要步驟就是早日締結日本和約。根據兩年以來的佔領經驗，我們已獲得了正確判斷。在麥帥管理之下，一切進步均極迅速。現在時機已到，對日締結和約，使日本人民知道他們的將來，在聯合國指示之下，恢復日本的復興工作。

我不以爲外長會議應起草日本和約，這理由是和對德國的相同。蘇聯在日本投降前數小時對日宣戰，不應堅持着和平手段，而獲得否決權。我們認爲和平會議應早日舉行，十一國委員會家，應以確實對日作戰者爲限，起草和約。凡和日本作戰之國家，應全部包括在內。

起草和約時，對於領土問題，不應多數爭論。關於庫頁及千島，美國自當支持羅斯福總統的協定。沖繩島以南的羣島，希望能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爲情緒上的理由起見，美國應獲得託管沖繩的利益。

賠償問題將爲爭論之焦點自是不可避免。蘇聯以從滿州移去的資產，視爲「戰利品」，堅持須從賠償數目中除去。一位蘇聯代表估計所搬動的資產值九七億元，賠償委員鮑萊氏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估計，直接損失卽爲八五八億元，若包括毀損和復置在內，數逾二萬億元。

當然蘇聯不能自圓其說，這些實業工具決不能視之爲戰利品，既不能原物歸還滿洲，只好在賠償條款中剔除。

在舉行和平會議時，應提出四十年條約，確保日本之脫離日本軍國主義，而於解除日人心理上的武裝，尤較其形體上的爲更重要。總之無論是和平條約，解除軍國主義條約，我們必須以長時間專注於日本事件。

我對於中國似乎講得尙少。最大的原因是，我們在那裏努力的經過已爲人所盡知，所惜成功殊爲微妙。中國離開和平還很遙遠。對於這樣一個數百萬萬人民的國家將來的前途如何，還不是僅僅一個希望而已。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因內戰而弄得四分五裂，真是近代最大悲劇中的一齣了。

對於中國可下的一個穩妥的概論，就是她現在正開始在改變。必要時，我們應該予以鼓勵並

協助，中國需要我們在物質的和人的方面熟練技術的幫助，這種幫助如果用之得法並假以時日，當可使中國不致以變爲社會革命而危及世界和平。不過中國如果要引用這種幫助的話，其初步總得由她自己發動哩。

感覺中國問題重要的決非僅限於美國一國。我個人的經驗和事實所昭示的，蘇聯對於她東部接壤的這個廣大地區，寄予莫大興趣。外蒙古實際上已成爲蘇聯的保護國。雅爾太會議時，史達林很成功地以共同管理滿洲兩條鐵路，開放大連爲自由港，和旅順築軍港等條件，作爲她對日宣戰的代價。又當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時，由於莫洛托夫氏的一再探詢美國的對華目的何在，更足證他對於中國是怎樣的重視了。

所幸我到莫斯科時，對於對付莫氏已胸有成竹。在漢萊使辭職之前，國務院已草就了對華政策的宣言，這宣言的初稿，由我交給漢氏看過。當杜魯門總統委任馬歇爾元帥爲他訪華的私人代表時，我又會請馬帥對此草稿加以研究，以便對於這最後呈送總統簽檢的宣言，予以協助。

在我離開美國往莫斯科的前一天的星期日，艾契遜副部長，馬歇爾元帥和他的部屬，在我辦公室中會談。這天早會告畢時，我們對於對華政策一切商協妥貼，終於十二月十五日由總統核准公佈。因之除了馬帥的建議之外，總統對此政策無所改變。

我和莫洛托夫氏首次在司畢烈杜諾夫加大廈初次會談時，他提出要商討關於美軍駐在華北的問題。我予以同意並提出早經預備好的一個聲明，對於華北美軍的確實人數，說得很清楚。我解



釋美軍之駐在那裏係應中國政府之請求，協助解除三十二萬五千日軍的武裝。我向蘇聯政府担保，一待此舉完成，美軍立即撤退；並指出馬歇爾元帥業已代表總統赴華，協助終止中國內爭，完成停戰協定，俾得解除日軍之武裝。

翌日我把總統的美國對華政策宣言，在會議席上提出。重申美軍駐紮華北係在解除日軍武裝，並深信中國兩反對派應立即停戰，參加各黨各派的國民會議，以期鞏固國家的團結。

這宣言，莫洛托夫氏並不認為滿意，兩天之後，他又始開質問了。這一次我詳細的解釋道：我們在同盟國方面的責任，係在確保華北日軍之解除武裝；這件工作本來指定中國國民軍去做的；由於共產軍橫隔在國軍與日軍中間，致原定工作無從實施；由於解除日軍武裝係最高統帥指令國民政府所做的工作，因之我們自己對於這件工作之進行，未免就緩遲了；我們既然承認這國民政府，我們自應予以相應的機會，使她能完成這個責任。我向莫氏担保，如果這是必要的話，我們願意置身其間，去解除日軍的武裝，然後令我們的軍隊返回本國。

莫洛托夫說，他覺得蔣氏領導的政府，其力量遠過於共軍。他的看法是，中國人從不願自己去作戰，而希望別人去替他們打。日本軍隊長期的存在那裏，真叫人「不耐煩」他於是又夷然地說，經過了八年的作戰，蔣介石應該知道怎樣去對付日軍了，何況他們又是投降的軍隊呢。

事隔數天，莫洛托夫恢復他的進攻，他建議應該規定一個日子，使駐在中國的美軍和蘇軍同時撤退，我又解釋道，解除日軍武裝，和蘇軍之在滿洲係截然兩事。但是不消幾分鐘，他又發

出同樣的問題，這種問法，自從開會的第一天以來，一直沒有變更過。

我說：「莫洛托夫先生，足下之所以發出此項問題者，也許是你歡喜我的嗓子罷，我所能給你的回答，就是和你每次問我時所答復的一樣。我不妨預先給你一些線索，要是足下明天再有同樣的問題，你所得到的還是同樣的答復呀。」

那一晚，我往訪史達林元帥。我老是和莫洛托夫談着刻版文章的話，未免發生厭倦，因之把這問題，加入了所要討論的項目裏。

我告訴史達林氏和莫洛托夫談商的經過，莫氏這時也在着，我又提醒史氏，他如何在波茨坦會議時宣稱，蔣介石氏所領導的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而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他當即回答說，蘇聯早經締約承認蔣氏領導的政府。他對於我們的軍隊在那裏並不表示反對，他僅僅希望關於這件事能給他知道而已。史達林又說，要是中國的老百姓確信蔣介石氏依靠外國軍隊的話，他的號召力就要削弱了。

當時我就拿了些火柴放在桌子上，排成華北沿鐵路日軍，共軍和國軍的位置。史達林非常的感着興味，就問起天津區域中究有多少共軍的兵力。我答復道，據共軍首領毛澤東所宣稱，那裏約有六千萬人，史達林一聽此話，不禁發笑。我指着代表在華北國軍的火柴，說到約有四萬人的數目時，他問道，蔣氏號稱擁有一百五十萬軍隊到那裏去了呢？我說，我們的海陸軍都沒有看見到。史達林呵呵大笑地說，所有的中國人都喜誇大口，各自說對方的軍隊，和自己方面的一

樣，如何如何的多。他對於馬歇爾元帥寄以敬意，並說假定任何人能解決中國的局勢，他當然也能够。

由於和史達林談話的結果，翌日會議議程中所規定的討論宣言一節，便獲得了協洽，三國政府重申在國民政府之下，中國應實現民主和團結一致的必要，並稱，美蘇兩國外長已「完全協洽一致，希望在他們完成了責任之時，美蘇兩國在華的軍隊，就從中國撤退。」

一九四六年九月，馬歇爾元帥報告總統說，他因為無能為力，似乎不必再滯留在中國了。杜魯門總統訓令馬帥，當他認為使命結束之時，就可啓程返國。我在巴黎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中國王外長時，他立刻表示，恐怕馬帥離華，可能引起中國人民以為美國對於中國事件業已消失興趣的感想。我担保着友誼興趣的存在，但是力言在雙方都不願接受馬帥的建議時，徒留也是無益的。

希望馬帥使命的得以成功，差不多無所不用其極了。除了馬帥本人的聲望之外，又加上了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地位和權力。在莫斯科時，我們又得到蘇聯重申支持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式認可，此外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政策聲明中，他給中國以如下動人的諾言：「一俟中國情狀得有進步，我人即將考慮援助。實行……不涉內爭之各種計劃，諸如促進中國經濟之復興及改革，並使中美兩國商人間的貿易關係得以恢復。」

馬歇爾元帥一直努力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但是作戰雙方對解決之途毫不見接近。我們於是要考慮決定，是不是司徒雷登大使應該繼續努力使雙方和協。遠東司司長文森氏，以有經驗的外交

官員資格，認爲可以不必；既然馬歇爾元帥無法使之實現團結，如再叫其他官員促使雙方同意我們之見解，實爲不智。我對於文生氏的主張表示同意。

我們對於調解夫婦間的爭噪，而得到不痛快的經驗者，當不在少數。我們深知在任何方面都不願接受居間人的忠告時，唯一的好方法就是告退。夫婦間如此，國家也是如此。在這兩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動機總是由友誼而發生的，要是我們對於這對夫婦繼續保持着友誼的話，總得要等待着，直等到兩造間之一，厭倦於爭噪爲止。國家大事和家庭間一樣，有一個時間最好要做的——就是不去做。

在我們面對着亞洲無數的困難時，我們應該常常記到，當我們開始着手時，就抱着無限量的好意。對於菲律賓實踐獨立的諾言，和對於暹羅王國獨立的友誼協助等，給數千百萬渴望獲得政府和經濟自由的亞洲人，以一個標炳千秋的火炬，在無可避免的亞洲所有的改變中，我們必定要把握住我們的動作，不使我們所抱持的好意枯竭。我們自己的安全和穩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都繫於我們幫助亞洲進步之成功而定。

## 第十二章 確立國民外交政策

這一代的美國人，已經知道了美國是世界和平與自由的主要負責人。美國的一言一動，足以影響到世界最僻遠的一角的人民生活。這一點，甚至在史達林跟霍浦金的最後一次談話中也完全承認美國對世界的關懷和責任，並且說美國比任何國家更有成爲列強的理由。

我們勉爲其難的接受了領導權和固有的責任感——因爲兩次代價巨大的戰爭之餘，元氣尙未完全恢復，只能說是勉爲其難。如果我們不發動，則聯合國這一個機構也許就不會形成，以保持並促進國際的和平與安全。如果沒有我們堅決的努力，則戰爭的殘毒是否能加以肅清而很迅速地給聯合國以工作的機會，依然是一個疑問。只要我們在國際上發揮我們民意所表現的政策，則我們的責任一定會在今後的年頭中予以完成。我相信，要確立國民外交政策，我們必須達到三項目標：

第一，我們必須具有一種兩黨一致的外交對策，必須具有在行動上與性質上是民族的而不是政治的外交對策，而在結果上，它又必須是值得其他信賴的永久的政策。

第二，我們必須具有一種適應民意的機構，使我們的政策化爲實際的行動。

第三，我們必須拋棄「祕密外交」。我們應該讓人民知道外交家所遭遇的問題，並且使他們也能够適當地判斷外交家所擬議的解決辦法。「民可使知之」的權利，乃是國民外交政策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

這三項目標，據我的經驗看來，是並不容易達到的。不過。在我追求這些目標之中，我所碰到的情形，也許倒對於未來的工作頗有裨助。

在離開雅爾達之前，羅斯福便指示史退丁紐斯提名參議員康納利和范登堡二人為舊金山會議的出席代表。此後，他們二人與史退丁紐斯合作得十分密切，而他們的精誠合作，大部分是由於參議院差不多一致表決的忠於聯合國的決議案所激發出來的。

在第一次外長會議之前，我決定要邀請一位著名的熟悉國際形勢的共和黨議員來和我合作。跟范登堡商量的結果，他介紹了多年來關心國際關係問題而且極有資望的杜勒士。當時，杜勒士雖有商務纏身，然而毅然答應了，終於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此後，我把他推薦給杜魯門總統，杜勒士乃開始担任聯合國大會第一次大會的代表團之一員。他完成了很大的任務，一直在紐約舉行的大會中繼續着工作。

我們是以兩黨一致的姿態不斷地參加着聯合國工作，大會開會期間，我們的代表團，除杜勒士之外，還包括着參議員康納利與范登堡，衆議員勃洛姆與伊頓，這些都是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第一流人材，參衆兩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在倫敦首次會議中，代表之一，是我的朋友湯森德，他

是前任參議員，是共和黨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是爲全體參議員所尊重的人物。

史退了紐斯辭去聯合國代表團職務的時候，我向總統推薦了參議員奧斯丁（共和黨人）以繼任其遺缺，這個建議博得了總統的高興。他們本來在參議院裏有過密切的關係，那時奧斯丁已表現出富於外交關係的專門知識的。事實上，從一九三四年以來，無論在戰爭的苦難時期，或是在爭取和平的準備工作中，兩人始終是精誠合作的。

當我們在莫斯科同意於準備巴黎和會工作之際，我邀請康納利和范登堡以顧問的名義和我同去，他們都慨然應允了，在會議中出力很大。對於我們外交關係的每個問題，我都跟他們商量決定。一九四六這一年內，有二百十三天，他們都不在華盛頓，而是在出席國際會議。要比這兩位立法者對美國更忠誠更努力地獻身於會議場中的簡直再也提不出來。

外長會議開會時，各國代表得佔坐一桌，我的一桌，坐的是這兩位參議員，以及起草和約的代表和通譯官。每一位外長可以約定八人至十人的僚屬在會議室裏工作。會議期間，我總是邀請康納利與范登堡做我的同伴。我喜歡聽取他們的見解，勝於國務院技術專家的協助。同時，我也希望同僚們能親自體驗到訂立和約的全體過程。

參議員康納利與范登堡的參與外長會議，和平會議以及聯合國會議，給世人認識了美國的外交政策乃是一種一貫的政策，決不因某一政黨的失敗而終止。當我將搭飛機出席和會之前，我在華盛頓機場上就向全世界作了這麼一篇聲明，其中說：

「目前的形勢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完全不同了，在那時，我們是派別紛歧的，但現在對於締造和平，是不分什麼白宮派或國會派了，而且，也沒有什麼大政黨之間的紛歧了……我們並不是以任何政黨或政府任何支派的姿態而是以兩黨一致的姿態去參加工作；我們是以美國人民的姿態去參加工作。……我們深切地意識着，如果我們這個國家要對全世界的大局發生我們的影響，則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但當我們勾留在巴黎的時候，我却又經驗着兩黨一致並不一定就保證統一。對於倫敦外長會議中不能取得協議的問題，我受到了批評，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但是對於莫斯科會議中我們取得協議的問題，我也受到了某些批評，却是始料所不及的。

我逕自飛回國務院。一問什麼時候可以進謁總統，白宮的雇員告訴我：總統遊河去了，數日後才回來。我便轉請他呈報一下，我已經回國，準備述職，同時希望能在次日晚上作一次關於這次會議經過情形的廣播演說。

接着，當天下午，我就奉召飛謁總統。我把會議情形向他報告，他對於我的言行表示着由衷的滿意。

當我們進餐的時候，總統囑我再向席上的各位報告會議情形，我就照樣講述了一遍。海軍上將李希說，聽了我的報告，感覺到形勢雖然大大的好轉了，但是他並不贊同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協定。我就對他說明，莫斯科協定僅僅是完成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的目標而作再一次的努



力。在莫斯科，我們獲得了蘇聯前此所反對的協定，這才派遣了哈里曼，寇爾和維辛斯基到羅馬尼亞設法實施協定中的事項。這種工作也許並不能算是成功，但是，我說，其後果是不會遜於過去的情形。當時我就請教他，照他的意思，應該如何辦，他却沒有給我以答復。

餐後因爲我不得不飛回華盛頓，外交問題也就不再討論下去了。總統約我於元旦前夕再來，在艇上度夜，我也就答應了。這時，我發現，雨雪紛紛，飛機不能開，只能駕汽車。在從莫斯科歸來的長途行程之後，接着又是汽車的旅途，那自然是怪不舒服的。幸而，一到家裏，我的太太遞給我一封信，是赫爾寄來的，可以算是這不舒服的日子的一個舒服的結束。信中這樣寫着：

『親愛的吉姆：我由衷地慶賀你在莫斯科會議中所表現的光榮的進步！諒解，信賴，友誼，以及國際合作的整個精神，都由這次會議而獲得大量的增進。』

次日晚上，我發表了一次廣播演說。我解釋莫斯科協定『將給世界各地倦於戰爭的人民帶來希望』，並且表示我的信念，『莫斯科會議，的確產生了美好的諒解。』

當我重晤總統於艇上時，他祝賀我，說我的一篇報告很好。他說，艇上的同志們在日前傾聽過後，一致認爲它是一篇足以令人信賴的報告。

總統於莫斯科會議前寫給史達林的信中，對後來在莫斯科取得協議的各項建議都得到過他的認可。莫斯科會議的經驗告訴我，一個人實施真正的外交政策，就必須準備迎受左右雙方的批

許多人繼續不斷地謠傳着總統與我的意見不合。至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總統關了話，說我們的意見並無不合，然而謠言依然如故。辦公事的人往往會把別人的誤解不問不聞，可是我認爲這種謠言確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天使我怪不舒服的。

我原是希望我們的外交政策能獲得一致的擁護，而結果却遭遇了一連串的挫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那時我正在巴黎，商務部長華萊士於麥迭遜廣場上發表演說，略謂總統所認可而由我執行的政策，未免對蘇聯太苛，他又認爲採取較妥協，較接近的政策，是必要的。商務部長的論調，在我並不感到什麼驚異。以前，我也領教過了，他在紐約泰晤士報也曾抨擊我們利用飛機場的冰島協定，對國務院爲了防衛西半球而訂立該項協定的活動曾橫加阻撓。

新聞記者引了杜魯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說全部贊同華萊士的論調一語，驚動了各國代表們的注意，也引起了他們的廣泛討論。國內的議員們也紛紛提出質詢。各國外交部長們對於我的言論是否是真正反映美國政策的這一點，也表示懷疑起來了。

我的結論是：我不必作公開的聲明。這問題要向杜魯門總統尋求解答。

自然，做代表的身分是很不幸的。只要可能的話，我很想避免這種身分，因爲我要避免答復關於我們政府的政策是否已有變更的問題。我們的困難是只增而不減的，華萊士在白宮中宣稱：他已經跟總統商定暫時不再發表演說，一切都到了和會完畢以後再說，這意思表示着總統並不反對他今後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發動新的攻勢。

我跟白宮並無直接的溝通，我只從報界和助理國務卿羅塞爾那裏知道一點消息。結果，到了九月十八日，我向總統送上了一個簽呈，我說明，我曾於四月間遵從醫生之囑，呈請辭職，現在，應請在和會完成後准予辭職等等。該項呈文的末段，指出：『您和我化了十五個月的工夫建立了兩黨一致的政策，我們一向在努力促使全世界相信：它是全世界值得信賴的一種永久的政策，然而，它是被華萊士毀於一旦了。』

我不必在這裏引用總統的言詞。但我想可以這樣說，這次杜魯門總統約我談話的結果，我知道他不想改變他的政策，也並不對自己的見解發生什麼懷疑。他也不曾告訴我，他所要採取的次一行動是什麼。然而，到了第二天，總統立即解決了一個足夠使美國絕大多數國民滿意的重大問題。這就是：商務部長華萊士的去職。

華萊士辭職後，美國政策的信任心便恢復了。康納利和范登堡繼續擁護着我們的外交政策，且懷着不屈不撓的忠誠。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投票表決時，參議院批准了五大和約，這顯然表示了堅持兩黨一致外交政策的工作效果。當我接到投票消息的時候，我禁不住回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不幸的數月間當威爾遜總統向着一個破壞他的和平工作的可惡的參議院鬥爭的一幕。可是我的希望還存在着，我們的政策建設者不會重蹈威爾遜的覆轍，並願兩黨的領導者澈底明瞭我們的政策的來蹤和去跡。

保持並發展國民外交政策的第二個因素，是負責處理我們外交事務的機構，普通總是運用國務院作為我們的鞭策者，以對付外交上的溺職行爲。

國務院的組織與工作，迄今還需要繼續的研究。這一個機構，從戰前的九百個人，發展到差不多三千人光景，遍佈在全個華府的十八個建築物裏面。復員後幾個月內，國務院的公務員差不多已增至一倍光景，因為許多的戰時機構，如戰術署，戰爭情報署，國外經濟管理局，剩餘物資管理局等等，都已歸併到國務院。最有能力的人往往迫切地要離開垂死的機構，去追求永久的工作及其生動的機構。而現在，風紀是衰落了，問題日益增多了。同時，最重要的，我根本不贊成把這些行政機關似的各部門都歸入國務院。

國務院必須是一個建立政策的機構。它決不能當做行使各種軍事工作的地方。許多時候，國務卿既須致力於軍事活動的策劃，則必然再也顧不到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

正因為我認定國務院應永遠視為建立政策的機構，我就反對陸軍部把我們在歐洲及太平洋上佔領區機構都歸入國務院管理的那種辦法。國務院是不適宜於處理這種工作的。我們必須保留國外的機構；例如在德國的麥克拿尼與克雷二將軍的，在奧國的克拉克將軍的，以及在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的各種有效的機構便是。

當然，國務院和陸軍部、海軍部，必須隨時密切聯繫。沒有強大後盾支持的政策，在今日的世界，是算不得政策的。自大戰開始後，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不僅有頻繁的協商，而且由

這三個部門派定了代表，組織了協力委員會，經常召集會議，研討一般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贊同聯合參謀部的提議，設立國民軍事學院，作為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高級官員的聯合訓練之所。同年七月一日，國民軍事學院便宣告成立。外交官員紛紛報名加入，這個新機構開始舉辦着一種最有效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曾經建議，請總統頒佈設立國防委員會的命令，這一委員會，包括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使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獲得充分的協作。該項命令草案中指明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參謀總長擔任該委員會的軍事顧問。除各自設置祕書之外，該委員會之下特設置統一情報處。此一建議雖然未蒙核准施行，可是這些目標都已變成法令，將陸海軍歸併入國防部。等到這個法令見諸實施的時候，我們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的聯繫問題，尚須予以繼續不斷的研討。

一個做了五百六十二天的國務卿的我，其中三百五十天化費在國際會議席上，是不可能把國務院這樣一個機構實行許多重大變更的。事實上，在我初期的任內，我曾經竭盡智力，使國務院克服「改組恐怖狂」的襲擊。我只革新了一樁事，但這並不會引起大眾的注意，我個人却認為這是我們外交事業上一件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當我就任國務卿的時候，我竭力要把我們的政策加以廣泛的說明。我認為這是關於現實外交政策的一種基本的工作指導。這樣的一種文件，從來不會被人們草擬過。國務院的官員們也許

能够把我們的政策提供出一點輪廓，但是很顯然的他們那種說明僅僅是他們自己對於美國政策的個人見解而已，既沒有權威性的條文，也沒有加以熟慮或認可的條文，把我們全國的目標向全世界傳播。我呼籲着，政策的明確應視為國務院工作中首先重要的一件事。

我很高興的把美國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說明文件獻給了國務卿馬歇爾，那文件包括着美國各方面的權益。他也許對某些政策表示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至少是能够在數分鐘內立即有所抉擇，有所改變，使與自己的見解完全符合一致。

這些說明文件還有一個好處。它需要行動綱領的發展，它又能策勵負責當局瞻望前景，並預擬計劃，以克服未來的危機。

然而，最優秀的最有計劃的機構，還是得力於國民的才具。

當我就任國務卿之後，不多時我便發覺一旦出席了海外的會議時，個人就將無暇出席國務院的高幹會議，因此請副國務卿契遜去參加。他每天早晨即跟國務院的督導員碰頭。我到了國外，他隨時把他們所檢討的每一重要問題向我報告。當我在國內時，他又往往在很晚的下午跟我商談各項問題。我們兩人，在下午七時以前離開國務院的時候，是很難得的。如果我沒有副國務卿契遜以非常的能力與精力指導國務院的全部工作，我決不能讓自己這樣放心的從事於和平會議的活動。

我還要讚頌以服務外交為職業的許多官員們的高尚的品格。我所遇見的大多數職業的外交

官，都是些有才能、有良心、刻苦耐勞的人，要是不幹外交工作，他們很可以賺到比政府所給予他們的低微薪水不知高多少倍的薪水呢。

在另一方面，國務院對於輿論的警覺性也逐漸提高。每天，權威報紙的社論，以及廣播批評家的意見，都安置在國務院官員們的辦公桌上，並且寄遞給海外的使節，供其參考。個人及社團機關的信函和呈文，也都作為輿論趨勢的表現而一一加以分析。舉個例子來說，雷遜師團，它就跟全國的各種志願軍團體保持着經常的接觸，這不僅給他們以外交上的知識，而且取得了關於未決問題的批評和暗示。工作的背後，是堅定的現實，那就是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適應於美國人民的需要，而且必須獲得他們堅強的擁護。

國民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當然是需要有知識的人民大眾。由於國際協定都出於統治者的秘密的私訂，國際關係迄今還在遭受着倒懸的苦難。但是我們美國至少是很迅速的拋除了那時代的惡習了。

戰爭解除了秘密外交。在當時，軍事政治的協定，是往往具有相互關係的，嚴守秘密在戰爭的利益上，是必要的。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史達林元帥都曾在秘密中舉行會談，連新聞記者也在被拒之列。即使不少新聞記者間接地獲得了會談的內容，但他們爲了遵守戰時檢閱制度，也往往不能公開發表。

但在波茨坦，那時太平洋戰爭尚在繼續展開，新聞界爲了不獲發表該會議的消息而不起

來。許多美國新聞界與無線電廣播方面的記者們齊集柏林，滿佈在會議的周圍。然而波茨坦是位於蘇聯佔領區內，他們是不許前往的。新聞界大發怨言，終於還是得不到什麼詳細的報道，直到後來羅斯福回到美國向國會作報告之後才知道。這些協定，因與對日戰爭有關，所以某些祕密是應該嚴守的。從那時起，我常常希望能有更多的報道，盡量把歐洲問題的消息提供給我們的國民。

召開倫敦外長會議的時候，嚴守祕密，在軍事上是無理由的。可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是發布關於討論的問題與達成的協議的公報。這似乎是波茨坦會議以前的一種進步，可是它終於變得毫無進步。各外長指派一個代表參加起草公報的編輯工作。然而公報，與其他的公事一樣，正需要全體一致的協調。委員會本身所完成的協議太少，除了嚴禁發表的辯論以外簡直無可報告。在這種環境之下，新聞記者就做了唯一的事情，就是從某些與代表團有相當關係的人那邊獲取消息，其實，這些人也是早被授意不准透露消息的。其結果，會議的消息都變得不盡不實了。

我斷定凡是適用於安全理事會的，一定也適用於外長會議。我深感到我不能單靠自己做事，我正需要一個跟我十分接近而又熟悉國際關係的助手，把有價值的消息作適當的解釋。我竭力勸鮑倫接受此項工作。契普不但是一個老外交官，而且曾在莫斯科居留過許多年，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也會替羅斯福與杜魯門兩總統擔任國際會議的通譯工作。契普與麥德摩脫兩人，在國務院擔任過對新聞界的聯絡工作，已有很多年頭，組成了一個有效的團體。

巴黎外長會議舉行時，我對各國外長表示，我不能苟同於過去的新聞作風。我堅決主張我們



有權向新聞界說明美國對每個建議所持的觀點。如果外長會議能順利展開，能圓滿結束，那麼就美國代表團而論，我決意不願把這會議變成祕密式的會議。

每次會議舉行後，契普與麥德摩脫總是跟新聞記者碰面，把各種重要的議題作簡明的報道。新聞記者固然喜歡列席大會，但他們不久就明白他們雖未到會參加，却也已經獲得了客觀的，正確的，積極的消息。他們也認識了機密的會議往往有助於協定的訂立。許多記者，自從知道我們是在拿行動促使別國代表團採取同一行動以後，都願意不進會議場中去了。

在巴黎開會期間，外長會議曾舉行過不少次數私人性質的會議，陪伴着外長的，除他的舌人以外，只有兩個顧問。在最初的會議舉行之際，有人提議不許記者採訪會議中的一切消息。我表示了反對的意見。我說，「第一，我認爲這是錯誤的。第二，協定是無法守祕的。到會的人自然會把議題講給其他代表們，由此將洩漏到新聞界。」

倫敦會議的經驗，給我實在太多了，我告訴了我的僚屬，我此後不願參加那種意圖阻止我把美國情勢發表的任何一個會議。

從此，新聞界將站在美國觀點上把會議的進步或不進步，向民衆作正確的報導。這就刺激了別人發表各自的觀點。我樂於觀察這種發展，因爲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國的情勢揭露於輿論之前。

終於，莫洛托夫也受到了我們的影響。七月，當他發表關於蘇聯所採對德步驟的重要演說的

時候，他採取了我們的習慣。他在祕密會議中發表的演說稿，即以騰寫版預先分發給新聞界。我知道了這個消息，我便向他致賀。自此以後，莫洛托夫和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工作中，就常常採取這種作風。我知道，在目前葛羅米柯還常常招待各報記者，向他們解釋蘇聯對於聯合國當前各項問題的看法，作為參攷。

和會在巴黎舉行的時候，我提議新聞記者及無線電廣播記者應該讓他們參加一切會議。我的提議得到了莫洛托夫的附議，他說他是由衷地表示贊同。我覺得我對於掃除和平協商會議黑幕的一項工作，是終於成功了。我並不因蘇聯代表團及其隨員們利用開會程序以達其宣傳目的那種緊張狀態而減少了我的滿足之感。

在莫洛托夫的宣傳攻勢中，有一次，他竟指摘美國和英國擁護引用某項會議程序法規，而且稱之為破壞協定。這是無稽之談，因此，我就用十分嚴厲的演說答覆了他，在這個答覆之中，我再三地援引實例，證明他的論斷是全無根據的。每當我援引一個實例，我就說：「只有莫洛托夫先生纔會發出這樣的抨擊」。在我的演說最後一段，我提及我們的自由新聞政策，並且老實告訴莫洛托夫，他指摘美國動機的那種論調是要公開發表出來的。我又說：

『我要求莫洛托夫容許我現在所作的聲明也在蘇聯發表出來。……今日之下，蘇聯人民對我們只有欽羨和尊重，我們決不容許這種欽羨和尊重因莫洛托夫的任何抨擊而減退。』我的演說，終於在四十八小時內出現於蘇聯報紙上了。據我所知，這是最初一篇也就是最後

一篇被這麼尊重的演說了。我唯一的遺憾是，它是一篇反駁莫洛托夫的演說。

在紐約，莫洛托夫邀請我們前往莫斯科。只要新聞能獲得報道的自由，像巴黎和紐約會議時的情形，我當然同意。他說莫斯科的屋荒，才是唯一的限制。在一次私人談話中，我要他担保無線電廣播記者也一併參加在內。他回答說，無線電，那是另一問題，他準備跟蘇聯政府當局商量一下。後來，他說廣播記者可以准許在莫斯科拍發新聞。記者們都說，莫洛托夫對於他們拍發的新聞不予檢查的諾言也實現了。

倫敦會議結束以前，爲了配合當時的情勢，我不得不在廣播演說中把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形容出來。我在那時只講一部分，並不像現在這樣和盤托出，因爲我還希望着，願意相信着，美蘇之間，抱着同一的目的，同一的心願——早日爭取和平。無論什麼時期，凡是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或是代表他們政府的利益者齊集在一個會議上而抱着同一目的，最好的辦法，是把方法上的分歧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樣就易於調解那些分歧。這是羅斯福臨死以前的金玉良言，那時他曾經勸告邱吉爾，在公開演說中要盡量把我們對蘇聯的困難減少到最低限度。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還希望美蘇之間抱着同一的目的。然而，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杪，不管蘇聯有什麼長期計劃之類，許多的事實都證明着他們的當前的目的是延宕歐洲方面和太平洋方面的和平。

史達林在他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說中，宣佈了新五年計劃，並強調着重整軍備的問

題，以代替蘇聯人民迫切需要的消費品的生產，對於我這倒是一個大驚駭。尤其可怕的是蘇聯對伊朗的態度，那簡直暴露了他們破壞弱小鄰國主權的意嚮，同時也證實了莫洛托夫曾向希特勒表示過的管轄巴庫以南的土地的野心。這一切激起了我在一九四六年首次的演說，演說中反映了對蘇聯的更堅定的態度。爲了及早爭取和平的共通目的所鼓舞的信心，在現在是再也沒有了，因此，把美蘇之間的分歧減少到最低限度的那種認識也隨着不再存在了。

同時，在我們的武力條件之下，我們的分歧再也沒有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必要了。一九四五年秋天，美國軍隊以最大的速度實行復員，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退伍上的積點制度，給我們留下了基本的師團。我以動員指導者的資格，贊同這一制度，因爲我認爲這是公道的，同時我又認爲全世界正迫切地永久地需要着和平。然而，這樣一來，最有經驗的將首先解除職務，而基本的幹部份子也差不多就在同時引退。那些嘩啦嘩啦對我高喊着對蘇聯採取堅定態度的人們，甚至在同時也高喊着軍隊的迅速復員。羅斯福有一次會很賢明地說過：「山姆叔叔應該喊得輕而帶的是硬手杖」。我的批評家們却硬要我喊得響而帶的是嫩樹枝。

年底又到了，軍隊的整編又進行起來，我們再也沒有理由不使人民理解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了。

懷着這種決心，我們的宣傳政策也不得不加以改變。我們必須讓國民們知道大局的演進，否則我們就不能希望獲取他們的擁護。於是，演說，鮑倫，麥德摩脫和記者的日常的會談，我和記

者們的經常的聚會，使我們對蘇聯的關係問題與協商的情形充分地傳達給人民。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需要獲得一種持久的和平，那就必須是人民的和平。只要他們多多瞭解外交的知識，人民就能够在外交上發生更充分的影響。

基本的民權，人民的「知」的權利，必須與日俱增地應用到外交活動上。如果那權利是對於國內的民主發生着基本作用的話（我相信是如此），那麼它至少在外交活動上是同樣地必要的，而對於知識與理解的需要，尤深且鉅。要使這個政策見諸行動，就得打破過去的外交舊習慣。但是舊習慣是不易打破的。時間，精力，人民對於世界情勢的認識的需要，都是少不了的。

如果人民只陷在黑暗中不瞭解一切重大事件對美蘇關係所生的影響，他們就不可能產生睿智的行動。

但願多一點光——越多越好！

## 第十三章 原子能的管制

我記不起什麼時候羅斯福總統告訴我關於這原子彈，祇記得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我們兩人在他辦公室裏討論戰時動員程序某項問題時，他告訴了我這可怕的計劃。

我承認我以為這計劃是幻想的，他發覺我的驚異，繼續欣喜的把科學家關於原子能的預測來使我驚奇。他說：一九三九年以前，德人已試驗得有進步，現在還在繼續努力，這就是我們的競賽，看誰能製造第一顆原子彈。

那時候，記得是一九四三年夏天，總統以為德人已趕在我們前面，但是他根據的情報是猜測超乎事實。大戰之後，我們發覺總統把德人的進步，估計得太高，無論如何，那時候的報告，刺激我們對這計劃格外努力。

自從這第一次討論後，總統與我兩人間，有好幾個月不提這原子能計劃，事實上沒人講到這事情，除非是必要的。記得有一次在親自監督這計劃的陸軍部長史汀生前提起，他很驚異的我已經知道了這事。

即使總統沒有告訴我，在我戰時動員局局長的地位，這如此龐大計劃的許多徵象，當然要動

員許多人力物力，無論如何是瞞不了我的。尤其在我們人力嚴重缺少的時候，一個需要十二萬五千人的計劃，是逃不了我的注意，尤其需要的是高級技術精深的專家。

但是我也沒有功夫來注意這事情，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因為一個勞工問題，使我知道我們已經確實獲得很大的進步。

橡脊廠的工人，組織工會的管轄問題引起了爭執，提到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來解決，因為軍部的請求，公開的訊問已改期了四次，而無可再改了。

陸軍次長柏德遜及格洛夫斯少將到白宮來和我商量這問題，格洛夫斯少將指出，公開的訊問，就需要提出各項證據，如已經雇用的工人人數，需要雇用的工人人數，以及某一特殊機關和這計劃的關係等等。這樣一透露，就會使這計劃的安全發生嚴重的危險，他們想在白宮裏，我們三人和有關工會的領袖，召集一會議，如此比較好，這提議經我同意了。

在我們討論中，柏德遜先生說，一九四五年四月，軍部可以知道我們是否可以造成這原子彈。他們相信這努力會成功，到那天就可以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冒險的來指定一個日期。

會議預定在十二月五日上午舉行，工會方面的職員是救火人員和油工國際聯誼會的克拉克與電氣工人國際聯誼會的惠格納。我們信託他們，告訴他們很少人知道這計劃，在這時候，我相信祇有四個國會議員得到具體的情報，我們要求工會方面放棄在惠格納法律下的權利，與格洛夫斯

將軍合作，來保護這計劃的安全，他們愛國，立刻應允的去了，其他工會領袖也答應完全合作。使我驚異的，這計劃並不使更多人知道，國會方面同意撥用約計二十億元，而不要求追問他的用途。有幾位國會領袖約略知道這計劃，而不告訴他們的同僚，來共同負擔這責任，是應當表示敬仰的。

四月一日的期限到了，這龐大計劃的成就還成疑問，但是陸長史汀生抱着成功的信心，並向總統表示，遺憾的是羅斯福總統逝世了，並沒有知道這計劃的成功。

羅斯福總統逝世後，陸長史汀生告訴杜魯門總統，在他指揮正在工作的許多科學家，相信在很短時期內，可以造成一顆原子彈。他主張委派一個臨時委員會來考慮，並向總統建議，這許多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如原子彈的試驗，在戰爭中的使用，和戰後原子能的應用。

杜魯門總統批准他的建議，請他為委員會主席，總統要我做他的代表。這委員會包括：海軍次長巴德，副國務卿克萊頓，科學研究會主任勃許，哈佛大學校長康納脫博士，麻省理工大學校長康普登博士，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總理哈理遜。我們並且得到與這計劃有關的一羣科學家的幫忙，他們是：康潑頓博士，弗米博士，勞倫斯博士與奧本漢墨博士。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這時全國的視線，集中在歐洲戰事的結束和舊金山會議，這委員會在華盛頓靜悄悄的加緊工作。有幾位新聞記者發覺我在華盛頓而不在南加洛林那休息，就奇怪我的活動，我不能告訴他們，所以他們想法探測，他們有幾位以為我與政府新任命中有關係。



在這時期中，我好幾次到曼麗蘭倍斯達的海軍醫院，去和前任國務卿赫爾先生商量，請教關於國務院方面的工作，那是在幾星期後要擔任負責的。

在第一次臨時委員會會議中，勃許，康納脫，康普頓幾位博士說明原子彈的破壞能力，我聽了，相信成功之後，可使太平洋戰事很快的結束。我問這許多科學有什麼防禦原子彈的方法，但他們想不出來。他們預料更大，破壞更強烈的炸彈會造出來，我問他們是不是我應該相信唯一的防禦方法是殺盡天下的科學家。

聽了這許多科學家討論這計劃的進展之後，我們化一天功夫，和建築泰尼西和華盛頓的大工廠來製造這原子彈的實業家和工程師在一起，我問他們別的國家製造原子彈要化多少時間，這問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物理學問題，而包括原料物力，工程技術，專門知識和其他的要素。從我們所得到的情報，我得到結論，任何其他國家，要製造一顆原子彈，至少需要七年。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臨時委員會一致決議向總統建議，這原子彈儘速先用來對付日本，並應該祇用在有兵工廠和軍事設備的所在，除了巴特先生之外，委員會全體同意建議事先不加警告的使用，這最後問題曾經謹慎的考慮。

如果事先告訴日本人，在某一指定地點要投這炸彈，恐怕他們會把我國的人民戰俘移到這地方去。同時，專家警告我們，即使在新墨西哥的試驗成功，並不能證明這炸彈。飛機上投下來，一定會爆炸的。如果我們事先警告日本人這新破壞武器的厲害，而希望他們有所感覺，倘若那時

這炸彈並不爆炸，豈非使日本的軍閥更得到安慰。此後勸告他們投降的任何文告，會毫無作用。在新墨西哥籌備的試驗，也是委員會的一個問題，沒有人會確切知道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結果如何，如果需要，先要把全區的人民先行撤退，我們知道在最佳的情形下，這爆炸會有反射作用的，這祕密就難以保守。發布的新聞，以及預測得到的可能偶然發生的事故的記載，都已預備好，環境需要時，就向公眾宣布。

以委員會中總統代表的地位，我要向他報告我們種種建議的理由，我告訴他，在我們全部縝密的討論中，是完全以聯合參謀首長所提供的軍事形勢預測為依據。他們計劃在十一月一日在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州登陸，繼續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在本州本島登陸。聯合參謀部預計需要五百萬軍隊參加作戰，這時候的估計，日本軍隊大約有五百萬人，事後我們發覺這估計是對的，福萊斯特海長告訴我，日本的空軍自殺進攻，增加我們的船舶和生命損失，登陸部隊當然會受到更猛烈的進攻。軍事專家告訴我們，從他們得到的事實來看，單單我們軍隊登陸進攻，會有百萬人的死傷。

我把這許多結論向總統報告，也告訴他科學家，工程師以及實業家向委員會所說的話。他表示他的意見，無論如何的遺憾，他所能看到的，唯一合理的結論，就是使用這原子彈。

我們坐着奧格斯特軍艦到波茨坦去的時候，在新墨西哥的重大試驗，正進行着最後的準備。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大爆炸的一天，總統，李海上將和我正在柏林。試驗的報告，用最嚴密的電碼

來傳達，幾天之後才得到，那時會議正在全面緊張的進行，我是很忙，陸長史汀生送來的消息，使我受到很小的印象，因為我在臨時委員會中的工作，早已使我相信這炸彈是會成功的，試驗的報告，不過是來證實一下而已。

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的合作，使這大賭博得到很大的成功，他和杜魯門總統長時間的討論這計劃，他急於要知道臨時委員會的工作。除了對原子彈在對日戰事中會發生的結果表示重大的興趣外，他也看到原子彈的投放，會產生其他許多可能的事情。

我們面臨着重大的決定。我們不能依靠日本向蘇聯探詢和平談判，而表示可以不投原子彈，日本會來無條件投降，史達林報告說，他得到的最後消息，是日本表示與其無條件投降，甯願作戰到底。在這種情形下，和平談判不過是假的希望，於是我們就靠托波茨坦的宣言。

我們研究了新墨西哥報告之後，總統和我決定告訴史達林元帥我們已經造成這炸彈，除非日本立刻接受我們的條件投降，我們準備使用這炸彈。蘇聯並未對日作戰，他告訴我們準備加入戰爭，所以我們覺得史達林應該知道這事。

三強會議閉幕後，七月廿四日下午，總統繞着圓檯一面走一面與史達林談話。小談後，與我同車回至「小白宮」。他說他告訴了史達林我們造成了一個比任何破壞力更强的炸彈，除非日本投降，我們準備使用他。史達林的回答不過是說，他很歡喜知道這事，希望我們用他。我奇怪史達林的不感興趣，我以為他沒有抓住這新發明的重要性，第二天他會來詢問更詳細的情

形，結果，他並沒有如此。之後，我知道蘇聯對他的武器發明守秘密，所以他也不要來問我們的。

和史達林談話後過了二夜，波茨坦宣言發表，我們希望日本能接受我們的警告，但是七月廿八日，日本首相發表文告，稱這宣言不值一顧，失望之餘，惟有使用這原子彈，史汀生選擇了重要軍事目標，總統批准，不久他返美國。

雖然日首相文告如此，我仍盼日政府能改變其意旨，八月二日離開波茨坦，到美後仍無消息，我認爲避免使用這炸彈的希望沒有了。

總統接受英王喬治邀請赴樸萊茅資小遊，在此搭奧格斯特軍艦返國，我們分別乘機飛往，李海上將與我伴同總統在英艦光榮號上承英王歡宴，英王已從邱吉爾那裏知道這炸彈試驗的成功，而急於知道全部的情形。席間的談話，大半都集中在這炸彈上，下午英王蒞奧格斯特答訪，去後，我們的軍艦啓程返國。

八月六日，總統與我，正與海軍人員進餐，中午十二時方過，格雷漢艦長匆促入內，將海軍部一簡短消息送呈總統，內稱廣島已在數小時前被炸，十分鐘後，格雷漢又送來第二消息，是史汀生的，內說這炸彈的成功較我們希望者更大。總統高聲讀給我聽，並讀給水兵們聽。總統離去時，鼓掌歡呼聲大起，總統又往軍官室向艦上軍官宣讀，全艦歡呼。數分鐘後，艦上的播音機，開始廣播華盛頓發表的布告，報告這炸彈的消息及其發展。

我想廣島——日本國內陸軍南方的大本營——的被炸，一定會使日本相信波茨坦宣言中所表示的意義。同時，投下數百萬的傳單，警告日本人，所列十大城市的一個，將為第二個目標。我們沒有得到他們的答覆，八月八日，第二顆炸彈向長崎投下。

和廣島一樣，長崎的損壞同樣的慘烈，日皇不等我們再作進一步行動，他打破日內閣的僵持，在八月十日，提出投降。沒有人會懷疑這是原子彈的破壞力，影響到日皇和內閣的行動，戰事的結束，這原子彈救了不少我們戰士的生命。

無論參加造成這炸彈的，或決定使用的人，沒有一個感覺到快樂，要執行一件任務，竟犧牲這許多人的生命，大半多是平民。日本投降後不久，許多人要求我們立即告訴全世界全部我們所有的原子彈科學上和工程方面的智識。有識之士主張國際管制原子能，也有人並不如何注意必須要的保障來防止國際協定的破壞者，我同意科學家的意見，別的國家會製造成一顆原子彈，是無可避免的。但除非我們獲得充份的保障，吾人不能讓他們能把製造的時間縮短。任何國家反對在安全保障下將原子能完全交給一個國際機構來管制，我們能不讓這顆炸彈落在他們手裏，這時間愈久，世界人民愈幸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艾德禮首相偕加拿大總理金氏來華盛頓，與杜魯門總統商討未來原子能的政策，到後，總統邀請他的賓客，在星期日坐了他的總統艇惠廉斯倍雷在波多瑪克河上遊覽，這集會中還有哈里法克斯大臣，安特遜爵士，李海上將和我。下午談話開始，晚間又繼續，

後又連續了幾天。十一月十五日，總統，艾德禮，金氏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三國政府同意在國際行動的需要下，受聯合國的監督，對原子能加以管制，保障僅使用於和平用途，宣告原子能武器及其他可能大規模破壞的武器爲非法，在檢查制度下規定有效的保障。

歷史上沒有像我們國家如此寬大慷慨的貢獻，我們化了如此鉅款，與盟國英國，加拿大合作，造成了如此可怕的武器，我們可以保守起來，作爲威脅其他國家讓步的武器，但是，這三個國家急急的願意把他貢獻給一個國際機關，作爲和平的用途。

我預定次日在南加洛林那州却爾斯敦演講國際貿易，自從這歷史性的協定公布後，我重寫了第一段演說詞，我不願意失去一個叫人民注意管制原子能的重要性的機會。「如此，原子能可以不用作戰爭和破壞，而可以爲世界製造和平與幸福。讓我們的思想勇敢些」。同時我警告他們說：「我們不能憑自己的理想，以爲過了一夜，一個健全的世界政府會建立起來，民主，賢明，有能力保護我們。如果我們要使文明生活繼續保存下去，我們必須利用手頭的物件，來增強現存的機構，使他們能忍受我們嚴重的試驗」。對於華盛頓公布的計劃，我解釋說：「這是漫漫艱難旅途中的第一步，建立保障使我們不受無可形容的破壞，是全世界各國的責任，若非全世界各國的合作，沒有對付原子彈有效的方法」。

一個月後，我借貝文外相往莫斯科，攜去了根據十一月十五日華盛頓協定的切實建議，主張聯合國成立一委員會，來商討原子能和其他有集團破壞力的武器。

我建議把原子能的議案放在議程之首，莫洛托夫反對，要求放在最末。雖然我奇怪他的主張，我是同意了。最初，我以為因為蘇聯一位最有名的科學家，據說是一位原子物理學的專家，現在巴黎，莫洛托夫希望他來參加討論，所以把議程改遲。後來知道這理想是並不成立，這科學家回到了莫斯科後，却並不參加會議，我才知道莫洛托夫的要求，是要叫我們感覺蘇聯對原子能問題並不重視。

在莫斯科和在波茨坦一樣，此後在倫敦外長會議中，沒有一個蘇聯代表表示他對於原子能的奇異。在波茨坦，總統和史達林談話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不再提這事。在倫敦，莫洛托夫就表示不感興趣，我決定我當時在波茨坦的斷定是對的，就是蘇聯永遠不對任何人透露他們的新發明，所以對人家的發明表示好奇心也認為是不對的，

原子能議題的展緩，却使哈佛大學校長康納脫博士大為煩惱，他是伴我到莫斯科作我的顧問的，他希望任務完畢，原子能議案通過後，趕返美國料理許多等着他來的事情。豈知，他連坐了十天，討論和他無關的事情。他坐在我邊上有一天斜過來對我說：「我想美國全國各大學的校長應該參加一次外長會議，他們才會感覺需要極大的忍耐，來和我們的蘇聯朋友得到一個協定」。

康納脫博士在莫斯科，常常引起莫斯科報紙的注意。他與我都希望有幾位蘇聯的科學家會來訪問他，結果他們並不來。

一天下午，莫洛托夫招待三國代表團，他和康納脫博士談話，莫洛托夫表示，美國像哈佛的

如此一個大學的校長來到了莫斯科，應該對莫斯科大學演講一次關於原子能的問題。晚上博士告訴我莫洛托夫的話，他表示願意去演講，如此可以揭破這層「鐵幕」，來說明我們對原子能的意見。不過他不能決定莫洛托夫是真有這意思，第二天我對莫洛托夫提起這事，說如果你真意如此，康納脫博士很願意去演講，但是莫洛托夫他說他無權代表學校邀請，不過說說而已。

最後我們討論到這原子能問題的時候，莫洛托夫對我們的提議，不過修正了幾點，加以修正後，我們接受了蘇聯的建議。一點是提議設立的原子能委員會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關係，看到安全理事會最主要的責任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修正的決議案中規定，有關安全的事件，安全理事會應該指導這原子能委員會。安全理事會是在經常會議，有權力可以採取行動。聯合國大會並不在經常會議，會議中也不過能通過建議而已。

聖誕前夕，史達林邀宴，我告訴他康納脫博士是一位卓著的教育家，更其是一位使原子能計劃成功最有貢獻中的一位。史達林不像莫洛托夫的漠不關心，他說，雖然他不完全懂得科學家的術語，他的確做了偉大的工作，發明原子能的美國科學家，尤其應該向其慶賀。

幾分鐘後，莫洛托夫代表主人向康納脫博士舉杯，在玩笑中表示，希望博士的衣袋中不會有一顆原子彈。康納脫博士也以玩笑的樣子來致答，坐在我邊上的史達林元帥起立致詞稱，對康納脫博士的工作，如此不重視，表示不滿。他說康納脫博士和他的同工者已有偉大的貢獻，對他們的成功，他要表示慶賀。



自莫斯科返國後，在赴倫敦出席聯合國大會前的幾天，我照我們的提案預料可以通過的辦法進行，我委派了一個委員會，開始工作設計，預備原子能委員會成立後，把計劃提出去。這委員會包括副國務卿艾契生（主席），前陸次麥克勞埃，勃許博士，康納脫博士及格洛夫斯將軍。

在倫敦，英政府以在莫斯科起草的提案，代表安全理事會五個永久會員及加拿大，提交聯合國大會。一月廿四日，在全體一致不加修改的通過這提案之前，我向大會發表一篇短詞，說明管理原子能共同責任的重要。

聯合國大會通過這提案的前一天，我在華盛頓委派的委員會又委派一個諮詢委員會，以李林泰爾為主席，其他委員是紐傑賽電話公司總理巴那特，洛斯阿拉摩斯原子廠主任奧本漢墨博士，孟山都化學工廠副總理湯姆斯博士，以及通用電氣公司副總理惠尼。

所謂「艾契生李林泰爾報告」，就是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工作，這報告通過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八日向大眾公布。公布的原因是要引起全國的熱烈討論，結果是成功了，報告中所列的幾項目的，也得到普遍的贊同。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副國務卿艾契生把報告書摘要向全國廣播。他說：「這報告書擬定一計劃，任何國家不得製造原子彈，或者原子彈的材料……今日美國所保有的原子器械的絕對優勢是暫時的。我們必須利用目前的優勢，來增進國際安全，並實施我們經過國際協議來建立永久和平的政策」。

因爲要把艾契生李林泰爾報告書中的建議製成可以實施的計劃，我介紹巴魯樞給總統。第一次，第二次大戰，巴魯樞都有特殊的勳績。我在戰時動員局局長時，他是我的顧問，也會擔任總統的非正式顧問，和好幾個軍事機關的首長。他已經退隱休養。因爲鑒於這工作的重要，他同意担任下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總統把委任送參院，很快就通過，他的委任很得到大眾的擁戴。

法律上規定，聯合國中我們的代表和各項委員，必須遵從經過國務院發出來的總統決定的政策。關於原子能管制，巴魯樞請求指示美國的政策，我就請他起草，巴魯樞，漢柯克，艾契生和我，經過好幾次會議，議定了一篇包括廣泛長十一頁的政策聲明書，呈送總統後，總統，巴魯樞和我三人再經過一次檢討，修正了幾點，總統就交給巴魯樞作爲他的指示。總統也告訴巴魯樞，爲要達到政策上的目的，在方法上有時可用自己的判斷。

這美國的政策，在這指示中所說明的，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提交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主張成立一個國際全權處理原子能發展委員會，把各種原子能發展，用途，製造原料都交給他的處理。包括下列幾項：

- 一、管制危害世界安全的各種原子能活動。
- 二、管制，檢查及發給原子能許可證的權力。
- 三、培養原子能作爲有益用途的責任。

四、負責研討發展原子能知識，使當局明瞭進而檢查原子能的誤用。

巴魯樞說，在一個有效管制制度，包括廢除原子彈作爲武器，同意成立實行後，違反管制規則的處罰也加以規定，原子彈的製造，應該停止，現存的原子彈，應該依照條約的規定處理，委員會應該完全明瞭製造原子能的情形。

這政策中也規定違反下列者應加以處罰：●非法的持有或使用原子彈及其製造原料，●製造工廠及其產業的充分沒收。

從開始起，他就堅決主張條約經核准後，任何國家違反條約，製造或使用原子能應該規定立刻迅速加以切實的處罰。在這種違反條約的情形中，安全理事會的任何永久會員國，不得對委員會的處罰使用否決權。我們主張，永久會員國在這種特殊情形下，應該先行放棄否決權。

從六月到十一月間，委員會的一切動作，隨時向大眾公布，外長會議在紐約舉行的時候，巴魯樞和他的同事討論，商定請原子能委員會立刻通過美國的提案。

巴魯樞幾位先生把這問題研究了六個月，深知美國的提案除了蘇聯和波蘭外，可以爲每個會員國所接受。蘇聯代表葛羅米柯還是一年來我在外長會議中所遭遇到的拖宕政策。他們叫我注意到委員會中有二個委員在十二月卅一日任期屆滿，如在那時候還沒有行動，明年一月中葛羅米柯一定要提議展期，說是讓這二位委員有充份時間可以研究這問題。他們的意見是對的，我同意他們應該立刻採取行動。

十二月五日，巴魯樞向委員會申請立刻行動，並根據美國的方案，提出許多材料和建議。他說明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開七十次以上的會議，應該採取這一步驟，委員會除了蘇聯和波蘭外，同意採取行動。最後，十二月三十日，委員會投票決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成立一個包括一切國際管制檢查制度，聯合國全體國家簽訂條約來規定這制度的職權，投票的結果是十對零，蘇聯、波蘭除外。

報告書中建議成立一國際機構來提倡國際間交換把原子能作為和平用途的科學知識，防止把原子能作為破壞目的的用途，並實施職權來保證僅僅作為和平之用。這機構要負責研討發展最前進的原子能知識，而付以特權可作原子能充破壞目的的研究。

這機構的代表付以不受阻礙的權力，可以進出每一參加國家的境土，並在國境內實施檢查。這機構有權力可禁止原子武器的製造，保存及使用，處理現存的原子武器，並確實保證製造原子武器的材料，祇充正當的用途。

委員會說明這條約中應明白規定如何才是違反條文，並規定足以造成國際罪惡的範圍。還規定如何實施如何處罰違犯者，嚴重的違法應該立刻向簽字國家，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報告。

委員會並贊同，一旦違法事實成立，處罰方法決定，違犯的国家應放棄否決權的法律保障，如果違法事實十分嚴重，聯合國公約五十一條所承認的自衛權可以實施。

最後，報告書中規定，條約中應該包括使這管制檢查的國際機構得見實效的全部程序，並應

規定逐步工作的程序。委員會得以決定某項階段工作已完成，而開始其第二步。

在巴魯樞要求原子能行動的時候，同時莫洛托夫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一個普遍軍縮的議案。我對之並不以為嚴重，蘇聯代表是想要把原子能委員會和普遍軍縮委員會合併起來。

如果這次努力成功的話，自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後，成績將大有可觀。安全理事會連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成立一個軍事部隊來實施聯合國的決議都不能得到協議。如果要把普遍軍縮的程序包括海陸空軍的減縮在內，要得到一個協議，所費時間之長，可想而知。如果把兩委員會合併，想得到一個管制原子能的協議，那末會有更多的推諉與延宕。

雖然原子能的管制是很明白的需要，除了蘇聯及其衛星，管制的計劃也得到了各方的贊同，要成立一個協議，還是遙遙無期。管制這主要武器不能得到一協定，其他軍縮更不可能。蘇聯並不考慮巴魯樞提供的美國議案，却提了一個管制其他武器的議案。蘇聯的政策是非常漂亮，「軍器」二字對厭戰的世界是如何的中聽。這是如何的愚笨，火藥已經發明了，還要剛開始限制弓箭的使用。聯合國大會堅持兩委員會的工作，加以分開，蘇聯代表還是要把他們合併。

我想我明白了他們的目的。經過這兩委員會的合併，他們可以從在莫斯科議定經聯合國通過的原子能決議案中逃避出來。這決議案中規定保障和充份的檢查。委員會必須第一期工作完成後，再開始第二期。莫洛托夫反對這一點最烈，結果是接受了。我想他事後懊悔，這一節規定檢查管制實行有效後，然後交換情報。如此，這國際機構中的別國委員，可以檢查蘇聯工廠，這與

他們保守祕密的制度衝突的。

所以這原子能決議案，蘇聯希望世界上把他忘了，而很想把他廢棄的，他們阻止有效管理的理由是同樣的明白。葛羅米柯表示，照美國的提議，「成立一無限權力的檢查制度，是可能會干涉別國的國內經濟生活」。蘇聯在想，資本主義的干涉比原子彈還要可怕，保護蘇聯的經濟制度，比較保護人類避免原子彈戰爭還更重要。

這種恐懼說明了蘇聯對原子能問題實施否決權的態度。葛羅米柯說，蘇聯不願意把他國內的經濟命運交給一個多數票。他辯稱，否決權是保護國家主權所必需的。

無人想干涉別國的國內經濟生活，但是蘇聯的猜忌太深，他們以為國際機構的代表的檢查，是會干涉他們國內事件。葛羅米柯每次對軍縮及原子能管制所發表的言論，完全是在這一方面，也是蘇聯在戰後數年所進行的，但是美國不能同意一種可以使任何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避免有效檢查的方案。

倘使美國毀滅了他的原子彈，同意不再製造，日後又違反協定再度製造，我們自由的新聞報紙就會立刻發覺而公布。在蘇聯就不可能。如果蘇聯得到別國的科學情報和製造方法，決定設立工廠，製造炸彈，蘇聯以外，沒有人會知道。到紅軍預備使用他的時候，那已經太遲了。

我知道蘇聯政府的官員會說他們是很謹慎的遵守協定，我也並不說他們違反協議，但是他們

自有一種特別解釋的方法。

如果蘇聯拒絕參加在莫斯科與倫敦原則上同意接受的保障安全的條約，這是有效管制原子能所必需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如何對付？這回答是，我想沒有別的，一個不快樂的回答，我們祈禱盼蘇聯領袖能改變他們的意旨。同時，我們要用我們的全力，來製造更好更多的原子炸彈。爲了保護我們自己，我們要繼續推廣我們科學知識的疆界。這是一個殘酷的論斷，不過武器的性質如此，需要我們顧算到事實。

我們並沒有，相信將來也不會，使用「原子彈」政策犯了罪。有人或者會疑心我們如此，因爲在同樣環境下，他們會如此的。但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在南加洛林那州却爾斯敦說過，猜疑我們用原子彈來作爲外交或軍事上來威脅別國的工具是非特不對，而且是對美國政府和人民一種完全毫無證據的責難。

這是我們傳統的民主主義，我們作戰，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沒有國會通過宣戰，總統無權命令使用原子彈，否則有受彈劾的危險。深知我國人民愛好和平的人，不會相信國會貿然宣戰違反聯合國公約下我們神聖的責任。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一年，就可證明國會宣戰的如此緩慢。沒有理由可相信，會歡喜參加未來空前酷烈的戰爭。

我們在等着原子時代的實質，侵入蘇聯領袖的恐懼和猜忌裏面去，我們不能讓廣大的美國首先在人民的心目中起了誤解。事實證明我們不願意繼續製造原子炸彈。

自從原子能力之後，在這一年中，我們已做了下列幾項事情：

一、獲得我們共同合作發明原子能的國家的同意，把原子能置於國際管理之下。

二、獲得五強的合作，發起組織一個機構，來計劃國際管制。

三、獲得聯合國一致同意，通過這提案。

四、製成一詳細計劃，設置代表全體聯合國的原子能發展委員會，來管制世界原子能。

五、經國會的通過，成立一平民委員會：來嚴密管理所有含有分裂性的原料。

六、開放有電子活動性的原料，供醫學，生物學及科學的研討。

七、提供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我們的國際管制原子能的詳細計劃。戰後一年的幾個月之內，

我們的計劃，除了二個委員之外，獲得全體委員的通過。

我不同意有人預料蘇聯如果繼續阻撓這工作的進展，集團的毀滅在數年內會隨之而來。在這次大戰中，德國、日本和我們同蘇聯、英國一樣，都保有毒氣彈和致人於死的細菌彈。戰爭並非像舉行一個茶會，這是殘酷的，結果沒有國家敢用，他們知道人家也會同樣用來對付他們的。

我說這話，並非減低危險程度。如果戰爭的國家持有原子彈，這是何等的不幸。但是，如果把我們的炸彈拋棄，把我們的情報供給任何國際機關，而沒有充份實施有效管制的權力，卒使別國政府在我們不知不覺之中，製造原子彈，這更是何等的不幸。



未來的歲月中，沒有比這更重大的來向人類挑戰。在我們目前，盼望恐懼和猜疑會向智慧屈服，保障原子能用作爲人類謀福利，而不是供恐怖的戰爭。

## 第十四章 俄國人以後如何

在他們熱切而渴求的和平願望中，美國人民腦海裏對於蘇聯看法，總是存着許多不安之感。而我所時常接觸到的有二個問題，那是：

他們喜歡什麼？

此後他們如何？

這二個問題都問得很得體，爲了要尋求蘇聯領袖與人民若干諒解，又爲要明瞭他們計劃方面的若干意見，因之使我們的能力，對於可以促進和平而擬訂政策的成就，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對於第一個問題，我所能做到的最好方法，乃是超乎我個人經驗之上的。不過，第一個問題的結論，憑那種經驗已明白指出：俄國領袖們是意志堅決而又機警善變的談判老手。

我之與人交接，已具深刻經驗。當我實習做律師時，已有此種經驗，在衆參兩議院服務時，又與二千個以上衆議員及近二百個參議員週旋過。其後又擔任過最高法院法官，經濟平衡局局長及戰事動員局局長，在那個時候，我爲許多公務上關係遇到許多人，並且解決許多案件。但，在這許多年之間，我却不會有過準備與莫洛托夫談判的經驗。

記得有一次我在倫敦，有一個新聞記者不大相信莫洛托夫會不願與我們交換意見而甯願讓會議破裂的事，他以懷疑的口吻問我：

「但你是否可以肯定說，你已經探求出可以解決此項問題的每一條路徑呢？」

我回答說：「朋友，我不但已經探明每條路徑，而且我還走踏過每一條巷弄，小街以及大道哩。我把昔日在衆參兩院學來的一切方法都已試驗過，可是我在衆參兩院那裏是以服從多數爲守則，但這裏却像在開一個陪審委員會。假如你們之間有一位固執成見的陪審官，那末，你們全體所能希望到的，只是一件誤審案件而已」。

我常這樣想：與莫洛托夫談判，倒能給予律師以最深博的經驗。對莫洛托夫的戰略，我曾經申述過，那是在會議草約業經簽字我已離開了莫斯科會議那時的一件事，莫洛托夫會在第十小時的最後時刻中，經過考慮以後，於是宣布他已經決定接受上一日下午巴爾幹一案的美國建議。從那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莫洛托夫寬闊的胸襟與忍耐力來。假如史達林的耐力是被人說不錯的話，那末，我可以說，莫洛托夫實是他的入門弟子之一。他有無窮的耐力，又有很精密的頭腦，而且更具堅強的毅力。任何人加於他身上的狂暴或是壞脾氣，在他看來倒反成爲一種娛樂。

一九四五年九月，倫敦召開第一次外長會議時，其他會員國都認爲多得喀尼斯羣島應該從義大利移讓給希臘，並且應該解除武裝的；但是莫洛托夫却故取反對態度。他說他雖然到了末了或會贊成移讓辦法，可是他却反對解除武裝的提議。就當時蘇聯對希臘的明顯態度上看來，我們可

以肯定地說，他是不願希臘現政府有武裝多得喀尼斯羣島之權的。原因是他要保留着行動權，希望共產黨控制希臘以後，可以來武裝該島，或者他在以後提出領土要求的談判時，來作討價還價之用。我們每天想問顯付諸實踐，但他每次總是推諉說，他要請示政府後，再作決定。我們假如要他立即請示政府聽取訓令時，他却又說：政府要考慮之後才能答覆。一月過去了，他還是沒有接到政府的訓令，而我們只得散會了。第二年四月，我們在巴黎相遇時，他那時不能自知獲得同樣諒恕，於是提出一個新的答覆，說他之所以不贊成，乃是因為希臘從來不會向蘇聯提出過接收該島的要求過，我們最後指出事實，並且經過幾次激烈的爭辯，說明有許多領土的轉移，從沒有經過請求一舉，至此，他又說任何事件，應該視作與其他領土問題的解決有着其連帶關係的。

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議不久之後，我們又談到了多得喀尼斯羣島問題。莫洛托夫說，他希望能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那天早晨他接到報告，說是因為希臘大使往訪維辛斯基，所以必須等候那次會議的結果。我們一批人對於他這個最新異而又最露馬脚的把戲，均報之以一笑。當時甚至連莫洛托夫自己也笑出來了。一直等到許多問題的解決使他滿意以後，才建議多得喀尼斯羣島應該割讓給希臘，而且不准該島武裝。

莫洛托夫還喜歡討論議程問題，他爲了什麼問題應該排在議事日程上，可以與人爭辯達數小時之久。你不但應該有耐性，而且必須小心注意到你自己提出建議時的態度。假如你不這樣做，

那末，將來你在大會討論之前，會費去你幾小時口舌，來報告你全部的提案。那時莫洛托夫的答覆會用俄文說「否」字。這是我所常聽到的。他能說英語的「我贊成」幾個字，他贊成的事極少，他的拼音也不很正確。

在任何會議中，不論是否在和諧空氣裏，他會運用他的延宕戰略中的機智，來贏取你免強的欽佩。他端坐席中，泰然自若，用手撫摸着短髭，或是按動擺動他的夾鼻眼鏡，來等候他人翻譯，一邊吸着俄國捲烟，那捲烟好像是一串鏈條，莫洛托夫可說是所有蘇聯代表中的典型人物。他的另一熟練的戰略是反攻。任何時候，莫洛托夫總是抱着懷疑態度，認為美國或其他國家總是打算對蘇聯的失敗提出一種理由來說服他，以期取得如雅爾達會議的新聞自由，選舉自由等等的同意。他有時自己挺身而出來，擔任進攻任務，有時則改由衛星國家來出場。而且這些攻擊時常為對付希臘而發的。他譴責希臘的腐敗，抨擊希臘對蘇聯和平的鄰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諸國有侵略意圖及不正當的攻擊，他大聲疾呼地反對不列顛帝國主義者對於希臘人民的統治，說是不列顛帝國主義者之駐軍希臘，全為抑壓希臘人民的自由，並且是在支援希臘法西斯主義者。他常常表示着深切的遺憾，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援助英國，而英國之處理失當，美國是應該負其責任的。他一再責難希臘，其後已變成為家常便飯，我奇怪他自己已經變成相信自己鬼話的人了。

凡是莫洛托夫所不贊成的人，就時常被他們稱之為「法西斯主義者」。所有共產主義者及同情

共產主義者的人，他都稱之曰「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簡單的分析。康納萊及范登堡倒從來不會有直接被莫洛托夫稱之爲法西斯主義者，但是共產黨報紙却是這樣錯看了。他們兩人都被稱之爲「大資本集團」的代表，那時巴黎共產黨目參議員范登堡爲法西斯的真正代表人，但是參議員康納萊在那個時期負着領導責任，在特里斯特的和平會議上，代表着美國地位。共產黨報紙對這些事實，知道得非常清楚，認爲假如當時祇有我一個人的話，我或許會做得不錯，可是有了這兩位「法西斯」參議員在我身邊，使我受了影響，成爲反對「民主」的力量了。

當我離開華盛頓去參加和平會議時，這兩位參議員因爲參議院中有若干重要事件不能動身，因此留在華盛頓，但他們同意過了若干時日再來巴黎。那時我對他們取笑說，我可以不再受他們「壞影響」了。大會開幕後的一個星期光景，莫洛托夫譴責美國及聯合王國違反協定，說是我們兩個國家違反了外長會議所決定的關於和平會議的議程。那時我已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而我早已料到他會提出此項譴責的，因而我在會議之中耗費了很多時間才算製成了記錄。在那個記錄中，我們保留着隨時可以對議程問題的我們見解有投票權。因爲他們這個不守信義的譴責，對我實是說得太過分了。我宣讀記錄後，又對莫洛托夫發表了若干意見，這些意見實是我所極不願意發表的。這可說是我對他從來不會有過的最嚴厲的批評。我們代表團向我建議，我應該送這篇演說詞給二個「法西斯主義者」一讀，因爲他們也是與我相似的和平人物了。

某天下午，在巴黎會議終了之後，契柏·波倫依舊與一位蘇聯代表談起了此事。這位蘇聯代

表說：要他瞭解美國人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具有貿易老手的聲望，而貝爾納斯國務卿却對原則一連演說了二天，真好似一位大學教授。「他爲什麼不停止談原則問題，走下台來開始談生意經呢？」這位蘇聯代表詢契柏時倒是完全出於至誠的。契柏解釋說，在美國人意見中這是有問題的，因爲關於原則問題是無法用討價還價方式來解決的。

我與史達林元帥及莫洛托夫談話，所得經驗完全不相同。莫洛托夫迂迴曲折，而史達林是直接的。但在我與史達林所有接談之中，我不會忘記一段故事，那是羅斯福總統所告訴我的戰爭初起時他與史達林來往信札的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史達林一封信，信內措詞，十分粗野無禮。他口授祕書以同樣語氣來覆史達林，但是決定將此信壓着緩一天發出。果然，第二天早晨，當我遇到總統時，他收到史達林的第二封信，信內措辭非常謙恭尊敬，涵蘊着偉大的個人友情的保證。羅斯福對於此種極端相反的舉止，真是覺得無法理解，但是此類事情，發生却不止一次。

我在雅爾達初次觀察史達林時，我也不能瞭解總統所得的經驗。史達林對總統平時總是缺少謙恭懇勸的態度，通常處處顯露出不耐煩與羅斯福成立協議。總統却時常以適當的幽默態度處之，又以嬉謔態度怡娛着自己。我所得的深刻印象，並不因此而有所減損，比如我有一天下午在會議之中，親眼看見他向坐在他背後的一位紅軍將領招手，請他出去倒一杯茶來。我是知道許多小兵的脾氣，他們往往願意支付鉅額金錢去請人能命令一位將軍來等候他若干時間。

不管蘇聯人物之間有什麼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說，凡是莫洛托夫所尋求的目的，多是經過

史達林元帥核准了的。只有在波茨坦談判到賠償問題及蘇聯反對訂立四十年協定的一次，我覺得這倒是莫洛托夫使史達林受了他的支配。至於其他地處，這是很顯明的，史達林在唱戲——而莫洛托夫無論演得多久，只都是一套雙簧而已。至於政治局究竟能影響史達林多少，無從知道。我的猜度是史達林採納政治局建議，只有在他對這件事情無特別興趣或是沒有堅強信念的時候才是如此。他與每一個成功的領袖相同，他明瞭應該把握着他的僚屬的協助，乃是事實上所必需的。不過，遇到史達林有堅強信念而要反映到任何與外交有關的事件上時，我可以斷定，政治局總是支撐史達林的。我目擊他曾經對許多事件能很快地當機立斷，這使我想到他對政治局有着控制權力而不必有所顧慮。史達林與政治局的委員們自然也瞭解他們不能盲目地去服從他們的決議案的，除非他們能夠給黨的工作人員及其人民對於一切重要事件應有團結一致的印象，而後纔可以如此做法。

我想，我已經說得夠了，不過，我還得指出一個重要事實，即我們必須記住蘇聯每一行動的目的，事實是他們到了終極時任何目的總要明白的。因此，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須要提出的，就是蘇聯領袖所想的終極目的究竟是什麼，換言之，即是俄國人以後如何？

我的經驗證明了只有一個答覆。這個答覆可以從俄國歷史中尋求到的。充分熟知俄國歷史的美國人不多。我並不自承為熟悉俄國歷史的人。可是，我所知道的已經足夠來推斷，今日使我們撲朔迷離的如許問題倒已經可以來作那歷史的註腳了。我們不必管到俄國革命的暴力如何，其實



布爾什維克外交的目的，比之沙皇時代的政策並沒有多大區別。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的目的，自戰事終結以來其所追求者，實際與希特勒所提出的要求可說並無二致。

在戰後幾年，俄國的拓展主義已使我們的關切深刻到如此程度，此種主義早已暴露無遺，且為舉世所驚奇。此在共產革命的鼻祖馬克斯於一八五三年由倫敦致函紐約論壇報的關於領土要求問題的文件中，已經說得十分明白。時至今日，馬克斯的話與現今蘇聯政府的所作所為，可說完全一樣。

一八五二年之後，俄國繼續不斷要求領土權，這樣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總計自一八五三至一九一四年的沙皇時代為止，俄國一共得到九七一、三七七平方哩的領土，使戰前的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增至八、六四五、〇〇〇平方哩之大。

隨着蘇維埃政權之降臨，使俄國喪失了近五十萬平方哩的領土。新的蘇維埃聯邦使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都成為獨立國，脫離了俄國的版圖。此外喀爾斯給了土耳其，比塞拉比亞還給了羅馬尼亞，還有一大塊土地喪失在新的波蘭手裏。

在蘇維埃政權下最初二十年之間，唯一的領土擴展是在一九二六年併吞了北極的若干島嶼，但到一九三九年蘇聯進入活躍的拓展政策時期。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四五年底止，蘇聯兼併了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比塞拉比亞、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波蘭及芬蘭之一部，東普魯士之科尼斯堡區，橫巴爾阡烏克蘭及丹奴圖佛這許多地方。此外又拿到旅順港，該港

的領土權雖未包含在內，但與中國共同掌握了三十年此一軍港的保有權。總括起來，自一九三九年後，蘇聯得到的領土將近三十萬平方哩，使蘇聯的領土面積增致八、四五五、九三九平方哩，與俄國沙皇時代的最最大版圖已屬相差無幾了。

至此，事實已很顯明，這種拓展主義早已不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新計劃了。此種意念係根植在俄國歷史上，其所不同者祇是人物與戰略的變化而已。

蘇聯的當代領袖們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明白表示，透露出他們是十分願意獲得他們終極的目的。這可以從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協定以及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不侵犯協定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的一段時期中，看得明明白白。

在雅爾達的一個餐後會談中，史達林說明蘇聯政府從來沒有真正與德國進入於不侵犯協定狀態之下，所以；在慕尼黑的目的，並不是在討好希特勒。誠然，這是真實的，慕尼黑協定之後，蘇聯報紙開始向德國減少抨擊運動。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蘇德兩國重訂貿易協定，蘇聯報紙覺得有自由可以歡呼，祝賀蘇德關係已進了一步。不久之後，史達林在共產黨大會發表演說，謂德蘇之間唯一不同之點為觀念問題，而這些不同之點却被他國故意渲染，這是因為他們希望別人能為他們「火中取栗」之故。及一九三九年春，史達林對蘇聯與法英之間談判的不滿態度已為舉世皆知，而素稱熟悉「西歐」情勢的外長李維諾夫致被罷黜，起用了莫洛托夫。

希特勒對這些談判，好似漠然置之，這種態度，一直等到那年夏天，希特勒明白決定他需要

蘇聯的支援來實現他的有計劃的進攻波蘭時才有了改變。接着事態是發展得這樣快，他們使全世界各國覺得迷惑難解，同時也使我們爲之震驚，因爲我們依舊期望戰爭能够避免啊。

那些談判的經過情形，始終真相莫明，直待那些記錄從鹵獲的納粹政府檔案中發現之後，才知道真情。那些檔案使我們對於蘇聯究竟在尋求些什麼的瞭解上，可說是有極重要的幫助。一部份史料中包括莫斯科德國大使館參贊希爾格爾所報告的參與談判的主角。在談判中希爾格爾所担任的是舌人工作。他的報告是根據當時的筆錄寫成，那時他不至有存心，即有意把它寫得不真實或是假造的。至於其餘的史實，是以德國外交部卷宗中的正式文件作爲根據的。

這些記錄全是德國的，因此，不會得到蘇方的證實。不過，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其真實性，其中，關於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前的決定命運之年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有記述。同時也沒有人可以忽視這一事實，即是在這些記錄中可以找尋出資料去瞭解今日那些坐在克里姆宮內那些權貴在想些什麼。是否他們只求安全呢？他們除了尋求安全之外，是否也企圖擴展他們對其他國家及人民的統治呢？這可說是一種常例，要說出一個人頭腦中在轉些什麼念頭，很可能從他以往同一文件中所言所行的事實，來窺見其梗概。那末，讓我們來看這些記錄罷。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德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基倫堡奉令通知莫洛托夫：（一）觀念的不同，不一定能使邦交發生阻礙，而且德蘇兩國之間，沒有真正利益衝突的事實。（二）德國對蘇聯沒有侵略的意圖，相信此類像波羅的海國家的問題，可以在互相滿意之下求得解決；（三）資

本主義西方民主國家在企圖拖拉蘇聯對德作戰，而這個戰爭只是對資本主義國家有利而已；（四）英國熱中於戰爭者爲了要阻止德蘇友誼的增進及使解決東歐領土問題成爲不可能，必欲澄清蘇德邦交；（五）所以外長里賓特洛甫甚欲至蘇一行，向史達林說明希特勒的見解。

當德國大使呈遞此一諜文時，莫洛托夫表示極感興趣，不過，認爲舉行此類會談當應有所準備。他想知道德國政府對於兩國訂立不侵犯協定意見如何，還有德國是否可以用它的關係對日本改善日蘇之間的關係。他還主張確切決定在建議的會議中應該討論波羅的海國家問題。他立刻得到肯定的答覆。

莫洛托夫對於德國政府願派外交部長來莫斯科談判，深表滿意；這和英國恰成一個對比，因爲英國政府只派了一位文官史屈朗子爵前往。他建議雙方政府即日準備起草互不侵略協定。至八月九日，德蘇商務貿易協定即在柏林簽字。在同一天，莫洛托夫把一份互不侵犯協定的草約交給德國大使。

希特勒已感到不耐。明顯的，他是準備進攻波蘭，但是他急於先與史達林訂約。他於是給一個私人電報給史達林，表示他願意接受莫洛托夫的不侵犯協定的草案。他說：德國對於波羅的海灣和芬蘭愛拉立等國家均無興趣，而這個保證可以放在附屬於不侵犯協定的祕密換文中。同時他建議：這個祕密換文可以定出德蘇兩國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希特勒最後在電文中說：波蘭大天在增加挑釁的行動，任何時候可能發生危機；因此希望史達林在八月廿三日之前能接見里賓特洛

甫外長，後者有權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和祕密換文。

莫洛托夫立刻明白希特勒聲明的重要性。在收到電文半小時之後，立即請德大使轉告德政府說：蘇聯準備即刻接見德國外長，並根據希特勒電文的建議進行談判。

現在有充分理由去相信：史達林對於局勢意外的轉變，深感愉快。他正因為英法之不能參加他所要求的保證而惱怒。他需要蘇聯不被希特勒進攻的保證，他亦知道德蘇戰爭近眼前。他一定會經推想過，假如互不侵犯協定使英法不能援助波蘭，則歐洲全面大戰可以避免，而蘇聯則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發展軍事力量。在另一方面，即使西方強國參加大戰，亦將造成均勢，使蘇聯還有時間進行整軍工作。此外，這個協定使他能不冒戰爭風險而攫取波羅的海的小國。

里賓特洛甫於八月廿三日抵達莫斯科，當時參加會議者，有史達林、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舒倫堡大使和海爾格。會中史達林堅持在祕密換文內應包括蘇聯在巴薩拉比亞有特殊權益的聲明，並規定立陶宛的北部邊境為德蘇勢力範圍的分界線。這項要求當被接受。協定和換文立被批准，在簽字之後，雙方共飲香檳，史達林還提議為希特勒乾杯。里賓特洛甫於後一天即飛返柏林。

從斯基倫堡大使作初步試探到協定成立，只費了九天的光陰！他們獲得同意的速率，予我的印像極深，因為我曾經化十五個月的時間，來取得蘇聯對於五個次要條約的同意。在第一種情形下，他們是願意協議；在後一種情形下，他們實在是不願同意。

雖然兩國的宣傳機構，早已在使人民準備這個政策上的大轉變，但是德蘇人民一定爲了這個突變，而感到神祕莫測。我這個假定證明不錯；在這個氣氛中的德蘇人民，包括共產黨黨報在內，都對局勢的變化難於理解。

我覺得這個互不侵犯協定，是條約無效的典型實例。史達林在雅爾達的聲明，正符合蘇聯代表經常採取的路線：條約簽訂的目的在爭取時間，來應付一個蘇聯認爲不能避免的衝突。現在可以清楚的看出，條約訂立的時候，就完全準備將它撕毀。這裏雖然沒有希特勒意響的聲明，但是却有破壞條約的行爲。在德蘇協定中，史達林與希特勒的誠意都是有疑問的。

希特勒之席捲波蘭，比史達林預期的來得快；而在追逐退却的波軍時，德軍進入了蘇聯勢力範圍。因此史達林要求里賓特洛甫再到莫斯科一次，在瓜分波蘭上再作一次新的協定。

德外長於九月廿七日抵達莫斯科。這次德國同意蘇聯接收立陶宛。瓜分波蘭的兩國疆界亦經劃定，蘇聯想設立自治共和國的計劃亦被贊同。德國允許蘇聯接收特洛霍比茨與巴列斯勞的油田，而由蘇聯按照契約供給納粹三十萬噸原油。在九月卅日莫洛托夫設宴慶祝新的邊界與友誼協定的成立。

從這天以後，在莫斯科可以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德軍的戰報亦在蘇聯政府報紙上的第一版上顯著的登載着。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卅一日的演講裏說：「德國目前的處境，是在力求戰爭早日結束與和平恢復；而英法兩國則是贊成延長戰爭，反對和平」。同時，希特勒亦告訴他的

朋友：德蘇友好協定將有效多年。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更入於蘇聯勢力圈內，他們被迫割讓基地予紅軍。然而，芬蘭却拒絕這種要求。於是，未經正式宣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就被紅軍侵入，而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國家的初期讓步實在僅是蘇聯再進一步的踏腳石罷了。不久，他們就被迫成爲蘇維埃聯邦的一份子。由於此事，希特勒、史達林的合作開始發生了裂痕。

早初的土地分割中立陶宛西南角一小塊土地分予德國，但紅軍進駐該國的時候，把那一塊土地佔領了。於是德國提出抗議。蘇聯雖表示德國是對的，但推說要把這塊地方劃出頗爲困難。這問題遷延了幾個月，蘇聯最後同意付出三千一百五十萬馬克，作爲償還那塊土地的代價。

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又要求羅馬尼亞割讓比薩拉比亞。德國對此不能反對，因爲希特勒曾經說過對此區域並無興趣，接着蘇聯又要求布科維納的北部，這區域事前未會和德國商定過，所以德國反對了。莫洛托夫簡單地答復說，那區域是烏克蘭人所居住，所以他看起來沒有反對的理由，他又溫和地說，蘇聯不懂希望德國贊成這一要求，並且更希望贊成蘇聯不久以後，對布科維納南部的要求。

希特勒發怒了，他想德國會爲獲得土地流過血，如今蘇聯却兵不血刃地坐享其成。德國駐莫斯科大使接到政府的訓令，通知莫洛托夫說德國對於保證羅馬尼亞的領土甚爲關切，德國需要羅馬尼亞的糧食和汽油，同時德國對匈牙利也是如此。大使又說，在不侵犯條約中，關於這相互的

利益，理應先大家商量一下，然而蘇聯在對其鄰國行動時，却並未與德國商量，他舉出蘇聯歸併立陶宛和比薩拉比亞、布科維納的事。

莫洛托夫則堅稱（我差不多還能聽到他所說的話！）德國的反對行動，乃不遵守協定。德國應該知道蘇聯對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很有意思。

雙方因此發生了猜忌。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里賓特洛甫以十九頁的長信，送交史達林，說明在前數月中德國所取的步驟，和它的理由。他請莫洛托夫到柏林去。史達林的回答，甚為曖昧，但他同意改善雙方關係，並說，莫洛托夫將在十一月十二日來柏林。

莫洛托夫和希特勒會晤兩次，一次在十月十二日，另一次在十三日，每次都在三小時以上，討論經過，由斯基米德大使紀錄。在我看來，這是戰事轉變的關鍵，事實上，我相信這一次乃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會晤。因為莫洛托夫太過於玩弄手段，特別是十三日和希特勒的會晤，是外交上重大的錯誤。

希特勒是一個誇大狂的典型。他肯定納粹可以獲勝，所以聲稱德蘇兩國應該協商，如何來分割即將崩潰的大英帝國。他想，德國着眼於西歐，蘇聯則可取東歐，蘇聯渴望的不凍港可以經伊朗、波斯灣和紅海。希特勒的如意算盤是德蘇兩國平分世界。

莫洛托夫精細的，循規蹈距的頭腦，對於希特勒的狂妄計劃並無反應，他同意希特勒提出的是一個有趣的長期計劃，但他說蘇聯所希望討論的是目前的問題。顯然目前雙方間的協議，「不



能使德國滿意」，因為協議上很清楚地把芬蘭劃給蘇聯的勢力範圍，但德國軍隊却駐紮在那裏，他們應該立刻撤退。此外蘇聯對於德國所提保證羅馬尼亞疆界一點必須提出抗議，他很奇怪，德國所謂保證，是對誰而發的？

希特勒這種戰爭的幻想怎樣會不失敗呢！他解釋德軍在芬蘭乃為保護交通線，使瑞典的礦砂和石油可以源源而來，那是對德國戰爭力量極為重要的。但德軍將儘早的撤退。德國所以干涉羅馬尼亞，因為否則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就會有公開衝突，而這對於德國在羅馬尼亞的經濟利益大有損害。希特勒又說羅馬尼亞已割讓土地與蘇聯和匈牙利，因此疆界的保證對於羅馬尼亞的和平與秩序極為必要。德國祇有一個軍事訪問團在羅馬尼亞，那是應羅馬尼亞政府之請求而設置的。他竭力表明，德國對於巴爾幹各國，祇有經濟的利益，並沒有政治野心，他要保護羅馬尼亞的油田以免被人搶奪。

莫洛托夫率直地說，他對於希特勒的答覆很不滿意。他說，蘇聯還要和保加利亞保持更密切的關係，可能與它簽訂一張互助約定，因為保加利亞的地位，和韃靼尼爾海峽有關。最後，他又提出關於韃靼尼爾海峽的非僅紙面而有實際保證的新方案。

希特勒答稱，在未與保加利亞和墨索里尼商量以前，他對此問題不能答覆。

莫洛托夫最大的錯誤就在這裏，他堅持要立刻肯定地答復，據當時譯員的報告，希特勒對此大為不滿。

我簡直能够繪出當時的情景來，希特勒剛剛說過他的信念，他肯定能獲勝利，他想他已統治世界，他正描繪了一幅分配世界的圖畫將一塊龐大的土地配給不傷一人不費一錢的蘇聯。但莫洛托夫却僅僅說這不過是「有趣」而堅欲希特勒立刻答覆在他認為祇是些微小的問題——即羅馬尼亞的疆界，與保加利亞的互助協定。這是不難想像的，易怒而暴躁的希特勒，對於莫洛托夫的大胆很為奇怪，他相信蘇聯政府對戰爭毫無準備，而莫洛托夫竟敢不滿意他的答覆。

歷史學家或能發現，希特勒於何時決定進攻蘇聯。或者他以前已大致考慮過，但除非我看到別的證據，我將相信這一次與莫洛托夫的會晤乃是決定之點。當然從這致命的十一月十三以後，蘇德的關係就急轉直下了。

當天後來，里賓特洛甫將一份協議草案與兩份密約讀給莫洛托夫聽，他建議蘇聯簽字加入軸心國。顯然這些是在莫洛托夫到達柏林會晤希特勒以前就預備好的。草約中說明蘇聯與三軸心國合作，均分世界利益，並決不參加任何反對四國中任何一國的集團。第一份密約中規定希特勒所設想的四國對於土地分配的希望：德取非洲中部，意取非洲北部及東北部，日本佔領本土以南的亞洲區域，蘇聯則得國境以南直至印度的洋所有區域。第二份密約是推翻蒙特婁會議對於黑海海峽的協定，使蘇聯可以無限制地利用海峽；除黑海沿岸國家外，其他強國放棄戰艦通過韃靼尼爾海峽的權利。此外，里賓特洛甫並願在日蘇間作中間人，以獲致雙方永久的友誼。

莫洛托夫對此建議的反應是特別值得注意的。他的反應當從近代歷史的角度來觀察。

日本已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莫洛托夫說，蘇聯尚在等候幾個問題的答覆。關於伊朗必須有「具體」的討論，對於韃靼尼爾海峽，蘇聯並將堅持獲得切實保證。莫洛托夫然後又提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臘、波蘭的將來以及瑞典的中立等問題。他結論說，將來的問題固然重大，但對於目前的問題亦不能完全忽視。

莫洛托夫在他的訪問柏林期中，除這肯定的答覆以外，再無其他了。但在十一月廿五日，他請駐莫斯科的德國大使到克里姆宮來，將一份答覆里賓特洛甫十一月十三日建議的全文交給大使。這一份覆文，由它此後所發生的事件來看，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莫洛托夫告訴德大使說：蘇聯政府準備在四種條件之下接受里賓特洛甫所草擬的簽訂四強協定，即：（一）德國軍隊立即自芬蘭撤退；（二）蘇聯與保加利亞訂立互助公約並在韃靼尼爾海峽建立海陸軍基地，以保證蘇聯在該海峽的安全；（三）承認蘇聯對於巴庫與巴頓以南至伊朗與波斯灣間區域的要求；（四）日本放棄在北庫頁島開採煤礦和石璫油的特權。

莫洛托夫顯然沒有明瞭他在柏林所玩弄的手段是何等愚蠢，也沒有曉得希特勒發怒的程度。蘇聯永遠沒有接到德國對於這一牒文的答覆。

希特勒的緘默，使史達林和莫洛托夫都開始憂慮了。一九四一年一月，他們派代表簽訂了第二次經濟協定。蘇聯謹慎地履行了第一次協定中規定的交貨，現在又同意增加互相交換的貨物。在這一月內，後來莫洛托夫因為希特勒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答，他就提出再與希特勒會談。德國政

府簡單地告訴他說，他的建議已經收到，並已通知意大利和日本，希望能在最近期內再來討論，這種在蘇聯提出建議兩個月以後才來的答覆，很清楚地表示希特勒對此已不感興趣了。所以再度的會談從未實現。

代替來的，是德國在巴爾幹大量增加軍隊。他們將這行動通知蘇聯。二月二十八日，斯基倫堡大使告訴莫洛托夫說保加利亞已贊成三國軸心協定，將在三月一日簽訂一同盟條約。莫洛托夫接到這消息極為關心。他知道保加利亞局勢的發展，與十一月廿五日蘇聯提出建議時的情形已完全不同。顯然，莫洛托夫尚未明瞭他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提議已判定了希特勒史達林間「奇怪婚姻」的最後分離的命運了。

三月一日，斯基倫堡通知莫洛托夫德國將派軍隊進入保加利亞。莫洛托夫立刻當着德國大使面前寫了一張字條表示對於德國以這種軍事佔領來破壞蘇聯的安全極為遺憾。

四月五日，蘇聯差不多在德國進攻南斯拉夫的同時，與南斯拉夫簽訂友好及互不侵犯協定。史達林採取此一步驟的動機不明，當時的說法，則說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可以使德國牽涉在巴爾幹戰爭內而減少進攻蘇聯的危險。然而，幾星期之內，事實證明史達林對於南斯拉夫的實力估計太高了。

此後，蘇聯政府力求避免引起德國不快之事。原料交付得很迅速。當外國報紙刊載德國軍隊在蘇聯邊界集中的報導時，蘇聯政府以塔斯社的官方消息，宣稱這是戰爭販子鼓動的謠言，並說

德蘇兩國間關係甚爲融洽，現有的條約更可說明蘇聯並未受威脅云云。當然他們說的並非真話。斯基倫堡大使也不相信蘇聯的話。他極爲關心，在四月底親自帶一份備忘錄到柏林提對蘇聯有戰爭發生的危險。我不知道說一份備忘錄有沒有送達希特勒。希特勒與斯基倫堡的談話中有沒有提及這事無從查考，但據大使說希特勒與他分別的時候會說不對蘇開戰。

隨後幾星期事情懸而不決。莫洛托夫與斯基倫堡不再會晤。最後在六月中，德國大使接到指示，將蘇聯境內所有德國婦孺靜悄悄地遣送回國。

六月廿二日，莫洛托夫請斯基倫堡來見他，他說德國飛機一再的未同意飛過蘇聯領土，顯屬破壞主權，德國應着手制止此類事件再有發生。斯基倫堡允諾將此事轉告政府。莫洛托夫又說全世界正謠傳德蘇之間將有戰爭，而現在他又聽到德國大使館人員的眷屬婦孺正在撤離蘇聯。他希望德國大使加以解釋。斯基倫堡甚爲窘迫，他說對於謠言一無所知，婦孺的離蘇，無非是因爲暑假的關係。莫洛托夫當然曉得斯基倫堡說的並非真話。

次日，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斯基倫堡接到柏林的訓令去見莫洛托夫，發表如下的聲明：  
「蘇聯軍隊在德國邊界的大量集中，已達到使德國政府不能忍受的地步。因此德國政府已決定採取應付措置」。

「這是否即係宣戰呢？」莫洛托夫就問。

大使以手勢表示出莫可奈何的姿勢。

莫洛托夫說他認為這公文除宣戰外再無旁的意義，因為德國軍隊已越過蘇聯邊界而納粹飛機對幾個蘇聯城市已轟炸了一小時以上。他說德國對於訂有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的國家進攻，真乃世所未見的毀信背約。他又說德國的所謂蘇聯軍隊集中僅是一種藉口，因為蘇聯軍隊僅是例行的演習而已，如果德國政府先來質問，蘇聯可以提出適當的解釋。

斯基倫堡對此並沒有指出所謂「例行演習」乃是「例行的」解釋，他僅僅說他對於這形勢不能再有所論述。

這樣就結束了德蘇間所謂「永久的」——實際僅有二十一個月的友好與互不侵犯條約，展開了納粹與蘇聯間的戰爭。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一段歷史給予我們什麼指示。我想這樣假定是對的，即蘇聯現在的野心仍想獲得當時莫洛托夫送給希特勒的咨文中所要求的領土。其中有幾種要求已得如願。然而勝利的來臨，使使蘇聯政府的野心更爲擴張了。

在北方，蘇聯對芬蘭的要求如願以償，在大戰期間莫洛托夫設法使挪威讓步以擴展蘇聯的權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他要求挪威允許蘇聯在斯畢茲伯根羣島有更大的經濟權利，他要立即佔有熊島以及在別的島嶼上建立基地的權利。

莫洛托夫提出這要求，不管一九二〇年由三十四個國家包括蘇聯在內簽字公認挪威在這些島嶼上有統治權的條約中有一個附帶條件，即挪威在島上不能建設堡壘，且「永遠不能用作類似戰

爭的目的」。挪威政府對於蘇聯的兩種要求，起先都允予討論，後來宣稱，僅能考慮經濟問題，軍事性的要求必須經過多國的同意。

在東方，蘇聯現在已佔有全部庫頁島，此外，並獲得了千島及在旅順大連和東北鐵道的特權。史達林對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東北的成功，是否將繼續不受誘惑截至此時仍爲疑問。

蘇聯對巴頓與巴庫以南土地的希望並未實現，但是它會努力過。它向土耳其要求割讓巴頓以南的卡斯和阿丹汗兩省份。它想擴展巴庫以南而達伊朗領土的行動，則被安全會議所阻止。

蘇聯又想用老手段來建立一紅軍保護下之傀儡政府。紅軍干涉伊朗的軍隊，蘇聯鼓動亞塞爾拜然建立獨立政府。這案件經提到安全會議來。當蘇聯在條約過期後仍在伊朗駐兵時，安全會議由於伊朗的控訴乃加以壓力。會議中除蘇聯與波蘭外，每一會員都贊成保障伊朗的完整。蘇聯因爲眼前還不準備也不願意在世界上孤立，所以對於安全會議的決議總算遵守。

現在，讓我們將一九四〇年時莫洛托夫的要求與今日歐洲的形勢來比較一番。

紅軍所扶植而羽翼下的保加利亞政府，已不需要訂立條約了。這樣，莫洛托夫所要求的蘇聯與海峽間的「安全線」，已經達到目的。在羅馬尼亞也已被蘇聯用我以前所敘述的策略扶植了一個同樣的政權。蘇聯在匈牙利野心的活動還是最近的事，但其方式則仍與以前相同。

波蘭被置於附庸國的地位。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被緊握於蘇聯統治的斯拉夫集團中。捷克斯拉夫則可說是這集團的俘虜。所有莫洛托夫曾表示關注的歐洲地區中，僅希臘與土耳其仍屬目

由，但蘇聯正在進行想獲取他們。

我們的一位幹練的觀察家馬克愛斯列治的報告中已說明：如果沒有兩種因素，則少數有組織的共產黨，以蘇聯所支配下的希臘的鄰國為基地並受其接濟，老早就奪得希臘政權了。那兩種因素是：（一）聯合國的行動，（二）蘇聯明白：如果他們奪得希臘，則美國與英國將要求聯合國對這種侵略行為加以制裁。

安全會議的巴爾幹調查委員會工作延遲而努力，但混亂仍極普遍，美國派代表團去希臘，以格里斯華為團長，設法促進其經濟與政治的健全，以壓制由於共產黨煽惑而發生的騷動，希臘的命運仍在未定之數。

提及土耳其，我們應當記得在波茨坦會議時，史達林聲明蘇聯對海峽始終關注，所以要求在該區建立陸海軍基地的權利。我們會努力想獲得集體的保證，以維持韃靼尼爾海峽的自由，但未成功。我們現在已用其他方法保障土耳其的主權。

卡爾馬克斯與別的幾位歷史家已很明白說明蘇維埃的願望與沙皇的願望絕少不同。而必然的，莫洛托夫在一九四〇年的要求，正是蘇聯在最近將來的動向的一般標記。

關於蘇聯究竟是求安全呢還是求擴張？我想即使蘇聯自己在分析其動機時，也難於正確說出安全與擴張的界限。如果他們曉得這界限在那裏，亦必不會承認。在談到這問題時，我就想到這正為有種人為求保障而買進與他們毗連的房屋與農田。蘇聯也以為為安全起見，其鄰國與附庸國



必須是「友好的政府」。所不同者，蘇聯對其鄰土並不出錢購買，而毫無顧忌地破壞法律與約束，以求獲得安全所需的財產。

常常有人問：蘇聯是否以安全爲名，意欲統治整個歐洲大陸？我想他們要在所有歐洲國家內安置充足的有組織的共產黨徒而使他們能够指導這些國家的政策。我並不認爲他們現在即想奪取所有歐洲政府。他們恐怕西歐人民不願接受現有蘇聯式的政府形式。他們也明瞭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內他們尙未訓練出足能組成此種形式的政府領袖，如貿然行動而失敗，將使他們在全世界的威望大爲減損。所以截至目前，他們僅止於培植當地領袖，待時而動，用罷工的威脅以及鼓動憤懣的情緒，他們可以在若干國家內施展其力量而毫無責任。希臘顯然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他們似乎尙在用一貫的「滲入」方法，尋求第二個目標來控制意大利政府。我相信他們的最後目的，在以某種方式或其他方式來統治整個歐洲。

在決定我們應該採取何種行動時，卡爾馬克斯大有幫助，一八五三年關於沙皇對土耳其提出要求時他寫道：

「在一連串的大勝以後，俄國已不可能對土耳其提出更廣大的要求了……如果其他強國堅持不讓，俄國一定會非常識相地退讓了」。

所以如果蘇聯感到美國與別的聯合國僅將口頭上提出抗議而一無實際作爲，則蘇聯將繼續追求這些歷史性的目標，猶如在雅爾達會議後不久對羅馬尼亞的行動；它奪取了一個政府，然後說

事情已經解決，沒有再討論的餘地了。

但是，反過來講，如果現在使蘇聯明白：如果它有一種侵略行爲，我們將立刻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如果使蘇聯明白，它在安全理事會中施用否決權，則將造成聯合國集體來支持而強迫實行大憲章的原則——假使能够這樣，我不相信蘇聯還會破壞伊朗、土耳其、希臘、義大利或任何別的國家的完整。

有許多理由蘇聯不願在現在作戰。我相信他們將「非常識相的退讓」。但假如其他強國不來「堅持不讓」，那末，如馬克斯關於沙皇時代的警告，蘇聯就要「一再無厭的想征服與併吞了」。我們不能再耽溺於無用的威嚇，我們必須不再從事我們不想完成的工作。我們必須以堅決的反抗來應付侵略與壓力。同時，我們在分析每種形勢時，必須公正而有目標。我們必須常常伸出友誼之手，我們必須不斷的表明我們切望與鄰國和平相處。

蘇聯今日所取的政策，在我所引證的歷史記載中已揭露無遺，我還願意指出另一個指標。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蘇聯戰後第一次大選時，史達林對其共產黨同志發表的演說。我相信，在這種情形下，對這些聽衆所發表的演說，遠較對於去訪問的美國人與外國記者所發表的言論來得可信。在那篇演詞中史達林這樣的說到將來：

「我毫不懷疑：如果給予我們的科學家必需的協助，他們不僅能够趕上並且在不久的將來，必能超過我們以外的國家的成就。提及較長期的計劃，黨方預備發動一個偉大的發展國家經濟運

動，使我們能够增加生產水準，達到戰前水準三倍的程度。

完成這計劃，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工業每年生產五千萬噸的生鐵，六千萬噸的鋼，五億噸的煤和六千萬噸的石油。

唯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國家才能保證應付意外事件。這或者需要三個新的五年計劃才能完成，但這是能够完成的也是我們必須完成的。

時間並不全部徧於蘇聯方面。

在回答「他們是什麼樣的人物？」這問題時，我沒有提到蘇聯的人民。我祇說了蘇聯的領袖，他們是我懂有的認識的蘇聯人。很少美國人能够真正懂得蘇聯人民。

在估計蘇聯現在的政策時，我們可以不必顧到俄國人民，他們對於蘇聯外交政策並不較之沙皇時代更有影響。但在考慮將來的政策時，我們不能忽視他們。我相信，他們才是我們的希望所寄。我不能相信那些曾為防衛其家國而英勇作戰的俄國農夫們真的想使別的與他們相似的人民受外人的統治。我不能相信那些幾年以前剛從近於奴隸的狀況下解放出來的俄國工人們會有意來剝奪別的國家的工人們的自由。

我曾經說過：「沒有一種鐵幕不能以人類的累積情感來刺破」。我相信這道理，我也相信有一種合理的機會，我們可以有充分時間來將這種情感帶給蘇聯的人民與領袖。

我也說過「我們不應有這種信念，即以爲我們在實現和平目標時的遲延與後退會使得武力衝突不可避免。」這是蘇聯領袖所持的一種信念使我們的工作大為困難。但如果我們自己也是這樣想法，那末我們就永遠不能使他們和世界其他國家消除這種念頭了。

## 第十五章 我們往何處去？

在前數章內，我已經說明我們目前的情形是怎樣，以及如何有這種情形的原因，希望藉此說明可以幫助我們決定今後的步驟。行文至此，我覺得我應該以我的經驗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是：我們現在往何處去？

答覆這樣一個問題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醫治戰後的世界，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也無萬靈藥可以應用。但是我相信人類可以建立一個永久公正的和平，不過我們不要太樂觀，以為這件事只要出之以信心即可做到，也不要太悲觀，以為非再來一次戰爭不可。

指津領路的事，往往是一件冒險的工作，尤其是我這份草稿交給出版商是在七月一日，而書却要到十月中旬才能出版。在今日時事像萬花筒似的在變動着，那麼在這三個月中有何變動，恐怕只有先知占卜者之流的人才敢預言。我既非先知，也非占卜之人，不過我深切知道每天可以發生新的危機，而今天的危機常常是在明天即被人遺忘了。因此很明顯的，今日根據目前事實及環境所發表的意見，三個月後因為事實及環境改變了的原故，須予以廣汎的修改，甚至完全不適用。有了這樣一個前題，我願意提供我們在建立和平方面應採取的幾個步驟。

我以爲我們應立即與奧，德，日早日訂立和約。在前數章內，關於和約的締結我已經指出一條道路；我懇切希望蘇聯能踴躍參加，以促其實現。其他各國亦瞭解這是重新建立世界的一條不可少的正當路徑，雖有蘇聯的反對，決不能阻止他們走上這條路徑。採取這條路走，需要勇氣，需要集體行動。它前途目標的重要，即足以證明行動的必要，因爲戰爭狀態的繼續存在，如軍人政府及大量佔領軍的繼續保持，對於和平及安全是個永久的威脅，它不但危害同盟國人民的經濟政治的幸福，也同樣危害戰敗國人民的幸福。

就在我們計劃和平解決辦法的時候，時局的演變使我們對於和平的永久性亦發生疑問。自歐洲戰事結束以來，我們很關心蘇聯對於希臘及土耳其所抱的態度。英勇的希臘人，他們先與義軍奮戰，繼而抵抗德軍的侵略，深獲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的稱讚。不幸敵軍的撤退，不能結束他們的困難及痛苦，而內戰隨即發生了。希政府認爲蘇聯附庸有鼓勵內戰的嫌疑。

英軍終於出面干涉，以期恢復秩序。希臘自一九四五年夏季以來，即不安甯，與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等國接壤的區域內，遊擊不斷發生，希政府從事清剿，因而不克分身去恢復崩潰中的經濟。希政府認爲在阿，南，保等國內訓練的遊擊隊，侵入界內，搶擄掠奪後又逃回外國，聯合國巴爾幹調查委員會認爲此事至少有一部份是事實。遊擊隊獲有希臘共黨的援助。去年該區域內人民沒有種稻耕地，因爲他們知道秋收無望。百姓離開田地，逃至城市避難。政府爲要保護人民的安全，抵抗遊擊隊的侵襲，不得不採用抵抗的步驟，而許多人認爲這些步驟是壓

迫的方法。

一九四六年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時常與希首相沙達利斯及希政府其他官員把晤，作深切的談話。我們如果沒有看到關於希臘軍民被殺害的每日報道，一定會批評希首相所實施的措施是壓迫的，不過對於一個原有希臘土地完整維護責任的人，這實在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去年夏天希臘選舉，人民都投票贊成國王復位。當時在希臘的外國觀察者，認為希臘人民對於皇室並無好感，因為反對共黨的原故，只得投票贊成皇室復位。選舉之後，首相對我說，國王和他都懇切希望民主派人士能參加政府。我極力勸他這樣做，但事與願違，他沒有成功。

十月一日和會開會時期，希首相對我說，希臘國庫收入一大部份須用在軍費方面，這樣更加强經濟的崩潰，希臘需要經濟援助，軍隊需要增添配備。他又回答我說，英國已以軍用品供給他們，並同意繼續供給。我告訴他，我們只能在歐的剩餘軍用品供給他們。我已經請處理該項軍用品的官員盡量援助希臘。我並且告訴希首相，國會既沒有撥發一筆款項救濟希臘，因此我不能應允予以經濟援助，不過國會如果通過我們所請求的三億五千萬元的救濟費，希臘必可得到一筆相當大的數目。我也告訴他，我可以請求進出口銀行對於希臘借款作有利的行動，並且如他之所要求，可以委派調查團到希臘作實地之調查。此事業已實現，該調查團由包特爾領隊，到希臘去調查該地的經濟狀況。

希首相去年十二月到紐約，又和我商討希臘問題。我請他到華盛頓，與進出口銀行當局及副

國務卿克萊頓商量援助的事。在他去到之前，杜魯門總統和我與進出口銀行理事們共同檢討希臘局勢。他們認為照該行規章，除非有「借款償還的相當保證」，不能借出款項，以希臘局勢不靖而論，希臘是否合乎此條件頗有疑問。他們說可以予以考慮，不過我知道希臘借款的實現希望很少，除非規則有了改變。

當希首相在紐約的時候，我曾和貝文討論希臘局勢。貝文說，英國已在經濟及軍事兩方面援助希臘，並繼續以軍用品供給希臘，但他希望我們能以經濟援助。他說只要可能的話，英國極願將軍隊自希臘及其他數處撤退。但他從沒有表示不問希臘情形如何，英軍將於三月卅一日或任何規定日期撤退。

土耳其的情形亦相同，她的經濟狀況雖比希臘略勝一籌，但她的主權亦日在動搖之中。蘇聯對於希臘的企圖或有可辯駁的地方，但她對土的企圖却彰彰明顯，豪無可疑之處。

下面的一些事實，如（一）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商請希特勒同意蘇聯在土國海峽建立海軍根據地，（二）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中重申此請，（三）蘇聯政府直接向土要求有建立海軍根據地的權利，並要求土割讓卡爾及阿達漢兩省。這種神經戰使土不得不經常武裝七十萬到九十萬軍隊，而軍費之浩大，使土無餘力去從事經濟建設。

去年秋季，我對於土的態度亦如對希臘的態度一樣，即是盡力作經濟上的援助，而不能予以軍用裝配品的供給，我告訴土國代表，如國會批准三億五千萬元的救濟費，他們可以得到一份，

並且促使國人考慮予以借款，以應建設之用。

就在此事同時，土政府通知我們，蘇聯致文土政府，重申在海峽建立海軍根據地的要求，我們立即通知土政府，堅持我們在前年十一月所採取的立場，即是蒙德婁會議所通過議案如有任何修改，應召集國際會議討論之。土海峽的管治，決不只是黑海各國的事，也不是蘇土兩國的事。該海峽的防守，應依照聯合國所訂的原則及目標辦理。我們將堅持這個主張。

這是今年一月廿日我離開國務院時的情形。三月一日左右，英政府通知美國，三月川一日以後，英國不能繼續對希土兩國作經濟或軍事上的援助。

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親臨國會宣稱，美國接到希臘緊急懇求，速即予以經濟及軍事上的援助，否則希臘無法維持其自由國家的地位。總統並宣稱，英國已不克再予希臘以必須的援助，「我們必須援助自由民族，依照他們自己的方法，從事建立他們自己的命運。」總統請國會撥出四億元援助希土，並予以供給品及軍用配備，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卅日為止。除此之外，總統並擬委派軍事人員至希土，訓練該兩國軍隊。

我雖然沒有得到可靠情報，但我以為英國去冬受天災，罷工，尤其美元缺乏的影響，英財政當局不免神經緊張，因而影響政府政策，於是通知我們擬於三月三十一日停止土希的援助。英政府財政困難，不得不停止土希兩國的經濟援助，我政府中亦有人具此見解，但我却斷然知道英軍決不會於三月三十一日或在在我國未決定行動之前自希土撤退。我的判斷沒有錯誤，英軍直至今日



(七月一日)仍駐在希臘境內，據云約有八千餘兵士駐在希臘境內。我國擬派七十五名海陸軍官至希臘，此數固不足以代替八千餘英軍去援助希臘抵抗侵略，不過此舉可以證明我國極願援助希臘，這樣可以給希臘人民一些安慰，而對於侵略者却是一個警告。

英政府宣稱停止援助希土，我說她是神經過敏，其實我們對於此事的反應亦不免神經過敏，不過也是正當的。我說正當，因為在此局面下，吾人不得不予以援手。我說神經過敏，是指予以援助的某些理由而言，這些理由似乎暗示，任何國家的共黨如果獲得政權，不問他們是否由外力的幫助或是由人民自願投票贊成的，美國都一律反對。我政府決不能採取這種態度。以誠實的投票獲致政權，與以武力或外力的威脅獲致政權，這兩者之間分別甚大。不過像我國的政府，不同的理由可以啓發國會及行政機關中不同的人，而可以達到相同的行動。這事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我們對此事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即是我們不得不予以援助。

我們供給土希以軍用品，這是正當的行動，我們沒有干涉這兩國的內政，他們都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希臘會向安全理事會申訴，她的國境被南，保，阿國籍的份子所侵犯。如果此事屬實，如果這些國家慫恿其人民去侵犯希臘，這對於世界的和平即是一個威脅。

當希臘第一次請求調查這種威脅和平的事件時，蘇聯起而反對。其時外長會議適在紐約開會，莫洛托夫在某些問題上會和我的意見一致，因此鼓勵我請求他和我們合作。我對莫洛托夫說，蘇聯和美國負有維持和平的共同責任，如果他能運用他對於南，阿，保三國的勢力，決可使

希臘的局勢好轉。他說這三國無疵可擊，只是希政府貪污腐敗，不爲人民所信任。我不同意他的說法，並舉出我的理由。我們第二次會晤時，我提出一個意見，既然我們兩人所得的情報如此不同，最妥當的辦法即是吾人先找出事實，然後再討論醫治的方法。最後使我驚異的是：他竟命他在安理會的代表支持組織調查團的議案。此議案被通過，我於是委派伊斯利支先生代表美國，參加調查團的工作。該調查團自開始即遭遇了困難及稽延，我國代表認爲這是要希臘的鄰邦負責。

就在這種情形下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演講。他並未宣稱任何自由國家的獨立遇着威脅時，美國即應單獨行動，如屬必要，應運用武力去阻止侵略的主張，這是聯合國應做的工作。美國無意欲撇開聯合國而單獨行動，亦無意欲傷害或摧毀聯合國。總統的演講辭不能作如此解釋。

參議員范登堡提議補充該項援助決議案，即聯合國如認爲希土局勢需要仲裁時，有權實施其對希土之裁判權。此提議爲參議院所採納，而美國的立場因之更爲顯明。

現在聯合國沒有軍力可資調遣，這又是因爲蘇聯代表在安理會的軍事委員會中所採用的拖延政策所致。美國爲聯合國發起人之一，不得不向蘇聯及世界說明，即當安理會調查希臘事件時，在該會未達到結論或無軍力控制局勢之前，美國決維持現狀。此係幫助聯合國而不是傷害她的進行。關於土耳其，吾人亦決維持其現狀，直到她有維持的力量爲止。

堅決可以結出果實，我這個主張在伊朗事件上又得到證實。在該處如在土希相同，蘇聯擬完成其歷史上的目的。她所採用方法亦相同，即在紅軍掩護下，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我們這次警

告蘇聯，美蘇對德黑蘭宣言負有遵守責任，該宣言係羅斯福，史達林及邱吉爾所簽訂，保證伊朗主權獨立。我親自向史達林說明，如果伊朗向聯合國控訴，吾人即支持伊朗。但是我們一切努力均歸失敗，不能使蘇聯政府置信我們將實施我們對德黑蘭宣言的責任。因此，當伊朗向安理會申訴時，我們即出之以行動。

一事情發生，其主要的爭辯往往落在它的枝節上。伊朗問題即如此，爭辯的焦點成爲伊朗是否有權向安理會控訴。我認爲任何國家如果不能享有迅速與安理會接觸的權利，此例一開，聯合國的生存必被摧毀。我對於伊朗的主權及其迅速與安理會接觸這兩點，深爲關切，因此親向安理會伸張吾人之主張。蘇聯極力反對，葛羅米柯甚至在安理會集會爭辯時退席。但是堅決及聯合國終獲勝利。

史達林致電某通訊社社長，宣稱蘇軍撤退，此電未致安理會。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內，該傀儡政權崩潰。伊朗人民未受蘇聯宣傳的愚弄，聯合國觀察團與伊朗當局進入傀儡政權所在地時，該地人民歡呼迎接，他們大聲歡呼「聯合國萬歲」。這種歡呼聲吾人永不能遺忘。

安理會從來沒有採取正式的行動；而是她的裁判力量使伊朗能夠向世界控訴。蘇聯也許會重新努力，以貫徹其對伊朗的目的，不過這次吾人在聯合國機構之內採取堅決及積極行動，有此例證，吾人精神亦可爲之一振矣。

關於匈牙利問題，亦需要同樣的堅決行動。蘇聯會深思遠慮，使獲有百分之五十七選票的匈

政府官員去職，而此選舉會被史達林及莫洛托夫譽爲是自由選舉。匈首相被逐去職；由共黨代替其執行職務。匈首相宣稱，此舉係受蘇聯政府所指使，並有證據。如果匈首相的話確實，則蘇聯在匈國的措施實違犯她在雅爾達會議向同盟國所作的保證。我現在還不知道美英對此事將有何行動，但我知道她們應該如何行動。她們應該向安理會申請調查，是否有侵略的事實存在，如果調查屬實，應將政權歸還給獲有百分之五十七選票的政黨執掌，或者採取類似行動，保證匈牙利人民有獨立生存之權，不受蘇聯政府的壓迫。

土希如被侵略，我們必以行動應付之。現在已有證據，證明蘇聯已在匈牙利實施吾人所謂對土希應該採取行動的同樣舉動，吾人如何不出之以行動呢？我國政府因爲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業已取消約計一千五百萬元的購買我國剩餘物資的借款。如果我們有理由取消借款及提出抗議，我們自亦有充份理由請求調查事實。

我們不能因爲蘇匈間沒有正式簽訂條約就袖手不動。其實該條約係由蘇外長莫洛托夫同意而由英，美，法所批准者。吾人不能讓蘇聯實施拖延政策而獲利，如果將來蘇聯用同樣手段而控制義大利政府，即使義和約未批准，吾人自必用較抗議更強硬的方法應付之。我認爲匈牙利問題實在是在杜魯門總統在議會中所宣布土希政策的精神範圍之內。因此，吾人不可成立一個不行動的前例。

這一切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如伊朗，希臘，土耳其，匈牙利及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蘇聯

或可以其涉及蘇聯國家利益爲藉口，或可因恐懼及猜疑而促其行動。這可能是事實，但片面地謀求自國的利益，加上恐懼及猜疑，可以引起爭鬪，而爭鬪是與全世界各民族的利益相抵觸的。

國與國之間強富的變動，往往造成世界的不安定。蘇聯久已是一個重要的強國，但她在歐洲大陸上從來沒有像她現在這樣明顯地處在主要地位上。每當一國國力劇烈增强的時候，自然而然有人要關心到她是否再行擴展，尤其是當這國的領袖們具有侵略的觀念時，人們對之更爲關心。

當一個強國，像蘇聯一樣，雖然與其他國家間的關係是處在一個強有力者的地位上，但是她國內的生活水準實較其他各國爲低，在此種情形下，世界更爲之惶惑不安。

除蘇聯之外，其他國家也有要求領土的慾望，如法國要求薩爾區，蘇聯曾表示欲歸併伊皮拉斯，荷蘭擬將接近邊區的一小塊德國領土歸併其國土內，比利時也有合併鄰接邊區的德國土地的意思。不過不同的地方，是這些國家係通過國際機構如和平會議或外長會議而申請其要求，而蘇聯顯然是出之以片面行動。這種行動又往往是以政治侵入的方法實現的。

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不得以威脅或運用武力侵害任何國家領土的完整及政治的獨立」。此定義不限於武力侵略，其他如壓迫，強制，或用政治的狡猾方法而侵略，均在此定義範圍之內。

這種政治侵入的威脅，施之於那些政治經濟均被戰火所毀的國家，情形更爲嚴重，因爲這樣受威脅的國家必將採用報復的行動。雙方均認爲是自衛，各不相讓，結果互相爭辯，星星之火，

不久即成燎原之勢，蔓延至全世界。

如果我們有意於防止此種災難的發生，我們不但要阻止侵略的行動，更要剷除這種行動的根源。有些國家爲戰爭的原故，人民無衣無食，吃不飽，居不安，因而易爲侵略觀念所誘惑，使他們自每日現實生活中逃避至一個幻想境界裏去。我們如欲這些人民重視自由，遵守法律，我們至少應該使他們有衣食住的機會，使他們得以安居樂業，遵守秩序。我們應該使他們感覺到不必做蘇聯，美國，或任何其他強國的附庸而仍可獨立生活。

我們予人以經濟援助，決不可有意要管治其人民，而寧可是要使他們獲得自由。我們必須要使他們瞭解，我們給他們以自由的機會，不是要他們依賴我們。如果在自由不得伸張的地方上，我們應該確實知道我們所給予的經濟援助，不致於成爲反抗我們自己的工具。

我們必須要十分解釋明白，我們不是與蘇聯爭奪管制他國的權利，而是歡迎蘇聯的眞誠的合作，共同再建並保護政治及經濟的獨立。

我如果不再說明，我們想和蘇聯合作，在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迄今毫無效果，那麼我所說的話就缺少直率性。我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前數章內業已說明。貝文和皮杜爾依照馬歇爾國務卿於六月五日提出的意見所寫成的計劃，現在我們又接到了莫洛托夫的反對公文。馬歇爾國務卿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曾請求歐洲各國「同意局勢的需要及他們應採取的步驟，以便本國如有任何行動時可予以相當的影響。」

馬歇爾國務卿並未說明，美國將於此計劃將供給任何規定數目的款項，以促其實現。他只是說「吾人將視力之所能去支持這一計劃」。但政府中有其他官員，曾估計此計劃將使吾人每年担负五億至六億元，以四年或五年為限。國外已有人引證此說。此估計甚至是在歐洲國家集議之前即有，這就是說，我國官員在事前似已知道計劃內容如何。顯然地，此一估計已激起若干歐洲國家官員的興趣。

貝文和皮杜爾兩位先生的創舉，我固表歡迎，但自政治的現實性而言，吾人於歡迎此一援助復興歐洲經濟計劃之餘，似宜略表幾句忠告之言。吾人應說明，美國爲了經濟來源的關係，對於援助的數目，應付給何處及在如何條件之下方可動用款項等問題，應有決定的權利。

若干歐洲國家的政府及人民不明瞭我國的情形，即除非國會確實批准，我政府行政機關的官員無權締結經濟的合約。我們應說明，不要以爲他們所已同意的計劃我們即非照付不可。任何經濟計劃，事先必須有國會的批准，否則國會如果拒絕付款，豈不要引起誤會及失望，因而傷害吾人與歐洲國家間的關係。

國會究竟如何行動，我們可以由最近的措置而略窺一二。吾人對於聯總的生命無意欲延長之，因爲依照當時的規定，我們所批准的救濟款項，其他國家不分派時，美國即分派之。當國會批准三億五千萬美元救濟費的時候，並未將支配該款的決定權授與行政機關。國會規定該款的三億三千五百萬元應用於奧，希，匈，義，波蘭，特斯地及中國之內，其餘一千五百萬元方用爲救濟

其他國家。國會並規定，所分派各國的救濟費，其用途應由美國籍人民所組織的團體監視及管理。

又如最近議院通過希土軍事經濟援助費四億元，已爲國會通過，由總統所批准，規定該款應組織一個美國委員會監視其用途，該委員會主席應由參議院委派。

巴黎經濟委員會於六月下旬開會時，莫洛托夫宣稱，美國應先公布在如何情形及條件之下，方供給經濟援助，並對於受援助國家的主權應予以相當保障，否則即拒絕出席。莫氏如此行動，使所有熱望世界合作的人們俱感失望。若干官員及主筆認爲這種拒絕行動，即爲蘇聯需要歐洲的混亂情形繼續存在的具體明證，我對此說不表贊同。

以蘇聯在其他問題上拒絕合作的事實而論，他們也許不反對歐洲不安定情形的繼續存在，這是很可能的事。雖然如此，莫洛托夫在這件事上所採取的行動，應予以不同的解釋。英法的邀請，使他處在一個困難的地位上。他的附庸國，像一切感受經濟困苦的民族一樣，必然歡迎這種邀請，將他們所需要的經濟援助情形通知美國，尤其自新聞報道內得知這種援助係以贈予的方式出之，而不是以借款的方式出之。如果蘇聯現在對這些國家施以壓力，使他們拒絕美國的經濟援助，則蘇聯本身即應在經濟上幫助這些附庸國，這樣一來，他自身的建設計劃必受阻礙。

我認爲莫洛托夫的拒絕參加會議，是受了如他拒絕與我們在原子能建議及若干其他建議上合作的同樣恐懼心理所影響，他們恐懼一旦合作，即不得不准許我國代表至蘇聯境內自由旅行，以



便調查。

任何建議，只要涉及外國代表至蘇聯管治區域內作調查的旅行，無不爲莫洛托夫所反對。莫氏的意見，以爲我國現在予友誼國家如希土兩國以經濟援助，附有監視用途及調查事實的條件，則援助其他國家時自必有相同的條件。我的猜測是，除非蘇聯獲有保證，美代表不至蘇聯境內或其控制下的區域內調查，亦不監視其用途，蘇聯必繼續拒絕參加巴黎會議。

莫洛托夫拒絕合作，我在今天（七月一日）對此事的看法是，莫氏在無意間替美國政府解決了一個困難問題，因爲如果蘇聯和他的附庸國參加巴黎會議，那麼英法既然爲自己請求援助，自必亦爲蘇聯及其附庸國請求巨大數目的建設費，這樣一來，國會即遭遇一個困難問題，正如英法邀請對於莫洛托夫一樣的困難。這個援助一切歐洲極需援手的國家的建議，在未被提出之前，自然先已呈送民主及共和兩黨領袖過目。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能在如此環境之下猜測國會的行動。如果國會需要監視用途，正如希土援助條件一樣，蘇聯及其附庸國自必拒絕援助，他們必須要求先知道援助的條件如何。另一方面，如果蘇聯及其附庸國要求不可附有任何監視的條件，則唯一的結論即是國會不致批准用款。因此莫洛托夫拒絕參加巴黎會議，實替國會解決了這個難題。莫氏已負起了分裂歐洲成爲兩個政治及經濟勢力圈的重担。

美國人民及國會深切瞭解，吾人必須處置世界不安定的病源，而不只是它的病狀。需要援助的急切，比吾人所想像的更嚴重。美國物價自戰事以後，業已增高，因此吾人所給予的借款亦必

視前爲大。雖然如此，我深信他們將爲建立和平而作必要的犧牲。不過所提出的計劃必須是合理的計劃，如不合理，我恐怕國會不致批准足敷應用的數目，那麼又何須乎提出援助的建議呢？

恢復歐洲經濟第一步應做的事是，我們應集中精力於剷除經濟上的基本困難點，這些困難使各別國家不能增加生產及貿易。此事無須歐洲所有國家的贊同，也無須作廣泛的調查才能決定。我們已知道這些困難是什麼。

第一，吾人不但須利用我們的金錢，並且須要利用我們的腦力，去設法增加歐洲的煤的出產量。煤的需要，幾乎是每個歐洲國家經濟問題的重心，而歐洲的煤問題的中心是在魯爾區。

一九三九年以前的和平歲月中，魯爾區每天可出產約四十四萬噸的硬煤。一九四七年五月，即是歐洲戰事結束後兩年，該區每日只出產廿一萬四千噸，短少的噸量，有若干是由美國購煤來抵補，但是魯爾區出產的煤，成本每噸合拾元，而佛基尼亞西部出產的煤運到納波斯，每噸須合廿二元。今年歐洲國家須向美國付出約六億元的煤費，其中一部份的錢須由美國的貸款中支付。這是不經濟的辦法，也是一種浪費，應及早予以糾正。

魯爾煤產量不能增加，組織不健全及管理不善是一原因，良好機械的缺少是另一原因，但另有其主要原因。一個鑛工每星期只須工作兩天，即可獲有購置配給品所必需的錢，因爲魯爾區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購買，國家的前途既不安定，所以也無意儲蓄，對於錢亦無信仰。如果改進德國鑛工的生活，那麼那些要懲罰德國的人們必紛起提出抗議。但是不予改善，不但德人受其痛

苦，即全歐洲的人民亦受其痛苦。

關於此問題，我們現在即可開始行動，無須等待別國的同意。只須切實增加魯爾鑛工的配給量，將良好的機械自美運去，並供給鑛工和他們家庭以更多的消耗品，這樣立刻可以自煤的出產量增加上得到反應。

上西利西亞也是一個重要的蘆煤區域，我們也應該考慮如何增加它的產量，不過我們的援助須附有一個條件，即是該區出產的煤，其中一部份應供給那些在戰前即依賴該區產煤的西歐國家。即使波蘭沒有參加巴黎的經濟會議，我們也應和他的代表商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是我們應考慮如何增加電力的產量及其運用的裨益。我和羅斯福總統最末次會晤時，曾介紹克雷將軍與之會面。其時克雷即將動身去德。我告訴總統，克雷是一位工程師，曾在特克薩斯州建立了一個偉大的電力工程。總統立即將他的計劃告訴我們，擬在中歐建立一個電力工程。當時他即預知歐洲的主要問題將是燃料。

我們必須注意，不可只顧慮歐洲的經濟問題，其實亞洲經濟的重新建立，對於世界的安定也很重要。在亞洲如在歐洲一樣，我們所要援助的國家，必定是那些努力於重新建立已被毀壞的生活，以及有希望與自力更生的國家。科學的進步，已可以使所有的國家保持及增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只要他們彼此合作，出產他們所缺少及需要的東西。

只須約略說明，即可知此問題所包含的性質是如何的浩大。我們在美國所能做的事，必須是

在我們財源範圍之內，如果爲了應付目前緊急狀態之故，而使我們的經濟泉源枯乾，這對於世界安定這樣一個遠距離目標的完成，亦無補於事。

繁榮像自由一樣，必須是共同享受的東西，不是以「袖手不顧」爲根據，而是以互相公平真誠的交換出產品爲其基礎。我們給人以幫助，如欲報酬，我們必須願意接受貨物及服務爲一部份的報酬。但是在歐洲經濟未至自足自給的階段時，我們不能實際地希望有此報酬。

一個豐衣足食，有學校及其他必需品的世界，遠比一個一無所有的世界易於應付。不過在我們從事於經濟復興的工作時，仍應繼續在其他方面工作，卽如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其重要性亦相等。

吾人曾以集體行動將德日擊敗。現在德日兩國均無力發動戰事，除非同盟國擬利用其充當兵卒，或邀之作爭奪權力的伙伴，准其重新建立軍力，德日決不能在短時期內有力再從事戰爭。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吾人已有充足經驗，如欲更動和平條件，最好是吾人自行修改之，如讓敵人獲致武力，以之作爲修改和約的工具，則結果必爲不利。

爲要具體表示吾人須要這些國家永遠解除武裝起見，我曾建議，由四強簽訂一個四十年期的協約，防止德日再威脅世界和平。該協約規定凡違犯其條款者，立即予以懲罰，並規定爲實施若干懲罰計，四強中之任何一強有取消其否決權之權力。

此協約的接受，可以表現該國願意使德日解除武裝的誠意。英法業已接受該協約而簽字，史

達林在原則上雖已同意，但被莫洛托夫所極力反對。吾人再籲請簽訂此協約，如蘇聯再拒絕簽字，則吾人對於前途惶惶不安，亦理所當然也。

我現在仍希望蘇聯能接受這個協約。我深信如果蘇聯能明瞭美國駐在德國的軍隊，只要該處駐有佔領軍，是不會撤退的，那麼蘇聯也許將接受這個協約。當勝利的時候，蘇聯以爲美軍將自歐洲撤退，由慾望所產生的結論，一旦欲使其變更，固不易一時即可辦到，但蘇聯這個結論，無論牠的領袖們喜歡與否，或遲或早，終將要改變的。如我在斯德高特所說的一句話：「我們要駐留在歐洲」。

這個四十年期的協約，正可以表明我們對於集體安全的主義是如何地支持着，這個主義在聯合國憲章內已達到它的高度表現。有人以爲蘇聯的不合作，已使聯合國發生動搖，這種說法我不表贊同。我仍認爲我們對於和平最大的希望，是在支持及發展聯合國這件事上，因爲聯合國所具有的潛勢力，實在比吾人所想像的大，她給予我們以推行集體行動的機會，而和平亦只有用集體行動才可以獲致。

有人說，聯合國的成功是有賴於強國的合作。這種說法，只說出一部份的真理。強國合作去維護和平，固然能使任何一國不能單獨去破壞和平，但是合作並不是非要所有的強國都同意不可，雖然這是我們所努力從事及熱烈希望的目標。聯合國憲章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彼此間的紛爭，除非爲防衛憲章的主義起見，不可藉用武力。這個憲章決不能由安理會常務理事

的一票否決權所打消。

安理會在未有該會常務理事一致同意之前，不能要求會員國採取行動，這固然是事實，但決不能作這樣的解釋，即如果有人明顯地違犯了憲章的時候，會員因為有這條規定的原故即不能自由行動，或不以為道義上自己有採取行動的義務。

如果一國對於違犯憲章的事懷有真誠的疑義時，自然可以採取行動。但是憲章內所包含的法律精神應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如果我們和聯合國所有其他會員國能明白表示，遇有必要，我們將以武力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精神的話，那麼這種精神即可成為所有國家的法律。

如果我們和其他強國能够準備以武力維護法律，則聯合國即有阻止戰爭發生的能力，我們也必須說明，我們決不以武力作任何其他的事。

但是接着而來的問題，即是如果我們有意維護主義，我們必須先具備這種力量。我們不應再減少海陸軍費，我們必須鼓勵及促進科學的檢討，我們應採用一個國民軍事訓練的計劃。吾人在國際會議中的折衝爭辯的力量，不能因為國內軍力的存在而減弱。

吾人必須說明，我們維護憲章，並不是對任何國家的一種威脅行動或敵對行動，而是使法治在國際間發生力量及作用的一種精神。吾人對待法律的態度必須明白，然後法律方可為人所遵守。

我不相信蘇聯是需要戰爭的國家，不過蘇聯政治家似乎以為他們的責任是在以奮鬥去提高他

們的權力及利益，以期達到最高的地位。我們必須透澈地說明，如果我們的奮鬥越出一定限度的時候，吾人必將實施法律以對付之，否則他們違犯那些限度的時候，還以為我們將聽任之而不予以反擊。

可是我們應承認，許多問題也須容納不同的意見。我們不可而且亦不能說，我們所決定的政策即是毫無錯誤的。我們在國會，議院及市政廳爭辯時的那種熱烈，在聯合國中決不會減少。

思想上的不同及主義的爭辯，如果我們能遵守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即是尊重那些與我們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的意見及其觀念，亦可促成進步及和平。其他的人們也必須尊重我們的意見及觀念。

不同的觀念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這世界上可以有並存的餘地，蘇聯有蘇聯的生活方式，美國亦有美國的生活方式。有人以為觀念之間必存在着衝突，這種看法只能引起衝突，而不能將某一觀念或生活方式掩藏起來。甚至歐洲不幸分裂成爲兩國經濟及政治的勢力圈，亦不能證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說法。談戰爭的人太多，而談和平的人則太少。如果我們能利用我們的力量，我們就不必怕其結果是如何，而應該懼怕的都是我們的力量利用得不必要。如果我們對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告失敗，我們應切記着，這失敗不是我們的過錯。

即使在這個戰後紊亂的時期內，聯合國仍已成爲和平的一個有力工具。

聯合國憲章，當我擔任國務卿職務的時候，公布批准該憲章的國家已足法定數目時，即于一

九四五年十月廿四日發生效力，成爲了世界各民族的基本律法。當我回憶聯合國自該日起所經過的一連貫的事件時，我想到國際聯盟在成立已有十一個月之後，才召集第一次大會的事，反之，聯合國大會即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後又于同年十月召開一次，今年五月又開了一次特別大會。

在第一次大會中，成立了安全理事會，經濟社會理事會，國際法庭，並選出一位秘書長，開始組織秘書處。

聯合國的安理會，不像國聯的理事會每年只集會四次，前者幾乎是繼續在召開會議中。該會的常務理事間的利益衝突，雖然影響了它的效率，但決沒有摧毀它的活力。安理會對於以和平方法調整局勢的力量，如伊朗事件，希臘事件的調查團，英法軍依照安理會大多數決定自塞維亞及黎巴嫩撤退，法緬領土爭執以談判方式解決，南斯拉夫射擊美國飛機案所作的讓步，這一些例子均可作爲明證。

我們對於安理會附屬機構，如原子能委會，軍用品委會及軍事人員委會的工作缺少進步，固感覺失望。但上舉的一些具有建設性的例子，吾人亦不可忽視之。世界各民族將建立集體安全制及發展與實施法治精神的重任，付予這些機構去担任。他們沒有進步的基本原因，是因爲蘇聯堅決拒絕接受國際管制及國家主權代表的主張，而這些主張是在世界極大多數國家一致公認是必需的。



美國是第一個國家，準備將原子能及其他大規模殘殺人類的武器給予國際共管。這種創舉，我們應支持之。國際共管制如能成立，我們才能予世界在解除武裝後以安全保障。非作到這一步，我們不能也不應解下我們的武裝。

同時我們仍應不斷努力，促使軍事人員委員會計劃特別辦法，使安理會有充分軍力去實施它的決議案。

其他業已獲有基礎的機構，我們也應繼續使其堅強，如食品農業會，國際勞工會，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會，國際民用航空會，國際建設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難民組織及建議中的世界健康會，國際貿易會等。按之實際情形，在過去兩年內，凡有關世界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活動，幾乎均有國際性的合作組織以促其前進。

至一九四七年夏季止，只有美、英、加拿大三國加入所有特別機構為會員。反之，蘇聯迄今只宣布願加入一種機構內為會員：即是世界健康會。

雖然我說了不少關於與蘇聯代表共事的困難情形，但是我仍堅決主張，我們仍應繼續我們的努力，以促世界合作的實現。我們這樣做，應該十分明白，即蘇聯也許不會與我們合作。假使我們的努力失敗，我們應使世界知道誰應負失敗的責任。經驗告訴我們，蘇聯的政策具有韌性，蘇聯發言人隨時可以改變他們的觀點。我們必須使之明瞭，即是我們十分需要他們的合作，不過如果得不到他們的合作，我們仍堅決地與那些願意合作的國家向前邁進。

7524

6124

4411

貝爾納斯

0032773

四強外交秘案

張國芳

51.5.10

54.1.15

55.1.10

#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7524

著者號 6134

登錄號 4 0032773



國史館藏書



0032773